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伟光	王洛林	厉以宁	宁吉喆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世锦	刘克崮	刘伟	朱之鑫	朱民
李扬	李毅中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大卫	张国宝
张晓强	张祥	张卓元	陈元	林兆木	林毅夫	周文重
赵进军	高尚全	海闻	钱颖一	郭树清	辜胜阻	聂振邦
楼继伟	蔡昉	樊纲	薛澜	魏建国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傅强恩/John Frisbie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郑永年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马克·乌赞/Marc Uzan

编委会

主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王晓红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战	王昌林	王晓红	马晓河	吕政	谷源洋
朱晓明	陈文玲	陈宗胜	李平	李晓西	李向阳	迟福林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高培勇
贾康	隆国强	常修泽	徐洪才	曹文炼	裴长洪	霍建国

主编 郑新立

副主编 王晓红

编辑部主任 沈家文

• 本刊专论 •

把握人口“后黄金时代”机遇期 提速经济转型升级 田雪原 (005)

• 国际经济 •

积极稳步推进中国制造业国际产能合作 李文锋 李志鹏 (023)

“一带一路”对接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投融资合作研究 孟 刚 (033)

中国大力推动企业跨国并购的对策研究 张 健 (042)

中国金属矿产对外投资的新进展及应对措施 高凌云 (053)

“十三五”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李 锋 (064)

• 宏观经济 •

加强财政、货币、发展政策协调配合研究 梁云凤 刘西友 (075)

我国真实城镇化率的特征、成因及对策建议
——国际比较视角 易 信 (086)

• 调研报告 •

大力推动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对浙江省杭州、温州两市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情况的调研
李 蕊 王晓红 (096)

国家发展改革委核心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收录期刊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博看期刊网收录期刊 中文知识网

美国全球知名智库考察报告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赴美考察团（104）

• 智库信息 •

关于办好智库期刊的研讨

——暨《全球化》创刊五周年笔会

杨圣明等（111）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118）

• 国际统计数据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123）



CONTENTS

To grasp the opportunity of the “post – golden age” of population to speed up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Tian Xueyuan* (005)

Actively and steadily push forward the international capacity cooperation of China’ 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Li Wenfeng and Li Zhipeng* (023)

The study on cooperation in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of the Belt and Road butt to
butt “Australia Northern Development” *Meng Gang* (033)

A study on the countermeasures of China’ s great efforts to promote the
transnational merger and acquisition of enterprises *Zhang Jian* (042)

New development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hina’ s foreign investment
in metal mineral resources *Gao lingyun* (053)

The mai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ing China’ 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uring the “13th Five – Year” period *Li Feng* (064)

Research on strengthening the coordination of fiscal, monetary and development policy
Liang Yunfeng and Liu Xiyou (075)

The characteristics,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real urbanization ratio in China
Yi Xin (086)

Policy suggestions on promot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Li Rui and Wang Xiaohong (096)

The inspection report on the United States global well – known think tanks
The CCIEE Deleg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04)

Seminar on running journals of thank tanks – Five anniversary meeting of “Globalization”
Yang Shengming etc (111)

Opinions of International Authoritative Institutes (118)

Main Indicators of World Economy (123)

把握人口“后黄金时代”机遇期 提速经济转型升级

田雪原

摘要：实践和预测表明，1990—2030 年我国人口从属比处在“黄金时代”。2010 年我国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上升到 0.75 峰值、从属比下降到 0.34 最低值，标志着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前黄金时代”的终结和“后黄金时代”的开启。“后黄金时代”提供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还有 20 年左右的不断衰减期，其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主要有：人口盈利、人口红利衰减导致经济步入新常态，必不可免地由高速转入中高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和绝对数量的持续衰减，就业压力的逐步减轻，为经济转方式、调结构提供了难得的机遇，经济转型升级得以摆上议事日程优先位置，并加快发展的步伐。

关键词：后黄金时代 人口红利 经济发展方式 转型升级

作者简介：田雪原，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导，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

当前，在对经济步入新常态并有继续下行空间的诸多阐释中，人口红利“消失”常常作为一条最主要的论据。然而，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步入“后黄金时代”以后，人口红利并未消失，而是处在不断衰减之中，这给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and 机遇。挑战是继续保持原来的高速增长已不可能，必须回归到中高速增长新常态；机遇是“后黄金时代”提供的不断衰减的人口红利可延续到 2030 年前后，应不失时机地抓住尚余的 15 年时间，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转方式、调结构改革，提速转型升级。

一、人口变动“后黄金时代”

1982 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提出力争 2000 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 1980 年翻两番奋斗目标，这是改革开放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最具号召力和影响力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全国各条战线无不为之开动脑筋、献计献策。当时笔者研究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考察二战后日本等发达国家、亚洲某些发展较快国家经济“起飞”的历史，发现这些国家的人口在经历短暂的生育高潮之后，均过渡到出生率和增长率持续下降阶段，形成年龄结构 0~14 岁少年人口占比持续下降、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持续上升、65 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持续上升趋势，即处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上升、少年和老年人口之和占比（社会抚养比或从属比）下降凸显的阶段。如果说，发达国家作为总体人口密度不高，人口问题属人口和劳动力短缺性质，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上升、少年与老年人口之和占比下降阶段的出现，起到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在情理之中；那么，日本和亚洲几个人口密度较高、经济发展较快国家也出现类似情况，理论上应当做出何种解释？是否是一种带有普遍规律的现象？研究后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这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中出现的一段“黄金时代”，如果劳动就业问题解决得好、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便可以转换成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中国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以后，这样的“黄金时代”就会呼之欲出、不可避免地向我们走来。

然而当时中国的情况，这样的研究却有些不那么合拍。众所周知，1980 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发布，号召党团员夫妇带头只生育一个孩子。1982 年党的十二大将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下来，关于人口问题的宣传和社会舆论，一时间形成一边倒的倾向，即中国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过多、素质不够高，解决人口与消费、劳动年龄人口就业压力很大，需要大力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质量。这样的宣传和舆论没有错，问题出在对人口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的辩证分析不够，及对社会经济发展正能量的研究挖掘不够。不言而喻，这对于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说来，其影响力是相当巨大的；对于实现 2000 年翻两番来说，其影响力更是直接的和不可替代的。笔者将研究成果写成论文《利用人口年龄构成变动促进现代化建设》，^① 提出并阐发：少年老年人口之和占比（即从属比或抚养比）越高，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就越低，社会负担越重，于社会经济发展越是不利；相反，劳动

^①田雪原：《利用人口年龄构成变动促进现代化建设》，《人民日报》1983 年 6 月 5 日。

年龄人口占比越高，社会负担越轻，对社会经济发展越是有利，可称之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预测表明，我国大力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将很快迎来这样的“黄金时代”，并可延续三、四十年。该文指出这对“实现 2000 年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和现代化建设关系极大”：到 20 世纪末的将近 20 年时间，由于从属比或社会抚养比大幅度下降，可减少数千亿元的抚养费用支出，用来投资建设可对翻两番起到重要的作用；针对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上升对经济建设和翻两番的影响指出：新中国成立 30 多年来，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比较迅速，使就业成为人口问题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从这个角度说，今后劳动年龄人口最好不再增加。然而由人口年龄构成轻的特点所决定，未来 20 多年继续增长的趋势是不可改变的，就业压力将继续增大。这就要学习日本、新加坡等国经济“起飞”的做法和经验，实现尽可能比较充分合理的就业，将本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挖掘出来、利用起来，成为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基础。我国要实现翻两番和加快现代化进程，应当充分利用出生率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上升、从属年龄比下降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加快推进发展的步伐。30 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实践证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黄金时代”提供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和“人口视窗”的开启，是一股巨大的动力，大约 1/3 新增国内生产总值（GDP）是由新增劳动创造和贡献的。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黄金时代”应有一定的划分标准。参照国内外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轨迹，笔者提出，以从属比 0.5 为界：

$(0-14) + 65^+ / (15-64) \leq 0.5$ ，即为“黄金时代”所处区间；

$(0-14) + 65^+ / (15-64) \geq 0.5$ ，则为未进入或者已经走出“黄金时代”区间。

如此，从进入到走出“黄金时代”，又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进入至从属比下降到最低值、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上升到最高值，为“人口盈利”“人口红利”不断增长时期，“人口视窗”经历由开启到最大化过程；后期为从属比越过最低值转而上升到 0.5 为止，为“人口盈利”“人口红利”衰减、“人口视窗”经历由最大到完全关闭过程。这是一条倒 U 型抛物线变动过程。我国 1991 年 0~14 岁少年人口占比下降到 27.7%，15~64 岁上升到 66.3%，65 岁以上人口上升到 6.0%，从属比下降到 0.5，标志着人口年龄结构正式步入“黄金时代”，“人口视窗”开启。2010 年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上升到 74.5% 峰值，从属比下降到 0.34 最低值，标志着“黄金时代”前期的终结和“后黄金时代”的开始。何时结束？国内外大同小异的预测表明，2030 年从属比可重新回升到接近 0.5，“黄金时代”提供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接近为零，“人口视窗”关闭，人口“后黄金时代”即告结束。因此，以 2010 年劳动年龄人口越过刘易斯拐点、从属比下降到

最低值为分界线，将人口“黄金时代”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后期亦称“后黄金时代”。“后黄金时代”人口盈利、人口红利并未“消失”，只是由过去不断上升转变到逐步衰减而已。宣称人口盈利、人口红利“消失”“结束”论者，是将 2010 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峰值或拐点当作终点，无视其后 20 年呈衰减态势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的客观存在，因而是 不符合实际的（参见图 1）。^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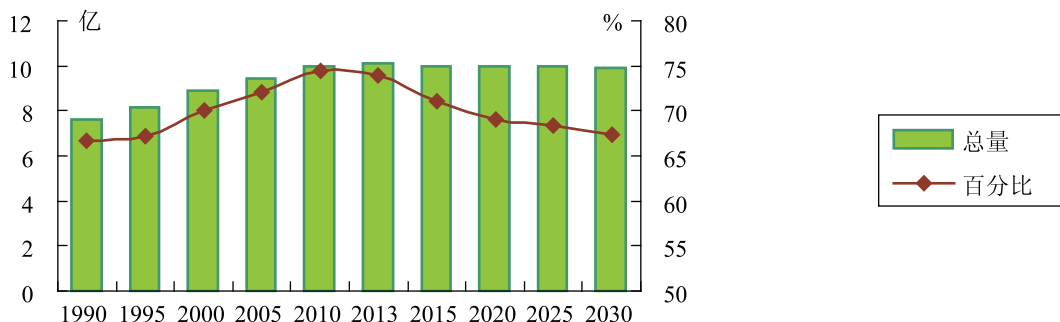


图 1 1990—2030 年 15~64 岁劳动年龄人口变动预测

图 1 TFR（总和生育率）给出的假设是：2000—2005 年为 1.75，2005—2010 年为 1.80，2010—2020 年为 1.83，2020—2050 年为 1.80，与人口发展战略“三步走”进入第二步、重点逐步由以人口数量控制为主转移到以素质提升和结构调整为主、人口数量控制和生育政策应当适当放宽相契合。当前处于 2010—2020 年微升阶段，恰同全面放开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相协调一致。亦即目前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出生率小幅回升，不仅不会影响到上述“后黄金时代”的基本走势，而且已经蕴含其中，很可能走出与其相当接近的轨迹。

二、经济走势下行探源

与人口“后黄金时代”提供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衰减同时，中国经济出现连续下行走势，步入新常态。2011 年 GDP 增长率跌破 10.0%，下行至 9.5%；2012 年跌破 8.0%，下行至 7.8%；2015 年跌破 7.0%，下行至 6.9%；2016 年上半年，进一步下行到 6.7%。^② 目前继续下行的压力依然存在，一些行业和地区露出中高速向中速下行冰山一角。怎样认识和科学应对经济新常态？需要弄清经济为什么下行、下行反映出什么样的客观要求，找准下行的直接动因和深层次的原因。

^①田雪原等著：《21 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450～452 页。

^②依据《中国统计年鉴 2015》第 66 页数据计算；参见：《国家统计局 2016 年半年报》，新华网，2016 年 7 月 15 日。

(一) 经济下行的直接动因

提到经济增速下行，人们第一印象便想到拉动经济增长的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出了问题，是车子失灵或动力不足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变动，参见表 1：

表 1 1978—2014 年三大需求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 单位：%

年 份	消费贡献率	拉动	资本贡献率	拉动	净出口贡献率	拉动
1978	39.4	4.6	66.0	7.7	-5.4	-0.6
1990	81.0	3.1	-54.2	-2.1	73.3	2.9
2000	78.9	6.6	21.6	1.8	-0.5	0.0
2010	46.3	4.9	65.2	6.9	-11.5	-1.2
2011	62.8	6.0	45.4	4.2	-8.2	-0.8
2012	56.5	4.3	41.8	3.2	1.7	0.1
2013	48.2	3.7	54.2	4.2	-2.4	-0.2
2014	51.6	3.8	46.7	3.4	1.7	0.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5》。

表 1 表明，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贡献率和拉动处在低水平震荡状态，明显受到国际社会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冲击，是众多国家纷纷祭起贸易保护主义旗帜所致。当然也有我国出口商品的质量、结构、品种、价格等因素的影响，震荡下滑在意料之中。好在从总体上观察，出口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已很有限，权重在不断降低。固定资产投资独大局面，出现拉动作用减弱态势。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近年来，边际投资效益日益下降，则使投资的拉动作用大为减色，甚至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统计数据显示，2000 年固定资产全社会投资与 GDP 之比为 0.65：1.00，2012 年上升至 0.78：1.00，2013 年上升到 0.86：1.00，2014 年略下降到 0.81：1.00，2015 年又回升到 0.83：1.00。似此等边际固定资产投资效益大幅度的下降，着实难以继续担当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任（参见表 2）。世纪之交消费经历由升转降，步入 21 世纪以来呈现明显疲软走势。2000 与 2014 年比较，贡献率由 78.9%下降到 51.6%，降低 27.3 个百分点，年平均下降 1.95 个百分点；由拉动 GDP 增长 6.6 个百分点下降到 3.8 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达到 42.4%，下降速度之快、降幅之大为以往所仅见。最近两年有所回升，贡献率和拉动作用均超过固定资产投资；但是远未达到应有的高度，提振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很有限。由于消费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

超过 51.0%，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因而要对疲软形成的原因做深入分析，以找准改革的方向和重点。

表 2 2000—2014 年投资与 GDP 之比 单位：亿元

	全社会投资	GDP（不变价）	投资/GDP
2000	32917.7	50664.7	0.650
2010	251683.8	408903.0	0.616
2011	311485.1	447690.4	0.646
2012	374694.7	482381.9	0.777
2013	446294.1	519454.6	0.859
2014	512020.7	630015.1	0.81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5》。

造成消费疲软直接的原因之一，是收入增长滞后制约着消费的增长。统计数据显示，国民总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同步增长，1979—2014 年年平均增长速度均为 9.7%。然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却要低下一截，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343 元增长到 29381 元，按不变比价计算年平均增长 7.4%，低于国民收入 2.3 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 134 元增长到 9892 元，按不变比价计算年平均增长 7.6%，低于国民收入 2.1 个百分点。按照消费是收入函数的理论，人均收入落后于国民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导致消费底气不足。

造成消费疲软直接的原因之二，是影响消费的相关体制不给力。可以通过对消费市场现象的剥离分析，窥其一斑。

其一，“买不起”背后的体制原因。为什么买不起？直接的回答是收入和支付能力有限。前已论及，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滞后于国民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不过这是就三者相比较而言，单就消费增长说来，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增长 7.4%~7.6%已属不低，与国际社会比较应在较高之例。2014 年我国 GDP 总量达到 636463 亿元，人均 GDP 46531 元。按当年人民币对美元比价中间价 6.1152:1.0000 计算，折合人均 7609 美元。如按照世界银行给出的划分标准：低收入人均 GDP 在 3000 美元以下；中等收入在 3000~11000 美元之间。其中 3000~5000 美元为中低收入，5000~11000 美元为中高收入；高收入在 11000 美元以上。2008 年我国人均 GDP 达到 3314 美元，跨进中低收入门槛；2012 年达到 6093 美元，跨进中高收入门槛；如今又继续前行将近 4 年，水平有了新的提升。虽然 2014 年世界人均 GDP 达到 10804 美元，但是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是“被平

均”的，许多尚在 3000 美元以下。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也有类似的情况。以基尼系数衡量，一般基尼系数在 0.2 以下为收入绝对平均，0.2~0.3 为比较平均，0.3~0.4 为相对合理，0.4~0.5 为差距较大，0.5~0.6 为差距很大，0.6 以上为差距悬殊。2013 年我国为 0.473，处在差距较大中上位置。笔者搜集到国家统计局公布和其他相关部门陆续公布的数据，摘取改革开放以来若干年份的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可以从中看出变动的轨迹：1981 年 0.288，1985 年 0.2656，1990 年 0.343，1995 年 0.445，2000 年 0.412，2005 年 0.485，2008 年 0.491（官方公布年份最高值）；2010 年 0.481，2011 年 0.477，2012 年 0.474，2013 年 0.473，2014 年 0.469。^① 从 30 多年基尼系数变动趋势看，有两点基本的共识：一是总体上基尼系数处于较高水平。自 1994 年基尼系数上升到 0.436 进入较高水平以来，除 1999 年下降到 0.397 特殊情况外，其余年份一直处在 0.4~0.5 较高水平之间，2003—2013 年更处在 0.473~0.491 较高水平较高区间。2014 年稍下降到 0.469，仍在这一区间中上水平。二是近年来呈略有下降震荡趋势。1994 年基尼系数突破 0.4 进入差距较大以后继续攀升，2008 年升至 0.491 最高值；此后转入略有下降小幅震荡趋势，目前仍处在差距较大中高区间。2008 年 0.491 是否真的成为峰值？一些相关研究给出更高一些的数值，质疑官方公布的基尼系数偏低。基尼系数较高、收入差距较大，潜台词是高低收入者均“被平均”了，这就是体制问题了。例如，人人都深切地感受到房价贵。2013 年北京二环路以内的房价，均价已经上涨到 5 万元/m² 左右，一套 60 m² 单元住房需要 300 万元，80 m² 需要 400 万元，100 m² 需要 500 万元。以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433.7 元、3 口人之家年收入为 34301.1 元计算，即使将全部收入累积起来用作买房，购买一套 60 m² 住房需要 87 年。如何实现住房梦？如要购买 80 m²、100 m² 的住房，恐怕长命百岁也难梦圆！只有高收入特别是高收入中的更高收入者，可以轻而易举地圆住房梦、别墅梦、豪宅梦。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出台经济适用房新政，网开一面向低收入家庭出售、出租廉价经济适用房。笔者以为，经济适用房新政并不那么值得称赞，因为它不符合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给诸多徇私舞弊行为提供可能；然而由于客观存在的居民收入差距如此之大，为了解决低收入群体居者有其屋不得已而为之，为解决“买不起”开出的一剂药方，也有可用之处。又如，教育、医疗资源稀缺，行业垄断也比较严重，加上不法份子从中进行欺诈、倒骗，致使低收入群体只好止步于名校、三甲医院门前，不能平等消费。而财大气粗者只要随行就市，就可以随意消费，并且把价格抬得很高。

^①资料来源：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王志平：《基尼系数公布：值得欢迎》，《文汇报》2013 年 1 月 21 日；《中国历年基尼系数统计（1981—2014）》最新版；百度文库 专业资料 2015 年。

这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怪胎，根源在于存在一定程度的资源垄断，在于教育、医疗的体制机制问题。

其二，“不敢买”背后的体制原因。所谓“不敢买”，是指消费者需要并且具有一定的支付能力，但是由于存在后顾之忧而不敢消费。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体制上。国际社会对中国消费文化有过一种舆论，认为“储蓄偏好”妨碍了消费。的确，中国居民储蓄意识较强，储蓄增长十分迅速。统计数据显示，1978 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占国民总收入 5.8%，2000 年提高到 65.3%，2014 年提高到 76.5%。^① 然而“储蓄偏好”只是一种表象，关键是居民消费存在后顾之忧，尤其是养老、医疗保险上的后顾之忧。改革开放之前，城乡养老与医疗保险截然不同，是有无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后，打破了城乡之间、城市内部事业与企业之间“双二元”结构，逐步建立起全国统一的体制机制。但是实际的差距依然很大，短期内难以达到保基本、全覆盖、有弹性、可持续目标。养老体制改革，城市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统一、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全覆盖基本实现了，但差别依然存在，新农保水平过低，不能真正起到保障作用。近年来医疗保险改革取得一定进展，看病难和看病贵得到某些缓解；但是医疗体制机制仍然没有多大改变，资源分配不合理仍然没有多大改变，个人和家庭难以从健康担忧中解脱出来，不得不增加作为“保命钱”的储蓄而减少消费。

其三，“买不到”背后的体制原因。这里的“买不到”，是指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居民消费，却很难从市场上购买到。众所周知，在市场竞争和平均利润率作用下，一般的普遍性消费很少出现短缺买不到的现象；如若出现，多数情况下是体制机制出了问题。当下我国消费“买不到”现象也是如此。如看病难、看病贵首先难、贵在挂号尤其是挂专家号上。在北京协和医院，一张专家号被票贩子炒到一百元甚至几百元，致使打击票贩子如同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其结果，“无利不起早”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打败“杀一儆百”，致使这样的打非难以取得斩草除根效果。为什么专家一号难求到如此程度？笔者以为，根源在医疗体制机制。目前知名医疗专家大多集中在协和医院等三甲医院，这在人民收入提高和健康需求升值情况下，看病就去名医院找名大夫成为常态，遂使医患矛盾尖锐起来。根源在哪里？在医疗体制机制。医疗改革进行数十年，但是医疗资源特别是优质资源垄断问题却没有根本解决。三甲医院拥有高大上的医疗设备、人才、技术，一般的医院很难获取。因为优质医疗资源是垄断或半垄断式分配的，“国老大”“京老大”优先是理所当然的。

^①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5》，第 4～5 页。

（二）经济下行的深层次原因

上述消费疲软的体制机制原因已经触及到经济下行的深层次问题。从经济下行宏观层面观察，主要是有以下原因。

其一，经济发展方式滞后，发展不可持续性增强。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工农业总产值2000年比1980年翻两番时，前面有一句话，“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条件下”；198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其后在党和国家重要会议文献中，多次重申和阐述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并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当承认，原来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方式曾经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依赖这套方式获得30年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然而转、调始终未能真正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技术进步达到新的高度、结构失衡也达到新的深度，旧有的发展方式的缺陷积聚起来，并日益明显的暴露出来，最终危及到经济的健康发展，走到再也持续不下去的地步。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的缺陷使发展变得不可持续。一是片面追求高速度，掩盖了经济发展为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宗旨。容易陷入为生产而生产、为发展而发展、以GDP论英雄等盲目追求产值产量的发展观。造成重复建设、重复生产、产能过剩和泡沫堆积日趋严重等缺陷，发展变得不可持续。二是盲目扩大产能，以过度投资刺激消费需求不可持续。在消费疲软状态下，以海量人、财、物投入，强行通过扩大生产力、创造新的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然后再以更大的投资去消耗过剩的产能，形成脱离居民消费的“体外循环”新模式。长期以来水泥、钢铁等产能严重过剩。1978与2014年比较，水泥由6524万吨增加到249207万吨，增长37.2倍，年平均增长10.6%；钢材由2208万吨，增加到112513万吨，增长50.0倍，年平均增长11.5%。^①如此过剩的产能怎样消耗？依靠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投向“铁公鸡（基）”——以高铁为主的铁路、以高速公路为主的公路、以城市基础设施为主的基本建设投资。结果有楼无人的“鬼城”大量涌现，高铁和高速公路运营大面积亏损，发展难以持续。三是外延粗放型经济片面追求规模扩张，质量和安全问题凸显。片面追求投资规模，片面追求产值产量，使“豆腐渣”工程不断涌现，安全事故隐患屡被暴光，发展质量不高凸显。城市建设摊大饼式向外扩张、向空中伸展，水、电、煤气等基础设施长期不配套，张显粗放式发展给效率、效益、资源、环境等带来的危害，违背技术进步和可持续发展原则。

其二，经济结构失衡，效益不高突出。以GDP论英雄和以投资为主旋律的经济发

^①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5》，第6、7、461页。

展，最容易引发部门、地方、企业争项目、争投资、争出口等的争夺战。只要有项目、有资金，或者能够引进外资、增加出口，什么样的工程都可以即刻上马、开工建设、迅速投产。长此以往，造成重投入、轻产出，重数量、轻质量，重引进、轻消化吸收，影响到经济结构和发展质量。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独大，三次产业结构失衡；第二产业中，满足基本建设基础设施需要的重化工业独大，其他产业相对不足和落后。在当前市场经济发育不完善、行业垄断、地方保护主义尚存条件下，经济结构失衡、比例关系不协调，最终也要影响到经济发展的速度。

其三，人口红利衰减，劳动成本推高。面对人口年龄结构步入“后黄金时代”，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时代已经结束，劳动成本推高和工资率上涨阶段由此开始。由于我国人口和劳动力规模异常庞大，在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年代，人口压迫生产力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工资率受到压抑，背后又有两三亿农民工做产业后备军，致使劳动力市场长期由买方主宰。劳动年龄人口在 2010 年占比达到刘易斯拐点、2013 年绝对数量达到峰值以后，转而呈下降和减少趋势，这为劳动力市场由买方主导向卖方主导创造了条件。近年来“用工荒”有蔓延的趋势，起到助推劳动力成本上涨的作用。从根本上说，这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关键所在，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人力资本积聚开辟道路。而对于特定时空经济增速而言，则不能不是一种负面作用力，使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投入驱动的经济的发展受阻。

其四，资源短缺瓶颈收紧，生态环境逼近上限。粗放型外延式发展方式，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低产出“二高二低”是突出的特点。其实，新中国成立以来粗放外延式发展方式便一直存在，“一五”时期好一些，其后由于“大跃进”“赶超”一类心态难平，而运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又是轻车熟路，致使这一发展方式和“二高二低”相互影响、交叉前行。单位产值能源和原材料消耗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而且长期高于世界总体水平，终因消耗过度而使资源约束瓶颈越收越紧，许多不得不依赖大量进口。以石油为例，1990 年生产 13830.6 万吨，进口 755.6 万吨，进口量：生产量 = 1.0: 18.3；2000 年生产 16300.0 万吨，进口 9748.5 万吨，进口量：生产量 = 1.0: 1.7；2014 年生产 21142.92 万吨，进口 30837.0 万吨，进口量：生产量 = 1.0: 0.7。即自产石油仅相当于进口数量的 68.6%，对外依赖程度过高显现。^① 其他如铁、铜等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进口数量之巨大、增速之迅速十分抢眼，木材等植物产品进口增长也很快，就连最丰富的煤炭也转变为净进口，资源稀缺性加剧超出人们预期。环境问题的严峻性也使国人越来越

^①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5》，第 6、7、372 页。

深刻地感受到。笔者的判断是：治理取得一定进展，但是恶化的趋势尚未全面刹住。空气、水、土、噪声等传统污染治理还没有取得根本性好转，以 PM2.5、臭氧为代表的新污染来势猛、量级高、持续时间长，治理任重而道远。值得注意的新特点，一是传统污染形成由城市、工矿区向城乡广阔区域推进，由工业化污染向生活污染扩展的态势。这种态势与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结合起来，构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污染范式，治理需要新的思路和策略。二是以 PM2.5、臭氧为代表包括电子辐射、光污染等在内的现代污染，人们的认识还很不够，对其危害和治理需要做出深层次的探索和努力。京津冀是 PM2.5 重灾区，人们羡慕“APEC 蓝”，然而那是京、津、冀加上晋、鲁、豫三省部分地区用烟囱不冒烟、工地不扬尘、汽车单双号行驶等换来的，不可持续。目前 PM2.5 频发蔓延已成气候，北起松花江南至珠江，东起东海之滨西到塔里木盆地，都程度不同地遭受过侵害，对经济和人口健康造成的影响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已有的传统污染积累有待消化治理，新的现代污染又不期而至，其对经济和整个社会发展的制约，正如 201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那样，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

其五，国际经济不景气，外贸出口受阻。近年来外贸出口持续下挫，对经济增长拉动变为负数。2015 年一季度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6.0%，出口增长 4.9%，形势有所好转。但是由于国际经济危机尚未结束，还存在着诸多变数；我国外贸体制改革、整肃自己内部的恶性竞争、调整出口结构等需要时日，一定期间内很难再现往日强势拉动经济增长的辉煌。

三、提速经济转型升级

人口“后黄金时代”遭遇经济新常态，发生经济中高速增长转变在情理之中。对于留恋过去经济高速增长论者来说，这种转变无疑是一副消蚀剂；对于新常态经济正常增长论者而言，则是多年梦寐以求转型升级的一种机遇。

（一）两种新常态

众所周知，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经历长达 20 年左右的超稳定增长期，形成某种常态化发展，这是后来提出“新常态”的背景参照。1997 年亚洲金融风暴骤起，10 年后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其后欧债危机跌宕蔓延，形成除中、印等新兴经济体外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危机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刻超出人们的预料，时至今日仍然复苏乏力。针对这种新情况，2004 年（美）罗杰·麦克纳米《新常态——大风险时代的无限可能》一书问世，称再也无法回到过去辉煌时期而步入一个无法预知的新常态时

代，新常态（New Normal）判断或概念由此而生。2010 年，（美）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穆罕默德·埃里安在“工业化国家新常态启航”演说中，对新常态做出多视角诠释，使新常态为更多人所接受，成为广泛传播的一个新概念。近年来的情况表明，全球经济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新常态还在延续。对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出新的预测数据（参见表 3），世界银行、英国共识公司等提供的数据大同小异，表明发达经济体并未走出衰退式新常态。

表 3 2012—2015 年世界经济增长率
 单位：%

	2012	2013	2014（预测数）	2015（预测数）
世界	3.4	3.3	3.3	3.5
发达国家	1.2	1.3	1.8	2.4
美国	2.3	2.2	2.4	3.6
欧元区	-0.7	-0.5	0.8	1.2
日本	1.5	1.5	0.1	0.6
发展中国家	5.1	4.7	4.4	4.3
印度	4.6	4.7	5.8	6.3
俄罗斯	3.4	1.3	0.6	-3.0
巴西	1.0	2.5	0.1	0.3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世界经济主要指标》，《全球化》2015 年第 2 期。

我国因体制不同、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而受影响较小等因素所决定，没有跟随落入此等新常态。但也不能不受到某种影响，投资、消费、出口受限等就是证明。经济增速连续下行，GDP 增长率由 2010 年 10.4%下降到目前 6.7%，年平均下降 0.62 个百分点。对此，2014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省时，首次提出经济新常态概念，并在其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做出进一步的阐释。学习习总书记讲话精神并结合两年多来的实践，笔者以为，我国经济新常态与以发达经济体为代表的经济新常态比较，有相似也有不同之处。相似是表象，不同是本质。否定相似之处和将两种新常态混为一谈均不可取，因为都不符合实际。

相似表象：前已叙及，都出现不同程度的经济下行，增速放缓、消费乏力、效益下降、结构失衡、产能过剩、贸易摩擦不断等。而且在信息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彼此之间的渗透和影响也在加深。否定相似表象并不可取，既不利于认识经济新常态带有一定的全球性质，也不利于吸取国际社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拒“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于

国门之外。

本质不同：其一，以发达经济体为代表的新常态，是长期不能从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阴影下解脱出来，反映经济长期萧条的一种理论概括。我国新常态，反映的是化解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矛盾积累的一种客观要求，是前进中速度适当放缓的新常态，与金融危机、经济危机风马牛不相及。其二，以发达经济体为代表的新常态，经济增长率常常跌落到接近零增长，有时甚至跌落到零以下。目前我国 6.5%~7.0% 的增长率属于中高速增长，即使按照阶梯式下行外推，也不会跌落到中速增长以下。其三，发达经济体为了应对危机式新常态，动量化宽松等一切可用的经济杠杆，从而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埋下隐患。我国除 2008 年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启动 4 万亿元投资阻止经济下滑外，基本上没有采取超强投资刺激手段，在保增长和稳增长中坚持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的方针，以消化高速增长中积累的矛盾。其四，发达经济体许多国家不顾 WTO 游戏规则，采取五花八门的贸易保护主义限制进口。我国则践行 WTO 规则和做出的承诺，积极倡导贸易自由、反对保护主义、以实际行动维护国际商贸秩序和推进经济全球化。由此可见，以发达经济体为代表的新常态是消极防御型，是长期处于危机、衰退状态的新常态；我国则是最近四五年方才出现，是下行幅度有限、以退为进、在转型升级中谋求创新发展的新常态。二者的区别可以形象地描述为：前者是顺着滑梯呈惯性式下滑，终因下滑速度快、持续时间过长而造成失速，落入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我国是阶梯式下行，顺应规律、自觉调整、深化改革、稳中求进，至今经济仍保持在中高速运行的新常态。

（二）新常态应有的经济增速

弄清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经济新常态的异同，特别是经济发展速度及其产生根源上的异同很重要，关系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全局。我国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是客观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但是放缓也要有一定的限度、遵循一定的节奏，需要寻求适合我国实际、有利于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速度。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讨这样的发展速度，已有国内外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供研判和借鉴。在国际方面，发达经济体再也无法回到 20 世纪 80、90 年代超稳定增长时期，而跌落到接近零增长超低增长状态，少数国家甚至跌落到负增长，陷入失速经济危机之中。我们不可步其后尘，同时也不能像拉美和亚洲一些国家那样，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我们承认、容忍新常态经济减速、下行是合乎规律的发展；但要清醒地意识到，经济可减速而不可失速，既不能落入如发达经济体经济危机式失速状态，也不能落入像某些发展中国家那样长期挣扎于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在国内方面，自 2011 年经济连续下行以来，一是这样的下行并没有对整体经济运行造成大的伤害，GDP 增长率下行、增长量却有增无减。如 GDP 增长率 2014 比 2013 年下降 0.3 个百分点，增长量却增加 1.7 万亿元；该年新增就业 1322 万人，就业率稳中有升；转方式、调结构取得新进展，经济发展可持续性增强；经济发展质量有所提高，研发能力显著提升等。^① 现在的问题是，6.7% 的经济增长率仍然存在下行的压力，还有没有继续下行的空间，更长远一些时间的新常态增长率在哪里？对此，需要做出深入一步的研判并要由实践做出检验。

容忍经济减速而不容忍失速，是对待新常态经济增速的一条基本准则。为此，就要确定不失速的发展速度在哪里、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目前发达经济体 2% 左右的经济增长率可以说是集体失速，要不得。失速的直接后果，有的国家、有的地方如同飞机发生失速一样，最后难逃坠毁的命运。美国底特律市政府资不抵债，只能宣布政府破产；希腊深陷债务危机，多年笼罩在经济危机阴影之下。目前阶段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增长速度？首先要确认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由什么因素来决定。速度的确定牵涉到经济发展目标、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就业、投资、消费、出口等诸多因素，以往主要由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动力大小决定。新常态下要通过转方式、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实现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转变的广度和深度对发展速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全面地看待这种转变，前期旧的要素驱动可能还比较强、创新驱动可能比较弱；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改革的不断深入，要素驱动将由强转弱，创新驱动将由弱变强，后期创新驱动将成为经济发展主要的驱动力。因此，我们既需要对创新驱动能够达到的程度做出实事求是的估量，也需要从实际出发，特别是针对转方式、调结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充分合理就业等改革，对未来经济发展速度做出合理的研判。主要是满足以下三个方面的诉求：

一为转方式、调结构应有的经济增长速度。汽车司机都知道，行车转弯时要减速、换挡、轻踩或不踩油门，车速太快时还要采取点刹车等措施，以合理控制车速，安全顺利通过弯道。经济发展也相类似。实现由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粗放外延式发展向低投入、低消耗、高产出、高效益集约内涵式发展转变，继续保持过去高速、超高速增长是无法做到的。之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二、三十年以来收效甚微，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经济增速降不下来，转方式受到保增长、保就业压制而不得施展。2011 年以来经济增速逐步降了下来，从而为转方式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然而下行压力的继续存

^①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4》，第 4、5、12 页。

在表明，目前 6.7%的经济增速下行还不够，转方式给出比较明确的信号，中高速——中速增长可能是比较适当的。

调结构情形也大同小异。当前，即使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是为了保住已经下移的增长速度，产能过剩仍然难以消退，高耗低效的落后产业仍然难以淘汰出局，因而相应的产业结构难以改变。在三次产业结构中，虽然近几年第三产业上升速度有所加快，并且占比已经居于首位；但是第二产业强劲态势仍在，产业结构不合理并非短期内所能改变。至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内部的结构问题更多一些，重化工业、一般制造业、低端服务业占比过高的状况，转变需要较长时间。这说明，固然经济增长失速需要防备，不能重蹈发达经济体覆辙；但是调结构要求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没有达到，由中高速向中速增长过渡可能是必要的和必需的。

二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有的经济增长速度。以 2014 年 GDP 636138.7 亿元、人口 135782 万、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比价 6.12:1.00 作基期，则 2020、2025 年低、中、高三种经济增长预测情况，如表 4 所示：

表 4 2020、2025 年人口经济增长预测

方 案	GDP（RMB 万亿）	人均（元）	GDP（U\$ 万亿）	人均（U\$）
2020 年				
低方案（4.0%）	80.5	55748	13.15	9109.1
中方案（5.5%）	87.7	60730	14.33	9923.9
高方案（7.0%）	95.5	66099	15.60	10806.5
2025 年				
低方案（4.0%）	97.91	67062	16.00	10957.8
中方案（5.5%）	114.61	78502	18.73	12826.8
高方案（7.0%）	133.87	91691	21.87	14982.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5》。

目前，对于中等收入与高收入的界定尚存异议，以人均 GDP 8000 美元、10000 美元、11000 美元为界划定不等。考虑到数年后社会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等情况，以世界银行提出的人均 GDP 11000 美元可能更合适一些。如此，以 GDP 年均增长 4.0%的低方案预测，2025 年人均 GDP 可达 10958 美元，临近走出中等收入、跨进高收入门槛；GDP 年均增长 5.5%的中方案，2023 年人均 GDP 可达 11556 美元，进入高收入行列；GDP 年

均增长 7.0% 的高方案，2021 年人均 GDP 可达到 11516 美元，比低方案提前 4 年、比中方案提前 2 年进入高收入阶段。可见，未来 10 年尤其是前 6 年经济发展速度至关重要。即使是低方案的稳定增长，“十四五”结束也可基本上走出中等收入陷阱；中方案“十四五”中期走出，高方案“十三五”结束则可基本上实现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跨越。只要未来经济能够保持稳定的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尽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不过低方案与高方案比较耗时相差较大，低比高耗时增加 1 倍。争取 7.0% 的高位预测，确保不低于 5.5% 的中位预测，应是可能和比较现实的。

三为比较充分就业应有的经济增长速度。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速与就业率之间的关系表明，GDP 增长 1 个百分点可带动 130 多万人就业，城镇登记失业率可下降 0.5 个百分点左右。2014 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4.09%，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2015 年控制在 4.5% 以内，故 GDP 增速可有 1.0 个百分点下调空间，维持在 6.4% 以上即可保持失业率不超过 4.5%。如果将失业率 5.0% 作为经济运行的底线，则 GDP 增长率存在 2 个百分点的下调余地，维持在 5.4% 以上当无忧虑，与中方案预测相吻合。跌破此警戒线，失业率升至 5.0% 以上、GDP 增长率下跌到 5.4% 以下，则会加大经济运行风险并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是不可取的。

（三）提速经济转型升级

上述情况表明，未来 10 多年经济中高速——中速增长，是经济运行可以接受的合理区间。它能够满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失业率保持在可控水平的要求，并且能为转方式、调结构提供较为宽松和良好的经济生态环境。应当把握这一历史性机遇，加速推进新常态经济转型升级改革。要总结 2008 年 4 万亿投资的经验教训，这一剂猛药投下去，经济增速倒是保住了，然而失去了进行技术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转型升级的良机，给其后的发展带来不少负面影响。相反，处在次贷危机本土的美国，大力提升发展的科技含量，不仅发展速度没有大幅度落下来，而且为后来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和潜力。“风物长宜放远量”，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一次人口“后黄金时代”提供的处在衰减状态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劳动年龄人口越过峰值、就业压力逐步减轻的窗口期，下决心将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进行下去，圆梦经济转型升级。为此，提出“以速度换效益”行动口号：宁肯牺牲一点儿速度，也要换取效益卓有成效地提升，让经济转型升级落地。办法是依靠改革，大力推进和深化改革，尤其是以下三方面的改革。

一是推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2013 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

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① 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改革之所以进展迟缓，前已论及，重要的一条是吊在了发展速度上。发展速度直接关系到各级政府的政绩，因而政府干预过多、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不够也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超常规投资刺激经济增长时有发生，城大市小、有城无市的城市化摊大饼式蔓延，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侵害正常的经济运转屡见不鲜等，张显政府身兼导演和演员双重角色特征。出路在于改革，政府从不当的干预中退出，建立起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

二是推进为经济中高速——中速增长松绑的改革。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饱受侵略、压迫和剥削，期望国家尽快富强起来的愿望异常强烈，因而从上到下对经济增长速度情有独钟，产生很强的速度偏好。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50年代曾经出现“大跃进”“超英”“赶美”一类口号和建设热潮；70年代粉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又出现建设十来个大庆、十来个商品粮基地等大干快上“洋跃进”，速度偏好伴随着变化了的环境再现出来；改革开放以来速度冲动也时有发生，只是冲动变小且纠正较为及时一些而已。如今经济进入新常态，这样的冲动是否就销声匿迹了呢？恐怕钟情高速度、不愿意接受速度下行的言行还不时有所表现。高速度之所以成为人们的一种偏好，除了认识情结方面的原因以外，还有着现实的原因。主要的，一是政府主导的原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强势政府相结合，政府将主要精力用于经济建设，形成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范式。即使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基本到位，政府主导还是时隐时现地表现出来；二是社会评价方面的原因。评价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才能和政绩，常常把经济搞上去与否视为最重要的一条，也是决定升迁权重最大的条件。因此，提速经济转型升级、为经济中高速——中速增长松绑，去除速度偏好、扬弃以GDP论英雄发展观十分重要。必须在转变理论、认识和社会舆论同时，改革对干部的评价机制和考核机制。建立起集德、勤、政、绩于一体全面的评价和考核体系，政绩的考核更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淡化GDP增长的权重。

三是推进增强人力资本积聚的改革。随着边际投资效益下降、劳动年龄人口越过峰值，以“海量投资+海量劳动力”投入为特征的外延式经济增长方式走到尽头，取而代之的当是“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创新驱动新时代的来临。人力资本是人所具有的知识、

^①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改革开放以来历届三中全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78页。

技能、经验和健康具有的价值。对劳动力而言，关键是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调整好结构。提高劳动者素质，包括提高劳动者健康体能素质，要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体育等事业；提高科教智能素质，加快教育、科技体制改革是关键，重点在打破应试式科教体制，倡导以劳动力数量换劳动力素质、提高人力资本积聚；提高法治、道德、价值观等素养文明素质，需要加强现代文明建设，贯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国、从严治党战略部署。调整劳动力人才结构，也是创新驱动和经济适度增长的保证。为避免劳动年龄人口过度高龄化而削弱经济发展活力，适时调整人口生育政策、适当调整人口出生率、使劳动年龄人口年龄结构等保持在合理状态，是保持经济合理健康发展的固本强基之策。劳动力城乡结构变动与城市化密切相关，合理掌控劳动力农转非和城乡分布结构变动的速度和节奏，则是推进劳动力以数量换结构、新常态经济减速而不失速的重要环节，其功能和作用不可替代。

参考文献：

1.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2. 田雪原：《后人口转变迎来新改革机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
3. 刘伟、苏剑：《“新常态”下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选择》，《经济科学》2014 年第 4 期。
4. 许宪春：《2014 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 2015 年展望》，《全球化》2015 年第 3 期。
5. 林毅夫：《7%的增长速度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光明日报》2015 年 3 月 25 日。
6. 范鸿达：《中国：行将崛起还是面临崩溃？》，《国外社会科学》2015 年第 2 期。

责任编辑：沈家文

积极稳步推进中国制造业 国际产能合作^{*}

李文锋 李志鹏

摘要：经过近 4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制造业形成了较强的国际竞争能力，进入对外直接投资的快车道，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恰逢其时。当前中国制造业国际产能合作的主要问题是，企业组织化程度低、产业配套滞后、国外法律限制和标准壁垒，企业利用专业资源降低投资风险意识不足。推动制造业国际产能合作可持续发展，要加强规划，突出重点，推进重大项目合作，防止无序竞争；因企制宜，相机抉择，延伸国际产能合作产业链；发挥好各类国际经贸平台的拉动作用；履行社会责任。

关键词：制造业 对外直接投资 国际产能合作

作者简介：李文锋，中国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

李志鹏，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当前全球产业结构加速调整，基础设施建设方兴未艾，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国际产能合作潜力巨大。经过近 40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制造业基础厚实、产业配套能力强，在国际市场形成了较强的竞争能力，近年来已进入对外直接投资的快车道，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恰逢其时。作为新兴发展中大国，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符合国际投资的一般性特征，具有跨国经营的共性优势，但也有在

^{*} 本文为 2015—2016 年度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基金课题《“十三五”时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研究》阶段性成果。

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参与度不高，供应链运营管理能力相对较弱等问题。为此，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既要积极稳健、扬长避短、发挥自身的产能优势、通过在全球范围实现要素的优化配置，又要克服自身局限、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运营经验、形成互补效应，逐步提高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实现对外产能合作的稳健可持续发展。

一、中国制造业国际产能合作主要特点

（一）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制造业国际产能合作的主要形式

境外投资办厂，实现将境内产能转移到境外和境内关联设备制造业产能利用率提升，是这一形式基本特征。就本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而言，如果投资过程是在境外建造企业主业领域的制造场所，则实现生产能力转移到境外；如果投资过程使用了本国国内原来的二手或废旧设备，则意味着本国国内原来的闲置产能得以转移到境外；如果使用本国国内新生产设备在境外投资，意味着新增产能转移。从 2011 年到 2015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由 746.5 亿美元增加至 1275.6 亿美元，年均增长 13.1%， “十二五” 期间合计 5200 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由 “十一五” 期末的 3172.1 亿美元增加至 2015 年末的约 10100 亿美元。2015 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1180.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7%；其中流向装备制造业的投资为 70.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4.2%，占制造业对外投资的 49.1%，占同期总投资额的 6%。2016 年 1—9 月，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 1342.2 亿美元，同比增长 53.7%；流向制造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243.9 亿美元，增长 168.1%，占 18.2%，其中流向装备制造业 150.6 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 3.5 倍，占制造业对外投资的 61.7%。2014 年、2015 年连续两年中国对外投资金额位居世界第三位，中国作为全球对外投资大国的地位进一步确立。

跨国并购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方式。近年来，中国制造业企业通过并购方式进行产能合作的案例明显增加，成为企业主动获取海外优质资源的重要途径。并购项目投资总额由 2011 年的 272 亿美元增长至 2015 年的 338 亿美元。以汽车产业为例，截至 2015 年 9 月，中国汽车及其零部件制造业企业海外并购案件在 50 起左右。从国内并购主体上看，大部分都发生在浙江，例如，浙江青年乘用车集团有限公司收购瑞典萨博汽车开发公司、浙江吉利并购瑞典沃尔沃等等。随着中国国内汽车市场的持续火爆，部分有实力的汽车及其零部件企业仍然将对利用海外并购方式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保持较高热情。近几年，船舶、通讯等制造业一些企业抓住机遇，收购、兼并海外设计研究公司和品牌，也取得一定成绩。

（二）民营企业成为中国制造业国际产能合作的生力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成长快、外向型程度高，尤其是近年来，民营企业积极扩大海外投资，发挥自身优势，利用自有品牌、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营销渠道，进行全球采购、生产、销售，成为制造业对外投资，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生力军。根据2004年至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从2003年到2009年，62.2%的企业数量和64%的投资额由民营企业贡献。截至2013年底，民营企业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45%，且保持上升趋势。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有量的增长，也有质的提升。比如，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境外建立研发中心、设计中心，或通过并购、合资等方式开展境外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业投资合作，不断向产业价值链高端迈进，有效促进了国内传统产业产能对外转移。

（三）境外经贸园区成为中国制造业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

境外经贸园区是指由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设立和开发经济贸易园区，主要吸引中国企业入驻。目前，除了通过资质论证，成为获得中国政府政策支持的境外经贸园区之外，还有部分企业投资的园区。境外经贸园区鼓励企业集群式入驻，通过精细化分工，使每个入驻企业专注于产业链上各自擅长的一环，团队合作，合理分配，最大限度利用各类资源，形成产业配套和集聚效应。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在境外形成了一批基础设施完备、主导产业明确、公共服务功能健全、具有聚集和辐射效应的产业聚集园区，成为国际产能与装备制造合作的有效平台。截至2015年底，中国企业境外在建的国家级合作区75个，累计投资额181.8亿美元，吸引入区企业1154家，累计创造总产值419.7亿美元。在建75个合作区中，有一半以上是与国际产能合作相关的加工类项目，主导产业涉及有色、轻纺、服装、汽配、建材、家电等优势产业。以光伏产业为例，通过在海外设立光伏产业工业园，联合国内光伏产业链各环节有优势的企业，集群式入驻园区进行产品生产，有效实现了国内产能的对外转移。中国纺织制造业天虹、申州等龙头企业在越南兴建产业园，带动了纺纱、织布、染整、绣花、裁剪等配套产业的产能转移与合作。

（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成为中国制造业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东道国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着力于与沿线国家实现互联互通，共商、共建、共享发展成果，受到沿线国家的普遍欢迎。目前，中国已与“一带一路”沿线11个国家签署了自贸区协定，与56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制造业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提供了制度保障。中国制造业界普遍看好与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的前景。根据《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投资占当年流量总额的 13%，达 189.3 亿美元，同比增长 38.6%，是全球投资增幅的 2 倍。2015 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 83.9% 分布在发展中经济体，在发达经济体的存量占比为 14%，另有 2.1% 存量在转型经济体。当前，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开展跨国产能合作的产业，既有以轻工、家电、纺织服装为主的传统优势产业，也有以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为主的富余产能优势产业，还有以电力设备、工程机械、通信设备、高铁和轨道交通为主的装备制造优势产业。

（五）重点制造业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发展不平衡

中国重点制造业国际竞争能力强弱不一，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广度和深度不一，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基础与条件存在较大差异。总体来看，中国工业制成品制造企业海外投资办厂业绩，消费品制造企业要好于投资品制造企业。中国钢铁行业对外投资合作主要集中在越南、印尼、俄罗斯等 22 个国家，境外设立企业或分支机构约 200 家，多数企业集中在上游环节，一批龙头企业已在海外铁矿石资源丰富地区建立了资源基地，中游冶炼环节和下游深加工环节投资相对较少。在通信设备制造业，已超过 300 家企业在海外开展各种投资活动，主要以设立研发、营销、培训机构为主，对消化产能过剩有重大贡献的境外制造企业相对较少。中国船舶企业大都从事国际海上船舶运输及相关船舶代理、船舶修造、船舶居间买卖服务等，受制于国际产能过剩、国内成本相对较低等因素，对外直接投资建设修造船厂的时机、条件尚不成熟。相比之下，中国水泥行业利用出口、承包工程和对外投资多条腿走路方式，带动了水泥、水泥设备产能的全球转移，并且使得中国水泥制造技术不断迈上新台阶。

（六）市场因素成为中国制造业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动因

中国制造业对外投资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动因是多方面的，经济层面往往兼有生产成本、技术、资源、市场、汇率预期、贸易壁垒等多种因素的考量。根据对若干制造行业的考察分析，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受国内外需求不振、贸易下滑的影响，通过对外投资拓展境外市场，成为许多制造业企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动因。以水泥行业为例，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坦桑尼亚、赞比亚、布基纳法索、南非等非洲国家的水泥消费量大，老挝、越南、缅甸、蒙古等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旺盛，自身产能难以满足需求，中国企业对这些国家投资力度较大。截至 2015 年底，中国水泥企业在境外投资设立的企业大约 100 家左右，主要分布在东南亚、中亚、非洲等 34 个国家（地区）。光伏产业中，中国生产的光伏组件 95% 销往海外。一些国家政府出于振兴经济的考虑，纷纷要求中国光伏企业在当地建厂。为扩大销量，不少中国光伏组件企业开始在

海外投建新工厂，投资遍布多个国家和地区。截至 2015 年底，中国光伏企业已有超过 100 家在海外设立有办事机构和制造厂，其中在德国的企业最多，占比达到 20% 以上。

二、中国制造业国际产能合作的主要问题

（一）部分产业存在全球性产能过剩

由于产业发展阶段和全球市场需求等因素，各产业推进国际产能合作面临不同条件。对部分产业而言，盲目利用国际市场甚至可能加剧过剩。以钢铁行业为例，当前，全球钢铁行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欧洲、亚洲及北美等地区的钢厂均举步维艰。根据国际钢协发布的数据，2015 年全球钢铁需求为 15.1 亿吨，同比下降 1.7%。据法国经济研究所 2013 年发布的《全球钢铁产业研究报告》，2013 年世界钢铁产量 15 亿吨，过剩的产能将近 3.3 亿吨。在 2013 年全球产能中，中国占 48.6%。从 2006 年到 2013 年，全球钢铁产量增长了 25%，而中国则增长了 75%。在新兴国家中，印度产量增长了 60%，巴西增长了 10%，俄罗斯减少了 2%。在这种背景下，全球都面临化解钢铁过剩产能的问题，并且预计不会很快发生转向。从船舶业看，根据中国船舶工业协会的调研，目前全球造船产能为 6120 万 CGT（修正总吨，由船舶货物总量乘以船舶类型系数得出），中日韩三大造船国产能占全球 90%。从 2013 年到 2015 年，船舶全球年均成交量超过 3200 万 CGT，全球产能过剩将超过 50%，船舶企业普遍面临订单不足的局面。受国际市场产能普遍过剩，价格波动、市场需求等因素影响，制造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要在短期内实现明显盈利，还存在较大压力。

（二）部分产业企业竞争力相对不足

中国制造业的许多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中高端环节难以与国际先进跨国公司匹敌，关键技术、设备及零部件对外依赖程度高，经营绩效受到制约。以多晶硅行业为例，中国在产能、产量方面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多晶硅生产国，但企业普遍竞争能力不足，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目前中国光伏企业产能在 3000 吨/年（含 3000 吨/年）以内的企业数量约占 60%，产能占比 18%；5000 吨/年以上的企业数量约占 20%，产能占比 70%。中国多晶硅企业仍以小企业为主。近年来中国多晶硅产业技术进步十分明显，产品价格也有所下降，但即使是这样，仍难以和发达国家企业相抗衡。在钢铁行业，由于境外投资门槛较高、资金需求较大，企业走出去进行国际产能合作的能力较弱。如用海外销售收入比重、海外资产比重和海外子公司比重三个指标衡量，中国钢铁企业国际化水平远低于卢森堡安赛乐米塔尔、印度塔塔钢铁等跨国公司。在智能制造领域，美国谷歌、IBM、微软

等企业正在开辟机器人新时代，而且布局已经基本完成。而中国目前还处在谋求伺服电机、控制器、减速器领域的自主化。比之外企，国内企业要以高出近四倍的价格购买减速器，以近两倍的价格购买伺服驱动器。

（三）企业组织化水平相对较低

提高国际产能合作的效率和效益，必须树立全球供应链管理思维，根据各产业、业态发展规律及特征，培育全球经济分工条件下的供应链管理模式，增强企业的运营管理能力 and 组织化水平。这是制造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必须迈过的坎。当前中国企业组织化水平还远远不能适应在境外开展产能合作的需要。一是从发展阶段看，中国企业成长过程中整体组织化水平仍然较低，运营管理经验等先天不足，提升产业组织化水平和管理运营能力需要有一个爬坡追赶的过程。二是从环境适应性看，海外运营环境复杂多变，部分国家依然存在政治壁垒，各国法律环境差异较大，合法经营要求高，但部分企业国际产能合作中不能做到充分了解并严格遵守东道国的各项法律规定，合法经营，注意法律风险，常常形成错误一犯再犯。三是从行业经营秩序看，部分行业在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过程中，企业同质竞争、无序竞争现象仍然存在。企业“一窝蜂”式的无序化对外投资，势必造成经营风险增加。境外经营秩序仍需进一步规范。

（四）产业配套服务滞后

从国际投资合作的普遍规律看，企业对外投资应该根据东道国的资源禀赋、配套能力、市场条件等因素，合理布局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方向和重点。由于中国制造业存在产业配套能力较弱的短板，大大制约了中国制造业的对外产能合作。中国钢铁、水泥、平板玻璃、轻纺等传统制造业和优势产业，在境外产业链延伸不够，国际产能合作项目普遍存在配套基础设施投资大、运距长、建设成本高、采选成本高等因素影响，项目成本普遍偏高，竞争优势较弱。在一些国家，基础设施薄弱，道路设施落后，电力设施等缺乏应有维护，严重影响企业在当地正常生产运营。

（五）工业标准和商业规则不衔接

具体表现在：一是产能合作标准不对接。一些国家长期执行欧洲标准，特别是电力、石油炼化、交通运输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已经形成固定渠道来源的欧洲技术标准体系。二是市场差异明显。一些国家推行大型投资项目多采取企业为主、市场运作模式，政府财政有限，不愿借债，较少介入项目运营。三是合作领域有限制。部分发展中国家为保护本国产业而对外资做出一定的限制。如巴西要求风电设备及其他电力设备中的 60%

需要在本地生产；在本国市场销售的汽车，其配件国产率必须达 65%以上。四是产能合作合同不规范。有些东道国不使用国际上通行的 FIDIC（《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条款，发包企业制定合同随意性大，增加我企业执行合同的风险。

（六）履行社会责任不够

履行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不仅有利于化解中国制造业企业在产能国际合作中面临的各种矛盾，而且关系到中国企业能否以负责任的形象立足于全球经济舞台，在东道国获得可持续发展。随着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开展，东道国的社会责任意识越来越强，不履行社会责任不仅影响企业社会声誉，而且可能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甚至可能被逐出市场。总体来看，由于中国制造业产能国际合作企业在国内大多已是行业龙头企业，相对于其他多数更小规模企业的投资合作，其在海外的经营总体上较为规范，不少制造业企业已成为产能国际合作中履行社会责任的典范。但相对于国际标杆企业还存在一定差距。比如，全球企业中有超过半数面向全球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而反观主要从事境外产能合作的中国企业，则仅有少数发布企业海外社会责任报告。中国一些制造业企业在产能国际合作中对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习惯性将国内许多不合理的做法应用于跨国经营中，比如，不谨慎地大规模裁员。

（七）专业中介资源支持不够

经验表明，产能国际合作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少不了专业机构的协助。在企业进行海外拓展的过程中，专业咨询机构的提示和引导在事前、事中、事后都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关键作用。利用这些专业机构可以提高效率，少走弯路，有助于项目科学规范的进行。目前中国制造业企业国际产能合作过程中运用外部专业资源的能力并不强。一是运用政府公共信息服务及运用投资银行、律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意识不够。政府有关部门提供了大量针对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合作公共信息服务，但制造业企业“走出去”知道和善用这一武器的企业并不多。多数企业更不擅长使用会所、律师等专业服务业机构。外部聘请人才使用问题始终是困扰企业的难题。企业在产能国际合作过程中，缺少精通东道国语言文化、风俗习惯、法律法规和人文精神，能够在企业与社区之间开展跨文化交流的外交型专业人才；缺少具备全球视野、掌握国际惯例和相关专业标准规范，能够深邃洞察企业海外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机遇从而趋利避害的领军型人才；缺少懂国际法体系和国际财务运作的商务型人才；缺少能够以最人性化的方式管理企业并使企业自身效益最大化管理的精英；缺少国际制造业方面阅历丰富的专家型人才。

三、促进中国制造业国际产能合作的对策

（一）统筹协调，突出重点，有序合作

研究制定重点领域和产业的国际合作规划，有序推进重点产业合作。根据目前中国在所在国别投资合作的情况，筛选和确定条件成熟、经济和社会效益好、对方关注度高的重点项目进行重点推动，发挥重大项目在产能合作中带动装备、技术、服务出口和实现产能转移的引领和示范效应。受制于全球市场，部分产业利用对外投资合作大规模地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将面临较大压力，必须坚持科学分类对待，不可不顾实际情况强行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等机构的自律和监管作用，防止无序竞争，规范经营秩序。

（二）因业制宜，针对不同行业采取相应策略

对那些国内企业竞争力明显不如发达国家，低端产能过剩严重，由此导致进口额大幅超过出口额的产品，如多晶硅、轿车等，应该将工作重心放在提升国内产业和企业素质上。对那些全球市场占有率相对较高的消费品，如家电、电信设备、纺织服装等，应引导企业同时充分发掘国内中西部、国外发展中经济体的建厂机会，继续提升本企业品牌产品的全球市场占有率。对全球产能过剩相对严重，但本国出口市场占有率目前已达到较高水平的生产资料产业，如造船、钢铁、铝锭等，应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由企业自主审慎决策，避免同类项目投资扎堆。比如，根据市场需求导向，鼓励国内钢铁企业到钢铁需求量比较大的国家，通过投资设厂或并购重组建立钢铁生产基地，重点发展中游的钢铁冶炼和下游的深加工环节，并以对外承包工程为依托向工程建设等钢铁应用领域拓展。对通讯设备制造等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鼓励其将非核心生产环节布局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进中国制造标准体系和系统的应用普及。对船舶工业、高端数控机床等相对劣势行业，国际产能合作的重点工作依旧是以获得技术、品牌、人才资源，提高营销水平，通过自建、并购、合资、合作等多种方式，在海外布局设立研发中心、建立营销维修网络等。

（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拓展制造业国际合作链条

着力区域链，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合作、能源开发合作和产能合作，既实现向沿线国家有序转移部分制造业产能，深化中国与重点国家的国际产能合作，又有助于降低国内相关行业的资源密集度实现集约式发展。延伸产业链，通过跨境并购、参股和合作等方式，获取知名品牌、营销网络和先进技术，在海外设立

或并购研发中心，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提升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供应链，指导国有企业加快对外投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合作，提升竞争实力、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努力向价值链高端环节转移，带动装备、技术、标准和服务“走出去”。以支持装备制造走出去为重点，鼓励企业提升跟随性服务水平，在境外设立加工组装、境外分销、售后服务基地和全球维修体系，带动装备和服务向外输出。

（四）整合资源，发挥好各类国际经贸平台的促进作用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引导国际经贸平台有序、健康发展。加快拓展多双边产能合作机制，积极与发达国家合作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同时推动与有条件、有意愿的国家共建新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积极建设以钢铁、建材、化工、轻纺、汽车、通信、工程机械等产业的加工制造园区。加大财税支持力度，通过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优惠贷款、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等政策手段，重点支持先进制造业和优势行业的对外投资合作。建立企业、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商协会等共同参与的统筹协调和对接机制，为各类经贸平台建设提供融资支持。

（五）履行社会责任，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可持续发展

中国制造业企业要成功“走出去”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就既要合格的中国企业公民，更要做合格的全球企业公民，遵循更高标准的 CSR（企业社会责任）规则。从政府层面看，要加强与国际 CSR 机构的交流合作，遵循国际规范和惯例，在完善企业社会责任法规之外，制定相应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指导原则和行为指南，帮助国内企业不断向国际标准靠拢。完善法律法规，对企业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范围、权利，以及企业不履行社会责任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给出明确的规定。从企业层面看，中国制造业企业国际产能合作推进到哪里，企业的社会责任就应该延伸到哪里。制造业企业必须考虑到东道国政府和民众的关切点，在为中国、为企业自身谋利益、谋发展的同时，要保护好当地的自然环境，尊重东道国人民的风俗习惯，提供就业机会，帮助消除贫困，促进教育和卫生事业发展，将商业活动和企业社会责任有机结合起来，树立中国企业的良好形象。

（六）完善体制机制，维护中国制造业海外权益

进一步完善境外投资保险制度，实行差别的境外投资保险政策，加强对企业境外投资的国别行业指引，优化中国国际产能合作的国别地区分布、产业分布和行业分布。对不同的投资国，甚至同一投资国的不同行业，实行不同的境外投资保险政策。落实政府间保障机制，加强安全风险预警和突发事件处置。更好发挥领事保护作用。进一步完善

领事保护信息共享机制，及时公布投资旅行指南等常态信息、危机信息，适时公布警告信息等。加强国际投资协调，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签署自贸区、投资合作、投资保护、税收等协议，运用双边、多边协议与公约，保护对外投资合作利益等。中国已缔结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有些已经不再适应现阶段国际投资的发展实际，未来应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关于代位求偿权的有关规定，进一步规范解决投资争议的程序性规定。中国目前已经签订 123 个投资保护协定，在与资本输入国签订、修改投资保护协定时，应充分利用双边投资担保协定这一平台，逐步规定、补充和完善关于代位求偿权、解决投资争议的程序性规定，使得代位求偿权由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加以确认，具有国际法效力的保证，以确保中国代位求偿权的顺利实现。

参考文献：

1.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4 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5 年版
2. 商务部：《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报告 2015》，<http://www.mofcom.gov.cn>。
3. 金碚：《世界分工体系中的中国制造业》，《中国工业经济》2003 年第 5 期
4. 王志乐：《2012 走向世界的中国跨国公司》，中国经济出版社 2012 年版。
5. 李文锋：《寻找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切入点》，《国际经济合作》1999 年第 11 期。
6. 李文锋：《中国跨国公司现状、问题及对策》，《改革》2001 年第 5 期。
7. 李志鹏、徐强、闫实强：《利用国际市场调节富余产能的效果和策略分析》，《宏观经济研究》2015 年第 6 期。
8. 邢厚媛、李志鹏：《走出去营造新优势》，中国商务出版社 2011 年版。
9. 黄益平、何帆、张永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10. 王晓红、李自杰、李耀辉：《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回顾与展望》，《国际贸易》2008 年第 9 期。
11. 李自杰、高璆峻：《双元并进战略选择：行为逻辑与路径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16 年第 7 期。
12.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企业国际化蓝皮书——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
13. 王碧珺、王永中：《中国对外投资季度报告（2015 年第 4 季度及全年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责任编辑：沈家文

“一带一路”对接澳大利亚 “北部大开发”投融资合作研究

孟 刚

摘要：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与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计划的对接，是中澳两国政府的合作热点，也是南太平洋地区的重要经济合作。本文深入分析了设施联通、能源资源、农业、产业园区等“一带一路”和“北部大开发”对接的重点建设领域，详述了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计划的简化土地政策、开发水资源、促进跨境经贸投资合作、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加强共同治理结构的主要内容，探讨了开发性金融支持两大战略对接的思路与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 北部大开发 开发性金融 经济合作

作者简介：孟刚，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市分行澳大利亚工作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一、两大战略对接是南太平洋地区的重要经济合作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欧洲，二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2014 年 11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澳大利亚国会发表《携手追寻中澳发展梦想，并肩实现地区繁荣稳定》的重要演讲，指出南太平洋地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自然延伸，对澳大利亚参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持开放态度，表示中方将支持澳大利亚实施“北部大开发”计划，双方要巩固能源资源等传统强项合作，加快培育基础设施建设、农

业等新的合作增长点，实现两国经贸关系多元化。这为“一带一路”建设和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计划的对接指明了方向。

澳大利亚对南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具有重要影响力，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和中国经济契合度高，合作基础扎实，合作意愿强烈。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双边关系已经从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14 年 6 月，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外发布绿皮书，宣布了“北部大开发”计划。2015 年 6 月，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正式公布了《我们的北部 我们的未来——发展澳大利亚北部构想》白皮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北部大开发”计划，提出了未来 20 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发展的愿景和蓝图。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的区域包括西澳大利亚州和昆士兰州的南回归线以上的北部地区以及北领地全境，面积为 300 万平方公里左右，约占澳大利亚总面积的 40%，人口 120 万人左右，约占澳大利亚人口总数的 5%。根据 2012—2013 年的统计，澳大利亚出口有 55% 是从北部地区通过港口海路运输出境。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能矿资源丰富，农业潜力巨大，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强劲，离中国等亚洲国家地理位置最近，特别是达尔文港等几个主要港口是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南太平洋地区的门户。

2015 年 8 月，中澳第二轮战略经济对话在堪培拉举行，双方达成共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能合作与澳大利亚的“北部大开发”计划和国际基础设施发展计划有许多共同点，要通过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接进一步提升合作的领域和层次。2016 年 2 月，中澳两国外长共见记者时表示，将促进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将重点推动中方“一带一路”倡议与澳方“北部大开发”计划对接。2016 年 4 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时再次重申，希望双方做好中方“一带一路”倡议同澳方“北部大开发”计划、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同澳方“国家创新与科学议程”的对接，实施好中澳自由贸易协定，探讨开展更多务实合作项目。可以预见，中国政府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和澳大利亚政府自身的重点发展规划对接的最佳会合点将在澳大利亚北部地区，“一带一路”建设对接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计划无疑将成为南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标志性合作内容之一。

二、“一带一路”和“北部大开发”对接的重点合作领域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自由化、便利化及一体化，带动沿线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发展，在全球范围内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实现互利共赢的战略目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际产业链的分工合作，可以增强中资企业在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农业等领域的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能力，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具有巨大推动作用。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优先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金融合作和机制平台建设，以政策沟通、设施

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加强沿线国家区域经贸合作。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将农业食品、能源矿产、旅游度假、海外教育、医疗养老等作为将来支撑北部发展的五大支柱产业，并强调加大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是落实“北部大开发”计划的前提和重中之重。在“一带一路”战略对接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计划方面，可以重点关注以下几个合作领域。

（一）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一带一路”战略倡导国家间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合作，抓住交通基础设施的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共同推进港口等国际骨干通道建设，实现国际运输便利化。澳大利亚北部地区由于人口分布较少，基础设施发展相对薄弱。澳大利亚政府在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管线等基础设施领域主要发挥制定规划、落实政策、推介投资等宏观管理职能，不直接参与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和建设。为了推动落实“北部大开发”计划，2014 年澳大利亚政府打破惯例，专门设立了总额 50 亿澳元的北部地区基础设施专项贷款，以优惠利率贷款吸引全球投资者加入该区域港口、公路、管线、电力、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并将直接投资约 10 亿澳元进行先期重点基础设施改造，其中包括 2 亿澳元的水资源开发工程、1 亿澳元的活牛运送通道建设以及 6 亿澳元的包括大北高速在内的公路改造项目。2015 年白皮书又提出了 12 亿澳元的投资计划，作为对之前 50 亿澳元基础设施投资的补充。

（二）能矿资源

“一带一路”战略倡导国家间加大煤炭、油气、金属矿产等传统能源资源勘探开发合作，加强能源资源深加工技术、装备与工程服务合作，积极推动水电、太阳能等清洁和可再生能源合作，形成能源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的国际合作产业链。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能矿资源极其丰富，主要有铁矿石、煤炭、黄金、铀、锌铅、铝土、锰、石油、天然气、页岩气等。澳大利亚已探明的铁矿石资源 90% 都集中在西澳大利亚州，勘探开发已经较为成熟，占据了全球铁矿石贸易的半壁江山，是力拓、必和必拓、FMG（Fortescue Metals Group）等世界前几大矿商以及各国企业铁矿石投资的重点地区。昆士兰州的黑煤资源丰富，且以露天矿藏为主，已探明工业经济储量占全澳的 62%，煤质较好，发热量高，硫、氮含量和灰份较低，焦炭、动力煤等黑煤的出口约占澳大利亚矿产和能源出口的 1/4。^① 北领地的能矿资源主要为黄金、铀、锌铅、铝土、锰、石油、天然气、页岩气等，目前正在运营的有八大矿山，2014—2015 年矿业产值超过 32 亿澳元，液化天然气

^①澳大利亚是世界最大的煤炭出口国，黑煤地质储量约 575 亿吨（工业经济储量 397 亿吨），居世界第六，褐煤地质储量约 418 亿吨（工业经济储量为 376 亿吨），占全球褐煤储量的 20%，居世界第二。

(LNG)的年产能为 1200 万吨，2014 年石油勘探投资达 5.5 亿澳元，页岩气资源潜力超过 200 万亿立方英尺，有 17 个成熟项目正在寻找投资机会。

（三）农业

“一带一路”战略倡导国家间开展农林牧渔业、农机及农产品生产加工等领域的深度合作，积极推进海水养殖、远洋渔业、水产品加工等领域合作。沿线国家深化农业领域合作，可以彼此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农产品为重点，提高重要农产品安全保障能力，帮助促进合作国的农业出口。澳大利亚北部地区的土壤和气候适于多种农业生产，农业发展主要依靠畜牧业、种植业、渔业、林业等，农产品主要用于出口，最大的出口市场是东北亚、东盟、中东地区。农产品以产值为序依次为：小麦、油菜、大麦、羊毛、肉牛、蔬菜、绵羊和羔羊、水果和坚果、干草、牛奶、燕麦、园艺花卉及幼苗、蛋、鳄梨等。昆士兰州总面积 173 万平方公里，农业用地面积约为 147 万平方公里，占全州总面积的 85%，其中 68%的面积用于天然林草场的放牧。西澳大利亚州总面积 252 万平方公里，农业用地面积 109 万平方公里，占全州总面积的 43%，由于存在大面积的沙漠，全州总面积的 37%为极少使用土地。北领地总面积 135 万平方公里，农业用地面积 67 万平方公里，占全州总面积的 50%，最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为天然放牧，占农业用地面积的 50%。澳大利亚高度重视与中国在农业方面的合作，2015 年 12 月正式实施的《中澳自由贸易协定》涉及最多最全面的就是农业领域合作。西澳大利亚州、昆士兰州和北领地政府每年都会组织中澳两国企业家参加以农业合作为重要内容的论坛和座谈会，宣介并对接合作项目。目前，适于中资企业在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投资的农业项目主要集中在畜牧养殖类农场、乳业等畜产品加工、渔业捕捞和贸易、粮食作物种植加工和贸易、水果种植加工和贸易、园艺以及林业等领域。

（四）产业园区

“一带一路”战略倡导国家间发挥比较优势，探索投资合作新模式，共同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促进产业集群发展。通过共建海外产业集聚区，推动当地产业体系建设，在教育、科技、文化、旅游、卫生、环保等领域共同拓展合作空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有各类产业园区，虽然与中国模式不尽相同，但同样具有产业集聚区的功能，并以推动教育、科技、医疗、农业、旅游等当地产业体系建设为目标。中资企业可以发挥建设产业园区的比较优势，与西澳大利亚州、昆士兰州和北领地探索投资合作新模式，与澳大利亚本土企业以及其他跨国企业合作建设经贸、经济、高科技合作区等各类产业园区，促进澳大利亚北部地区的产业集群发展，在教育、科技、文化、旅游、卫生、环保等领域共同拓展合作空间，深化中澳两国的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业的产业体系合作。

三、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的主要内容

澳大利亚设立了由联邦政府的总理和副总理，以及西澳大利亚州、昆士兰州和北领地的州长共同组成的“北澳战略合作伙伴论坛”，力图发挥各级政府的合力，共同负责领导、协调和执行“北部大开发”计划。2015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公布了“北部大开发”未来20年的发展规划（2015—2035年），成立了由产业、创新和科技部部长担任负责人的北部大开发办公室，将从以下6个方面推动落实“北部大开发”计划。

（一）为支持投资制定更简便的土地政策

澳大利亚政府将在2~5年内梳理畜牧业改革的原则，对土著居民土地权管理提供更多支持；由澳大利亚政府会议就土著居民土地管理和使用情况提交报告，就开发土著居民土地的新模式开展公众咨询，在澳大利亚北部建立适合商业使用的土地所有权信息数据；在土著居民土地管理方面引入新的拨款模式，由澳大利亚政府会议开展土地调查，研究土著居民土地用于商业用途的排他性使用模式。在此基础上，澳大利亚政府将总结北部试点地区土地所有权管理的经验教训，在北领地就村镇土地长期租赁进行协商，在牧场租赁管理中减少规定要求，在北部对于个人拥有土著居民土地采用更简便的管理方式。在10~20年内，澳大利亚政府将解除所有的牧场租赁规定要求，争取实现排他性土著居民土地权租赁，土著居民土地和牧场土地的农业潜能信息获取便利，有利于吸引投资者；争取完成现有的土著居民土地认定工作，确保有更多确定权属的土地可用于投资和开发，在土地方面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带来更多机会。

（二）开发北部地区水资源

澳大利亚政府将在2~5年内建立总金额2亿澳元的水资源基础设施开发基金；在昆士兰州 Mitchell、西澳大利亚州 Fitzroy 水库和北领地达尔文地区进行并完成相关水资源评估，完成昆士兰州 Nullinga 大坝项目和西澳大利亚州奥得河三期项目的可行性研究（视可研结果考虑推动这两个项目），启动大自流盆地可持续性计划第四期以控制该地区空洞形成；确定水资源基础设施开发基金将支持的北部地区重点项目；决定重点水库的用水总量上限，修复大自流盆地空洞取得显著进展，在重点水库推广用水许可拍卖等方式的水资源交易市场，考虑对更多有产业利用潜力的水库进行水资源评估。在10~20年内，澳大利亚政府将完成对北领地、昆士兰州和西澳大利亚州法定水资源计划的复评，按需建设更多的水资源基础设施，帮助投资者了解水资源位置信息，在北部实现清晰、受法律认可的水权体系，在水库和地下含水层建立有效的水资源交易体系，在北部地区利用水资源将更为方便。

（三）发挥北大门作用，促进和亚太各国的经贸投资合作

澳大利亚政府将在 2~5 年内发布北部地区成熟招商项目的价值评估信息；将确定渔业和水产业的简化管理制度，水产养殖管理权限由联邦下放到各州及领地，投入运行新的北部地区渔业联合管理窗口，发布渔业和水产业评估报告，对低风险渔业的环境许可有效期延长至 10 年，对于管理情况良好的渔业公司延长出口许可有效期至 10 年；推动北部科研机构和当地合作伙伴共同研究热带地区健康问题，开展新的热带研究和商业化运用项目；帮助咨询顾问业进入北部地区的商业运营，建立新的北部地区开发合作研究中心并投入运营；在进行咨询后，考虑修订联邦土著遗产立法，减少重复内容、增加相应保护，与土著居民及商业企业协商历史遗产保护管理体系；评估北领地的出入境口岸，在达尔文开放新的边境口岸，并考虑在昆士兰州和西澳大利亚州增设口岸；在中国和印度开放旅游签证电子递交，试点快速通道服务，引进 10 年多次往返签证并试点简体中文的签证申请流程；强化北部地区的生物安全管理，由澳大利亚北部保险专门团队提供推荐方案，更多土著居民担任生物安全巡查员，涉及鳄鱼制品贸易、使用受保护动物的土著艺术品、袋鼠及澳洲鸵鸟出口管理简化措施到位。在 10~20 年内，澳大利亚政府将促进科研机构与外国合作伙伴通过强有力的合作获取以产业为导向的成果，将热带健康问题研究成果转化为商业机会，促使澳大利亚北部成为全球领先的热带健康研究中心，促进澳大利亚北部与亚太经合组织及东盟国家建立更紧密的联系，通过世界级的研发建立一个规模庞大、不断成长、具有可盈利性的农业产业，建立清晰、低成本的监管体系支持有弹性的商业发展，在更为广阔的产业中有更多投资项目。

（四）有序加快推进北部地区基础设施项目

澳大利亚政府将在 2~5 年内发布北部地区基础设施审计报告，建立总金额 50 亿澳元的北部地区基础设施专项贷款，力争专项贷款支持的项目取得显著进展；建立一个商业小组为改善北部地区航空运输现状做准备，完成编制改善北部地区航空运输的计划，启动为期 4 年的地区航空运输及偏远地区机场升级计划，为应对汤斯维尔机场新增的国际旅客，增加边检和生物安全相关设施投入；解除目前的沿岸航运管理框架，促进沿岸航运高效发展；宣布总金额 6 亿澳元的道路相关一揽子计划及项目开工时间，发布并不断更新北部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促使道路一揽子计划对于重点发展的道路产生预期的改善，开始 Mount Isa 至 Tennant Creek 铁路预可研；提高北部地区养牛产业供应链的生产力，宣布牛肉运输道路拨款项目，在牛肉运输道路拨款项目内改善关键道路，建立更短和更直接的运输线路；考虑降低检查和治疗壁虱的成本。在 10~20 年内，澳大利亚政府将改善偏远地区机场，有更高质量的信息可以支持北部地区基础设施的强劲发展，修建更多牛肉重型车辆运输可使用的道路，牛肉产业的生产力将更强、更稳健，由政府和商业界共

同投资支持更多现代的、高效的基础设施。

（五）提高北部地区的劳动力数量和质量

澳大利亚政府将在 2~5 年内启动新的全国促进就业服务，在北部地区推行定点移民协议取得进展；扩大并简化季节性劳工项目，包括更多的农业和住宿相关产业，允许打工假期签证持有人在有需求的地区工作更长时间，评估打工假期签证对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启动面向太平洋岛国居民的低技能劳工试点计划，并评估实施情况；加大对北部地区商业界在产业技能拨款方面的支持，支持北领地简化工作技能执照相关流程，扩大简化北领地职业技能执照自动认定的适用范围；为公路建设项目准备的土著雇佣政策到位，旅游业提交季节性劳工试点方案，发布入境澳大利亚劳工情况报告，发布劳工关系框架报告。在 10~20 年内，澳大利亚政府将实现更多澳大利亚人在北部工作，土著居民社区有更多就业机会，北部商业界有更多打工度假劳动力，北部的劳动力需求基本得以满足，有技能的国内劳动力能得到低成本、高效的外国劳动力项目补充。

（六）加强政府和非政府机构等的共同治理结构建设

澳大利亚总理将和昆士兰州、西澳大利亚州、北领地行政首长保持战略合作关系，寻求澳大利亚国会的支持，将议会北部联合委员会设为常设委员会，向议会提交年度报告，通过战略合作延续领导力；继续开展“全国地图开放数据行动”在北部的的工作；启动政府借调项目，通过人员借调改善政府机构工作能力；开展由副总理向议会就北部开发进行报告的工作；在国防年度白皮书中增加北部地区内容的比重，确定国防投资重点项目；将澳大利亚北部办公室搬迁至北部地区；强化北部生物安全管理，配置更多的一线执法人员；减少北部相关议题的过多公文，发布联邦改革白皮书，建立一个新的合作研究中心用于研究北部开发；各层级的政府间建立更优化的联席会议和更强有力的合作，共同建设澳大利亚北部地区。

四、开发性金融支持两大战略对接的思路建议

落实“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支撑是资金融通，特别是要加大开发性金融对重大项目的支持力度。开发性金融机构是以实现长期经济增长以及政府意图为目标，由一个或多个国家建立具有国家信用的金融机构，为特定需求者提供中长期信用，建设市场和制度，以大额中长期投融资为载体，引导社会资金投入具体项目，最终实现国家战略。中国主导的致力于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主要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和国家开发银行等。国家开发银行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和对外投融资银行。近年来，国家开发银行积极发挥金融引擎和先导作用，以市场化方式大力开拓国际合作业务，全力服务“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良好

的合作基础。在“一带一路”建设对接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方面，开发性金融机构可以从多个方面发挥支持作用。

（一）配合双边政府，通过规划合作开展项目对接

开发性金融机构可以紧密围绕“一带一路”建设的整体战略布局，通过规划合作和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计划充分对接。在推动整体规划合作的同时，围绕重点领域，发挥所在国知名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高校科研机构等社会力量的本土化优势，深入开展专项规划，包括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农业、经贸合作、产业投资、金融合作、人文交流、生态环保和海上合作等，实现点面结合的规划合作战略布局。在做好整体规划的基础上，以基础设施、能矿资源、农业、装备制造和国际产能合作等为重点，着重加强重点领域重大项目的谋划和融资方案的策划。

（二）以较成熟地区为重点，发挥示范作用和虹吸效应

“一带一路”和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的对接，可以较为成熟的地区为重点，培育和支持重大项目合作。2016 年 6 月，中国驻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总领事馆在当地举办了“一带一路”对接“北昆大开发”论坛，昆士兰州政府部门、企业和中国在澳企业、银行及江苏、山东、陕西等省企业代表共 200 多人参加了论坛。在昆士兰州副州长杰琪·特拉德和中国驻布里斯班总领事赵永琛的见证下，昆士兰州贸易投资局局长、中国驻布里斯班总领事馆商务领事以及国家开发银行共同签署了《“一带一路”对接“北昆大开发”投资机会合作会议纪要》，明确三方共同支持两国战略对接，在基础设施、能源资源、农业、产业园区等领域加强规划合作。昆士兰州贸易投资局、中国驻布里斯班总领事馆将在其政府能力范围内，对中国投资者提供最大程度的便利。国家开发银行将在符合内部授信审批管理制度的前提下支持中国企业投资，为其提供融资支持，以共同促进投资、实现互利共赢。三方将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交换意见、沟通商业计划，并适时开展特色领域的规划合作，支持昆士兰州政府重点推动的中国丰盛集团在北昆的农业产业示范园区、码头和机场改扩建、健康医疗产业园区等综合产业园区的项目开发，发挥重大项目的示范作用和虹吸效应。

（三）打造银行同业合作平台，提升综合服务能力

开发性金融机构应当发挥好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等各种金融形态的优势和作用，加强同国际金融机构及澳大利亚的澳新银行、国民银行、西太银行、联邦银行等本地银行、产业投资基金、保险公司、风险资本等金融机构的合作；提高综合金融服务能力，全面开展项目融资、贸易融资、国际结算、财务顾问、离岸资产证券化、银团贷款等综合金融业务；打造金融合作平台，畅通投融资合作渠道，在产品开发、风险控制、信息

技术、经营管理等方面，全面提升自身的综合经营能力和影响力。开发性金融机构可以在澳大利亚设立经营性分支机构，以银团贷款、直接授信和转贷等方式联合本地金融机构共同支持澳大利亚北部地区的重大项目开发建设。为参与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计划的中资企业提供全方位一站式服务，引导中资企业探索工程总承包加融资（EPC+F）、公私合营（PPP）、建设—经营—移交（BOT）、私营主动融资（PFI）等多种合作模式，积极参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推动国际产能合作和重大装备制造业“走出去”。

（四）创新金融产品，建立长效合作机制

澳大利亚是成熟的发达市场经济体，“北部大开发”计划中的很多开发性项目也多以市场化、商业化模式运作，融资领域竞争激烈。主要体现为：一是澳大利亚投融资法律体系错综复杂，涉及劳工保护、环境保护、原著民保护、土地水源等各方面，中资企业融资需求更加综合化，非常看重银行提供的财务顾问等中间业务的服务能力；二是海外同业特别是外资银行的融资成本较低、融资决策较快、审批流程较高效、贷款币种较丰富，能够满足客户“子弹式”还款（贷款到期一次性还本）等不同金融产品的需要。开发性金融机构应当将投贷等金融产品相结合，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力度，探索投融资合作新模式，为具有开发性的商业项目创新设计出不同的金融产品，对项目的风险偏好、风险容忍度、信用结构、贷款定价、贷款品种、审批流程等制定不同的标准和要求，建立长效合作机制，满足开发性金融机构以市场化、商业化的方式支持各类开发性项目，更好地可持续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计划对接的战略需要。

参考文献：

1. 胡怀邦：《以开发性金融服务“一带一路”战略》，《中国银行业》2015年第12期。
2. 孟刚：《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南线四国融资合作研究》，《开发性金融研究》2016年第1期。
3. 孟刚：《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为开发性金融带来战略新机遇》，《中国银行业》2016年第4期。
4. Australia Department of the Prime Minister and Cabinet, *Our North, Our Future: White Paper on Developing Northern Australia*, 2015. 6.
5. Australia Department of the Prime Minister and Cabinet, *Green Paper on Developing Northern Australia*, 2014. 6.

责任编辑：李 蕊

中国大力推动企业跨国并购的 对策研究^{*}

张 健

摘要：本文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背景、现状分析入手，总结了当前跨国并购的特点，指出当前中国企业在实施跨国并购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着重对宏观经济、政策环境、微观操作等三个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针对上述问题，该文从政府、企业、社会等层面提出了对策和措施，聚焦在明确国家战略布局、营造有利并购的外部环境、提高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经营管理能力等三项重点工作。

关键词：跨国并购 经济全球化 对外投资 国际竞争力

作者简介：张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副书记。

2016 年，中国企业开展跨国并购实现了井喷，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当前，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国内企业，对开展跨国并购重要性的认识已经基本统一。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从政府、企业、社会等层面进一步出台并实施鼓励、保护和促进中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的措施。

一、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现状

近年来，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风起云涌，特别是 2005 年之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发展

^{*} 本文为 2015—2016 年度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基金课题《“十三五”时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研究》成果。

更为迅猛，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跨国并购已经成为企业发展壮大的重要途径之一，并购行为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一）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背景分析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发展，是目前全球经济发展现状和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相互影响的必然结果，是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实现经济转型的客观需要，是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走向世界的重要渠道。

1.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中国企业与国际市场和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度融合有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商品、服务、生产要素等跨国界流动的规模与形式不断增加，技术与信息在国家之间的传播更为迅速，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在全球范围内生产经营资源配置效率更高，从而使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增强。当今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表现：一是生产的全球化，跨国公司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二是市场的全球化，国际贸易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三是资金的全球化，国际金融迅速发展，巨额资金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四是科技开发和应用的全球化，技术的推广速度更快；五是信息传播的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下，资本、技术、品牌和管理在全球进行配置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任何一个国家、企业都必须在国际视野内发展才有可能获得更好的发展。对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来说，国际投资是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跨国并购是国际投资的最重要形式之一。

（1）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跨国公司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行为主体，对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有直接推动作用。中国企业要成为跨国公司，必须参与国际分工。从市场经济的特征看，任何一个经济体内的资本、生产要素、科技等都是关键因素。对企业而言，能将上述要素进行最优配置，就能取得最好的经营成果；对国家而言，在国内实现上述要素的最优分配，就能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但在全球范围内，国家层面无法实现上述要素的整合，而跨国公司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本、技术、人力资源的最优配置，获得最大化利润，也间接实现了上述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中国企业要想成为跨国公司，必须将经营管理、战略、市场放在全球视野下，参与国际分工，获取国际经营能力。根据经验数据显示，海外营业收入超过 30% 是一家企业具有国际经营能力的标志。目前达到这一水准的中国企业只有 25 家，并且这些企业大多以贸易和中间产品为主，缺乏国际化经营的能力。据统计，2013 年中国 100 大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只有 13.98%，不仅远低于 2013 年世界 100 大跨国公司的 61.06%，而且远低于 2013 年发展

中国家 100 大跨国公司的 37.91%。这说明中国企业必须加快全球化步伐。

(2) 2008 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对全球投资产生重大影响,全球经济动荡导致资产价格不断走低,给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带来了最好的机会。全球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受到重创,跨国公司亦受到明显影响,纷纷收缩在全球投资、压缩非主营业务。很多跨国集团进行破产保护,出售资产,开始并购重组,全球市场上出现了很多优质资产且资产价格不断走低。一是因为发达国家企业财务制度严格,公司治理对公司运营约束严格,当期损失都要体现在当期财务报告中,资不抵债时,往往通过资产处置应对危机。二是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比较透明,且一般的大型企业集团均为上市公司,资本市场能够比较及时公正地反映公司价值,当资产价格走低后,能够比较容易通过公开市场获取相关信息。

(3) 当前处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欧美国家经济开始复苏,重新进行产业调整,给中国企业通过并购进入发达国家区域以及工业领域带来新的机会。此次金融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认识到单纯依靠金融业发展经济风险比较大,也开始重新提出振兴制造业,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重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加速推进新一轮全球贸易投资新格局。其中,以美国最为明显,出台很多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举措,并在近两年取得良好效果。观察美国设立的部分高端制造业,与十年前相比,综合竞争力和成本已经具有一定比较优势。对中国企业来说,抓住这个时机,通过跨国并购直接进入发达国家的工业领域,既可以充分利用当地高素质人才的劳动力资源,又可以获得先进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2. 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实施跨国并购是实现国内经济转型和对外投资的重要战略途径

(1) 通过跨国并购积极参与国际市场,提高产业能级,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动能。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企业的规模迅速扩大。在全球 500 强中,2015 年中国企业有 106 家上榜,比上年增加了 6 家,2014 年增加了 5 家,2013 年增加了 16 家。某项研究提出,中国企业选择跨国并购对象最为注重的因素是技术研发能力(73%)、品牌(58%)、与中国国内业务的匹配和互补(42%)以及零部件筹措渠道(27%)。基于上述目的并购后,96%的企业声称增加了海外销售 and 市场份额,89%的企业在欧美建设了研发中心,51%的企业提高了国内研发水平并提高了国际知名度,30%的企业则表示增加了国内销售。由此可见,中国企业要在目前发展阶段再上新台阶,就必须走跨国公司道路,必须加入全球竞争领域、参与国际分工。在世贸组织(WTO)红利几乎用尽的时候,中国需要创造新的开放红利。这是对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一致共识。

(2) 结合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适度转移国内产能，调整产业结构，为经济转型贡献新的力量。中国周边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的大部分国家，整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投入，国民的生活水平还处在中国 20 年前的水平，相关产业有巨大的发展机会。对于这些产业，可通过“走出去”并购，转移国内部分产能，支持当地经济建设，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同时也能调整国内产业结构，进行产业升级换代。此外，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得一些行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投资趋于饱和。在国内市场容量日益缩小的情况下，将视角转向国外，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成为中国企业的必然选择。

3. 随着中国企业经营能力的不断提高，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开展跨国并购成为企业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

(1) 中国企业自身经营实力和规模的大幅提升，为“走出去”实施跨国并购创造了良好的内部条件。在全球 500 强中，2015 年中国上榜企业的数量仅次于美国，排名第二。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虽然显著好于日本、法国、德国与英国企业，但与占据明显优势地位的美国大企业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未来与美国大企业在全球市场开展竞争，中国企业还需在提质增效方面做出更大努力。

(2) 国内单一市场已经不足以支撑中国企业进一步成长，面临生存和发展两方面的压力，促使中国企业必须走向国际市场，谋求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在国内经济高速发展十几年的情况下，近几年国内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缓，市场需求不断降低，企业产能过剩问题普遍存在，促使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而跨国并购是有效途径之一。

(3) 中国企业通过跨国并购获得技术、品牌和管理经验，是继续提升企业自身经营能力的迫切要求。中国企业发展到今天，要继续走向全球市场，仅依靠自身积累已经远远不够，必须通过获取技术、品牌和管理经验提升自身竞争能力，跨国并购是重要渠道。

(二) 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现状分析

在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快速发展的 15 年里，总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单个企业对跨国并购进行探索，属于起步阶段；第二阶段，多行业、多企业摸着石头过河，在多个领域尝试并购，属于上升阶段；第三阶段，国家积极鼓励开展跨国并购，企业自愿并购，进入快速上升阶段；第四阶段，目前中国企业开展跨国并购的内外环境均已基本成熟，国家明确“走出去”战略，在政策层面予以大力支持，金融环境良好，企业自身经营实力明显增强，对外并购成为中国企业的经营常态，跨国并购进入爆发阶段。究其原因，一是社会各方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认识基本统一，即有利于国内经济转型、

有利于企业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有利于实施对外发展战略。二是政府、企业、社会鼓励跨国并购的行动方向基本一致。从政府层面看，在对外投资审批管理体制和外汇管理模式上都进行了改革，减少审批层级和内容，提高审批效率；从企业经营层面看，跨国并购已经成为日常经营的常态内容；从社会看，大家已经不再讨论要不要跨国并购、跨国并购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花钱交学费等，而是开始集中讨论哪些领域、哪些国家更适于开展并购。三是有利于开展跨国并购的环境氛围初步形成。从全球看，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看法逐步趋于正面，更多从经济行为角度审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从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看，中国金融企业的“走出去”步伐加快，为跨国并购提供了最为重要的金融支持；从中介机构看，投行、咨询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并购所需的中介机构经验越来越丰富，能够提供的支持越来越多。

1. 持续完善对外投资管理体制，中国企业开展跨国并购的外部协同效果日趋好转

自 2001 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在完善对外投资管理体制，主要体现在审批、融资、外汇管理等方面。在投资管理体制方面，由商务部牵头，优化了企业对外投资的审批管理体制，将部分权限下放到省级机构，初步建立“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管理模式，提高了效率，释放了企业海外投资活力。

2. 中国企业开展跨国并购已经成为日常经营发展的一种常态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取得了显著改进，在制造能力、成本控制、质量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一些优势，具备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随着中国产业的整合，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资本运作手段，有效整合市场资源，增强核心竞争力，获得了规模上的快速发展。十年前，中国企业通过国际贸易参与国际分工，通过进口先进的技术产品和生产设备、利用国内的资源优势 and 劳动力成本，形成自身的竞争力。而在今天，中国企业已经通过开展跨国并购，主动寻求全球合作机会，把自己的价值链放到全球价值链中，同全球资源进行整合，从利用国际贸易的能级上升到直接整合全球资源，开展跨国并购成为企业的经营常态。

3. 中国企业实施跨国并购的成功案例和经验越来越多

随着跨国并购活动的开展，越来越多的跨国并购成功实施的经验也在帮助中国企业树立“走出去”的信心。近年来，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无论是资源性行业还是制造业，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型企业，无论是金融企业还是其他类型机构，都有并购整合成功的案例。

（三）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特点

1. 并购规模越来越大

近年来，在中国经济强劲增长以及国家并购重组政策的激励下，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规模越来越大。2007 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总额达到 186.69 亿美元；2009 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交易达到 61 起，交易金额 212 亿美元；2011 年中国企业跨国并购 106 起，披露金额的 78 起涉及金额 234.28 亿美元。而波士顿公司报告显示，最近 5 年，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规模增长率达 35%，交易数量的增长率为 9.5%。2014 年中国企业完成了 154 起海外并购交易，并购金额达到 261 亿美元；2015 年中国企业实施的海外并购项目总共有 593 个，累计交易金额 401 亿美元。

2. 并购领域不断拓宽

从行业看，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领域涉及采矿业、制造业、服务业等，并成为国际市场采矿业和金属业最主要的买家。其中，主要领域为能源、矿业与公用事业、工业与化工产业以及电信、电信传媒与科技产业。目前，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集中在房地产和酒店、汽车、金融及商业服务和信息科技等四大热点行业，热点行业投资额占总投资的 73%。

3. 并购对象多为欧美发达国家的企业

从已发生的并购案例看，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对象多为欧美发达国家企业。以往的跨国并购都是以发达国家企业并购发展中国家企业为主，因为一般的认识是发达国家企业实力较强，发生并购的可能性较大。但中国的海外并购都指向了美国、欧洲、日本、韩国和加拿大等主要发达国家及地区。2016 年一季度的十大并购交易中，除了 1 起在马来西亚外，9 起均在发达国家和离岸金融中心，包括开曼群岛 3 起，美国、澳大利亚各 2 起，德国、瑞士各 1 起。从目的地而言，欧洲、美国等成熟市场是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最重要目的地。另外，2015 年中国企业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并购数量达到 93 起，主要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仅次于欧洲和北美，同比增长 63%。

二、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问题分析

（一）从宏观经济层面看，政府对跨国并购的引导不足，国家之间的协调仍不到位

1. 对支持中国企业实施跨国并购的国家战略布局和管理体制不够清晰

“一带一路”建设是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把握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对外开放的新举措，也是基于新安全观的周边外交大战略。当前，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明确支持在沿线国家开展跨国并购。但是，在具体沿线国家实施并购的困难很多，部分国家内部复杂，国家和地区间没有相对应的多边协调机制，仅靠双边谈判解决问题，成

本过高，协同效应很低。而目前各界对其战略意义的认识仍然不足，对推动战略实施的布局还不够有力。跨部门协调与合作是国家对外战略有效贯彻的重要环节，但目前政府跨部门协调合作的困难仍然存在。需要指出的是，已经建成的部际联席会议并没有达到其预期效果。各省都希望争取政策、抢抓资源、占得先机、先行先试，为其带来发展新机遇和增长新动力。但在国家层面、部委层面则需要加大引导、统筹、协调的力度。在当前中央力行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在各级层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尚未全面落实时，简政放权将改变各部门深层次的利益格局，因此在实际贯彻推动时会遇到巨大的阻力。

2. 国家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政策指引和投资规划不够明确

国有企业是当前跨国并购的主要力量，其经营受国家政策指引和海外投资规划影响。国内有关主管部门在制定并购政策时，因离市场较远，信息相对滞后，对产业发展前瞻性不足，对产业未来发展判断不够准确，制定的政策过于宏观、投资规划缺乏可操作性。

3. 在中国企业跨国并购面对更多的政治风险时，中国政府的协调能力有待提高

由于社会制度不同，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国企业的并购活动经常持有敌视态度。目前，对于国内的大型国有企业来说，跨国并购面临的第一风险就是国际政治风险，也可以说是国别风险。这个风险在跨国并购西方发达国家的能源型企业、高科技企业时最为突出。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国家安全论”，阻挡中国企业海外扩张的步伐。

(二) 从政策环境层面看，国家在跨国并购法律法规和服务支撑等方面亟待提高

1. 跨国并购的立法工作，特别是相关适用的操作方法和程序有待完善

目前，国内有关跨国并购的法律、制度方面还存在缺陷，仅在公司法、证券法中对企业并购有一些零散的规定，但相较于瞬息万变的企业跨国并购实践而言，明显滞后。具体而言，一方面在企业跨国并购核准备案中，还存在程序繁琐、效率低下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跨国并购的顺利进行，甚至使企业跨国并购坐失良机；另一方面，在外汇管理中，经常项目下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而资本项目下外汇则不可自由兑换。

2. 跨国并购的政府信息服务还不到位，没有足够的信息平台和资源支持

中国对海外并购缺乏有效的服务手段和平台。很多企业在海外并购，特别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并购，只能通过网上收集零碎信息，不敢付诸实施。相关部门在法务、财务、税务、信息服务及投融资产业基金的境外投资服务平台的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3. 企业、政府、金融机构、第三方中介之间的统筹协调对接机制还不完善

中国各类商会、行业协会在跨国并购中的中介组织作用发挥还不充分。这些非政府组织可以平衡不同产业在谈判中的利益关系，为政府提供贸易公共咨询、国内外市场调研信息、产业谈判相关技术支持等。

（三）从微观操作层面看，对企业跨国并购的金融服务能力有待提高

1. 金融机构为跨国并购提供金融服务的能力有待提升，中国企业融资渠道狭窄

目前，中国的金融信贷体制对企业筹资、融资的限制和约束依然较多，企业贷款受到国内贷款担保额度和外汇贷款额度的限制，境内融资不能对国内企业跨国并购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在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要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和证券市场来完成跨国并购。一般而言，跨国公司通过母国外汇汇出实施跨国并购的资金不到整个跨国并购金额的 1/10，9 成以上的并购资金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及抵押贷款、信用贷款等融资手段筹集，而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主要以现金收购为主，融资效率十分低下。

2. 政府对跨国并购的金融控制和外汇管制有待进一步放松

外汇管理制度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由于其直接关系到金融体制的稳定，改革一直是慎之又慎。这影响了中国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发展，特别是在加入 WTO 之后，不完善的外汇管理制度使得中国跨国公司在面临空前激烈的竞争时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3. 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为跨国并购提供金融服务的步伐还需要进一步加快

在地域结构上，中国银行业境外机构的覆盖面仅为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带一路”地区的机构布局则相对滞后，在第三世界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覆盖面及影响力还非常小。

三、推动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对策分析

当前，对中国企业开展跨国并购重要性的认识已经基本统一，针对并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应从政府、企业、社会等层面出台相关措施。

（一）明确树立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国家战略布局

“十三五”规划提出，要深化国际产业合作，加快企业“走出去”；要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产业合作，贯彻落实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重大战略部署，加快推进与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要发挥沿边开放优势，在有条件的国家和地区建设一批境外制造业合作园区；坚持政府推动、企业主导，创新商业模式，鼓励高端装备、先进技术、优势产能向境外转移。可见，“走出去”已经成为国家战略。

1. 尽快制定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发展规划和重点方向

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了加快企业“走出去”的总体方向，提出要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完善统筹协调机制。在“十三五”规划的大背景下，应尽快制定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发展规划和重点方向。一是明晰跨国并购的重点行业领域。从行业看，中国企业跨国

并购领域主要集中在能源、矿业与公用事业、工业与化工产业以及电信、电信传媒与科技产业。从国内经济发展需要和“走出去”战略需要看，未来国内企业跨国并购的行业领域，必须集中在资源类行业、高端制造业、金融及商业服务和信息科技等热点行业。二是突出制造业的并购策略。《中国制造 2025》明确提出，探索利用产业基金、国有资本收益等渠道支持高铁、电力装备、汽车、工程施工等装备和优势产能“走出去”，实施海外投资并购。需加快制造业“走出去”支撑服务机构建设和水平提升，建立制造业对外投资公共服务平台和出口产品技术性贸易服务平台，完善应对贸易摩擦和境外投资重大事项预警协调机制。三是要加强顶层设计，明确实施路径，建立完善统筹协调机制。结合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经营特点，有针对性地鼓励开展不同领域并购；对国内企业针对同一企业的并购，要避免竞相压价。四是根据中国加入 WTO 后的态势以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和要求，在未来 5~10 年内，及早制定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的总体发展战略。同时，应结合国际经济发展进程，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经营战略、区域战略、行业战略、融资战略、进退战略、生产战略、市场战略等。

2.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有效保障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合法权益

建立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投资贸易协定以及多边体制下的投资贸易便利化协定，并加快落实。结合外交推介惠及沿线国家民众的项目，在和平合作中求和平发展，以获得沿线国家更多的认同、亲近和支持。依靠各界企业从微观层面主动“走出去”，帮助企业降低摩擦成本。美国驻外国使馆设立了经济商业情报中心，为海外投资企业提供最新和最可靠的东道国文化及市场信息。日本制定了《海外投资行动指针》，倡导企业对外投资应兼顾社会责任以提升海外形象。中国应充分利用海外使领馆及相关机构，加强海外并购公共信息服务，提倡和帮助中国企业与当地社会的深度融合，宣传和增强并购目标方对中国企业文化的认同和信任，尽量降低海外并购中的冲突。

3. 进一步完善企业境外投资管理体制，探索建立合理的审计、经营业务考核体系

建立完善境外投资发展规划和重点领域、区域、国别规划体系。健全“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对外投资管理体制，健全对外投资促进政策和服务体系，提高便利化水平。推动个人境外投资，健全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制度。建立国有资本、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审计制度，健全境外经营业绩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积极立法，提高立法级别，优化境外投资管理制度，简化手续，并以立法形式扩大跨国投资主体的范围。

（二）大力营造有利于中国企业开展跨国并购的外部环境

1. 发展对外投资的促进政策和服务体系，建立对外投资金融和信息服务平台

强化对外开放服务保障，推动同更多国家签署高标准双边投资协定、司法协助协定、税收协定，争取同更多国家互免或简化签证手续。构建高效有力的海外利益保护体系，维护中国公民和法人海外合法权益。健全反走私综合治理机制，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监管措施，完善风险防范体制机制。提高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完善领事保护制度，提供风险预警、投资促进、权益保障等便利服务。强化涉外法律服务，建立知识产权跨境维权援助机制。

2. 尽快制定和完善跨国并购的法律规范，制定适用的操作方法和程序

建立健全有利于“走出去”以及“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国家法律法治体系。国家层面的政策沟通是关键。中国要与相关国家就“一带一路”战略进行交流，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在政策上为战略实施“开绿灯”的同时，法律上要为战略实施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包括企业、投资、融资、项目建设、外汇管理、人员管控、合规管理、风险控制等方面，而且相应的执法、司法亦要跟上。不妨借鉴美国法律的长臂原则，学会运用现有国际规则，切实保护本国企业、投资人在外的合法权益。

3. 大力发展与跨国并购相关的中介机构

组建综合性一站式服务平台，以提供覆盖境内外全流程境外投资服务。探索建立以服务境外投资企业为目标的具有独立行政法人资格的综合性一站式服务平台，同时设立境内和境外分支机构，以提供公益性境外投资服务为主，根据企业个性化需要提供分类分级的有偿定制化服务。聘请国内和驻在国当地的专业技术服务人员，在投资目的国开展分行业领域的基础调查和研究，为企业境外投资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与指导。积极整合各部门、各行业的政策资源，做好行业指导、信息服务、融资服务、投资促进、人才培养、风险防范等综合性企业服务工作。

（三）全面提高中国企业实施跨国并购的经营能力和管理水平

1. 结合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特点，在企业发展战略规划的框架内，制定明确、科学的跨国并购战略

中国企业要有明确而科学的跨国并购战略，将跨国并购纳入企业发展战略规划的框架内，在战略的导向下进行海外并购。企业制定中长期战略规划时，在对企业外部环境、内部能力、企业目标与使命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制定海外并购战略，包括并购的方向、原则、条件、时机、可能方式等。在战略的导向下，寻找并购行业及目标企业，并进行战略一致性、能力匹配性、优势互补性分析，进而作出并购是否符合企业发展战略的总

体判断。战略导向的并购可使并购具有主动性与目的性，减少非理性因素的干扰。而当前的海外并购往往是机会导向，也就是企业发现了海外并购的机会，然后进行可行性分析，进而作出并购计划。由机会导向转向战略导向，这是企业规避海外并购风险最重要的方式。具体而言，中国企业在通过跨国并购寻求发展的道路上，需要从参与国际竞争的角度来思考自身的国际化战略定位，找到一条适合自身实际状况的发展道路。现实的选择是，在不断提高竞争能力的基础上，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可以从进入市场和获得战略性资源（技术、品牌）两个方向逐步实施。

2. 按照现代企业经营理念，不断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适应跨国企业的竞争需要

在并购过程中，达成并购协议只是并购成功的第一步，将目标企业与主体企业整合在一起，发挥更大的竞争优势，才是并购的最终目的。并购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企业是否具备核心竞争力，以及相应的管理溢出能力，即能够将这种核心竞争力移植到并购企业中去，同化并购企业，使其具有主体企业的竞争优势，为并购活动带来新的增长点。因此，对并购企业而言，培养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自身管理水平非常重要。对中国企业而言，由于并购主体企业多为国有大型企业，除了加强内部组织管理与技术创新外，更应该从治理结构入手，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3. 积极实施国际化人才战略，大力培养、引进具有国际管理背景的跨国并购专业人才

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的前期，应制定与实施明确的国际化人才战略。缺乏相关优秀人才的努力，海外并购很难取得成功，中国企业必须着力培养跨国并购的专业人才。一是在并购战略制定阶段有计划地引进一批具有国际化管理背景的人才，搜寻、网罗和评聘跨国并购的交易谈判人才。二是同时在企业内部选拔培养一批熟悉本企业运作、具有较高素质的跨国经营管理人才。

参考文献：

1. 张祥、张健：《机遇与挑战：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
2. 柏帆：《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多元文化整合策略研究》，《现代经济信息》2013 年第 9 期。
3. 焦月：《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面临的文化冲突与整合研究》，《辽宁大学》2015 年第 6 期。
4. 蔡懿静：《企业跨国并购中文化整合的策略浅析》，《中外企业家》2015 年第 8 期。

责任编辑：李 蕊

中国金属矿产对外投资的新进展及应对措施*

高凌云

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金属矿产的供需矛盾日益尖锐，中国对国外金属矿产的依赖越来越强。在金属矿产资源领域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鼓励企业“走出去”，通过海外投资获取金属矿产资源，是中国经济战略的必然选择。目前中国金属矿产海外投资出现了投资波动增长、占比超过能源投资、投资地域进一步集中、并购方式占主导地位、民营企业投资比例增加等新特点，同时也存在投资目标不明确、经验不足、抵御风险能力不强、国际竞争力偏弱、顺周期并购较多等问题。下一步应确立海外金属矿投资的总体战略；改革境外金属矿业投资管理体制；以“一带一路”为契机拓展金属矿产国际合作空间；鼓励企业规模化经营；“公私结合”；尊重国际金属矿企业投资规则，注重人文因素和社区建设等。

关键词：金属矿产 对外投资 并购 管理体制

作者简介：高凌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金属矿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之一，在提供金属矿产资源和维持生产生活品质中有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在金属矿产供给与需求缺口日益增大的形势下，不断探明新的金属矿产地是解决金属矿产需求增加的方法之一。但是，根据中国矿业联合会的研

* 本文为2015—2016年度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基金课题《“十三五”时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573271）阶段性成果。

究，到 2020 年中国所需的 45 种主要矿产的供给状况基本划分为四类，分别为可以保证、基本保证、短缺、严重短缺。其中，可以保证的矿产共 24 种，包括煤、天然气、钨、钼、银、稀土、菱镁矿、萤石、耐火粘土、磷、重晶石、水泥灰岩、玻璃硅质原料、石膏、高岭土、石材、硅藻土、钠盐、芒硝、膨润土、石墨、石棉、滑石、硅灰石；基本保证的矿产有钛、硫 2 种；短缺的矿产有 10 种，包括石油、铀、铁、锰、铝土矿、锡、铅、镍、锑、金；严重短缺的矿产有 9 种，包括铬、铜、锌、钴、铂族元素、锶、钾、硼、金刚石。可以看出，短缺和严重短缺的大部分是金属矿。因此，在金属矿产资源领域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鼓励企业“走出去”，通过海外投资获取金属矿产，是中国经济战略的必然选择。

一、中国金属矿产对外投资的发展与新变化

中国金属矿企业是“走出去”战略的第一批实践者。中国金属矿企业“走出去”迄今已超过 30 多年，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中期为考察起步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摸索试探、积累经验、培养人才和熟悉国外的各类环境，“走出去”的方式以没有实质投资的考察类项目为主。第二，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到 2007 年前后为初步投资阶段。之所以如此划分，是因为这一时期国内外金属矿企业都很不景气。在之前广泛探索的基础上，包括中钢集团、上海宝钢等大型国有企业，在全面开展国外项目的同时，逐步聚焦了一些项目进行实质投资。第三，2008—2011 年为快速发展阶段。由于全球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强化等原因，中国金属矿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从投资主体看，除大型国有企业外，很多民营企业进入境外金属矿企业投资领域；同时，有很多跨行业企业进入金属矿企业领域。第四，2012 年至今为矛盾凸显和转型发展阶段。前期诸多盲目和不理性的投资在大量投入后无法继续，金属矿企业面临一轮新的周期，投资处于一个新的节点，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投资波动增长、能源金属矿产投资占比上升、投资地域进一步集中、并购方式占主导地位、民营企业投资比例增加等特点。

（一）对外投资波动增长，但净额占比下降

近 10 多年，随着中国对金属矿产资源需求的快速增加和国际矿业市场的起伏，中国金属矿企业境外投资规模总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从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看，2003 年中国金属矿企业对外投资净额仅为 13.8 亿美元，到 2014 年达 165.5 亿美元，增长近 12 倍。2013 年最高达到了 248.1 亿美元，比 2003 年增长了近 18 倍。与之对应的是，金属矿企

业对外投资净额在总投资净额中的占比呈逐步下降趋势，2003 年和 2006 年金属矿企业所占的比重最高达到了 48%，2014 年只有 15%（图 1）。另外，在部分年份，如果金属矿企业在境外投资中遇有大额并购项目，该年度的投资额就会被拉高，如 2009 年中国五矿集团用 17.5 亿澳元收购澳大利亚 OZ 矿业公司、2013 年栾川钼业以 8.2 亿美元收购力拓集团下属的北帕克斯铜金矿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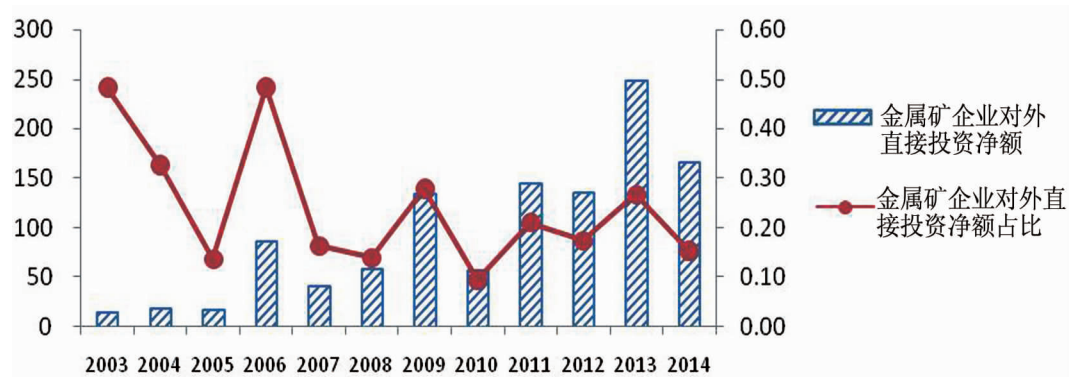


图 1 2003—2014 年中国金属矿企业境外投资净额及其占比变化趋势（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商务部相关年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

近 3 年来，随着主要金属矿产品价格的持续下跌，整个金属矿业市场转冷，中国境外金属矿产勘查、矿山开发的热情也有所降温。此外，国家境外风险勘查基金的停止，也直接导致了境外矿产勘查投入的降低。从对外投资累计净额看，2003 年中国金属矿企业对外投资累计净额为 41.5 亿美元，但到 2014 年已经达到了 1237.3 亿美元，相比 2003 年增长了 29.8 倍。与之对应的是，2006 年金属矿企业对外投资累计净额占总投资累计净额的 24%，到 2014 年这一比例下降到了 17%（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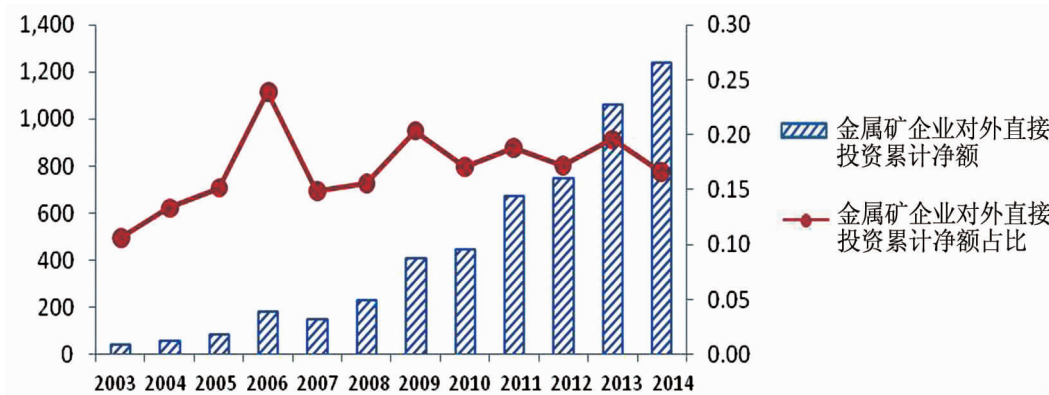


图 2 2003—2014 年中国金属矿企业境外投资累计净额及其占比变化趋势（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商务部相关年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

（二）金属矿产投资超过了能源投资

2014 年，中国企业境外能源投资出现大幅下滑，金属矿投资历史上第一次超过油气投资。2014 年中国对外投资由 2013 年的 248.1 亿美元减少到 165.5 亿美元，同比减少 55%（图 3）；其中，境外油气并购投资由 2013 年的 186.4 亿美元减少到 38.67 亿美元，大幅减少 82%，金属矿产协议投资额由 2013 年的 51.7 亿美元增加到 108.3 亿美元，同比增加 109.6%（并购同比增加 254.84%）。这与 2014 年国际油气价格大幅走低、国内煤炭产能持续过剩和价格下跌幅度较大等有直接关系。同时，铜矿投资大幅增长，源于铜价相对稳定、未来预期乐观、短期价格调整引发抄底并购；铁矿石价格出现持续大幅调整，相关资产价值严重缩水，出现抄底机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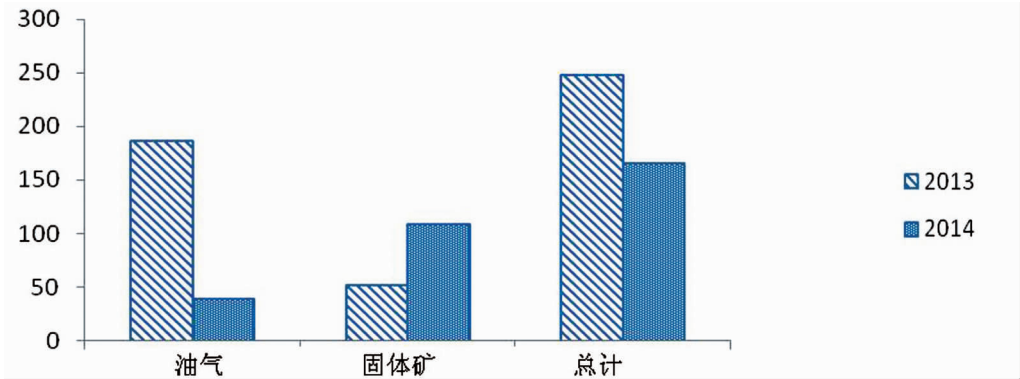


图 3 2013—2014 年油气及金属矿产对外投资变动（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矿业联合会《2014 年中国企业境外固体矿产投资报告》。

（三）投资地域集中

中国企业境外金属矿投资的主要目的地虽然分布广泛，在拉美、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部非洲、东北亚、东盟、西非等地均有项目，但主要集中在拉美、澳大利亚和南部非洲。其中，在拉美的投资持续增长，在南部非洲和澳大利亚的投资相对稳定；而在西非、加拿大、东盟的投资则呈现明显下降趋势。2014 年，在拉美投资巨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五矿并购拉斯邦巴斯（Las Bambas）铜矿，西非投资减少与对铁矿石投资减少有密切关系，加拿大、东盟投资减少则主要源于东道国政策、投资环境的变化。

（四）境外金属矿产投资中并购方式占主导地位

2012—2014 年境外金属矿产投资总额呈现较大波动，其背后的原因是矿业并购金额的变化。近 3 年，金属矿产项目并购的金额在整个境外金属矿产投资额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居主导地位。随着包括铁矿石、铜矿、铝土矿等在内的大宗矿产价格的持续走低，

境外矿业资产的估价变低，矿业并购机会增多，导致中国企业海外矿业资产并购活跃（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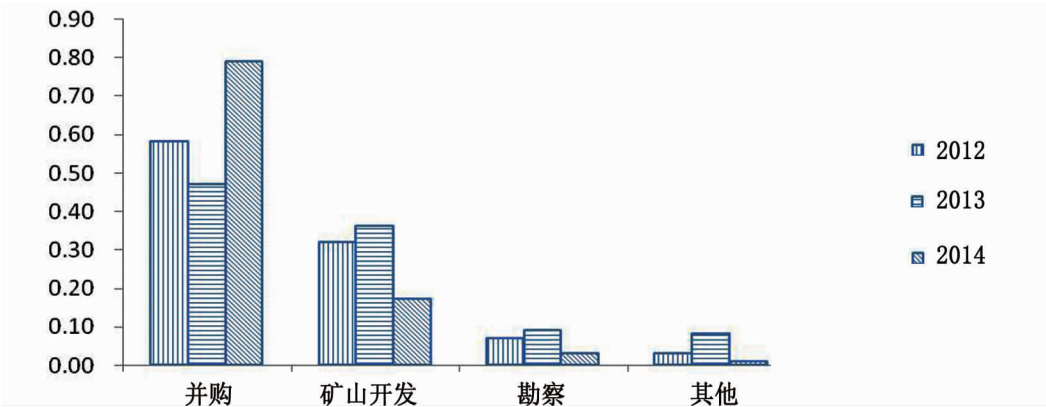


图 4 2012—2014 年中国金属矿对外投资方式变动

数据来源：中国矿业联合会《2014 年中国企业境外固体矿产投资报告》。

（五）民营企业投资增加

近年来，国有企业仍然为境外矿业投资的主力军，但民营企业在境外矿业投资中的力量不可小觑。剔除 2014 年五矿并购拉斯邦巴斯铜矿个案的影响，民营企业在境外矿业投资额几乎占据半壁以上江山。民营企业投资额由 2013 年的 35.3 亿美元增加到 2014 年的 58.42 亿美元。此外，在国家境外风险勘查基金停止后，地勘单位出海的动力与能力明显减弱，海外矿业投资额从 2012 年的 3.64 亿美元降到 2014 年 0.72 亿美元。

二、中国金属矿对外投资存在的问题

中国金属矿产资源海外投资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按照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数据，2005—2014 年中国金属矿业对外投资失败项目金额占比约为 27%，仅次于能源行业。之所以出现如此局面，可能有以下原因。

（一）投资目标不明确

自 2008 年开始，大批中国金属矿企业到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进行投资，但是几年过去了，很多投资被长时间占用而无法收回。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投资目的，是要产品包销还是矿山经营权，是要参与项目建设还是要资产的控制权，一直不是十分明确。中国企业投资海外金属矿产很大程度上具有“人云亦云”“跟风而上”的盲目性。

（二）对外投资经验不足

第一，投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与其他类型海外投资相比，金属矿企业投资又具有投资周期长、投资金额高的特点，属于高风险投资行为。而中国金属矿企大多缺乏对外投资经验，对国外商业规则不熟悉，对东道国国情文化和法律等了解不足，缺乏理解和把握市场的能力，造成部分对外投资失败或运作艰难。第二，中国公司处理交叉文化的能力明显不足，在与外方公司接洽谈判的过程中不够“国际化”，对异国文化的处理能力不足也给中国企业进行海外矿业投资带来了不利影响。第三，投资之后资源整合和管理能力不足也成为中国公司在海外金属矿产投资过程中的一大难题。一些中资企业习惯与政府协商，但在很多国家，尤其是西半球的政府普遍是弱势政府，法律、工会、社区、公共监督组织、媒体的作用和影响非常大，政府能起到的作用远没有中国那么大。

（三）民营企业大多资金不充裕

金属矿产投资具有高风险、高投入、技术性强、周期长、难度较大等特点，对占据“半壁江山”的民营企业而言，在海外进行勘探开发和投资，由于没有雄厚的资金实力，根本无法承担各个开发环节中的风险。一旦投资失败将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这无疑加重了部分企业到海外投资的恐惧心理。这导致与国外的跨国公司相比，中国实力较弱、缺乏资金的民营金属矿企业，在海外投资的规模一般都不是太大，获得的矿产资源量较少，收益能力也较低。同时，由于融资渠道狭窄，中国民营金属矿企业在承包海外工程贷款以及开具保函等方面存在困难，有时不得不放弃一些很好的项目。

（四）抵御投资风险的能力不强

海外金属矿企业投资是一项专业性强而且周期比较长的工作，在整个投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同时处于不同开发阶段的项目面临的风险种类和大小也不同。但是，数年的金属矿企业繁荣使得中国企业普遍忽视了风险控制，想当然地将在国内开发的信心应用到境外金属矿业投资领域，对风险的认识程度不够、准备不足，企业不能因时因地根据自身情况灵活做出对策，上级主管部门或多或少又有一些官僚作风，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五）金属矿企业整体国际竞争力不强

国内金属矿企在资金实力、信息化管理能力、国际经营能力、抗风险能力等方面与国外大型金属矿企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与中国金属矿企竞争的跨国企业，大多具有多年经营历史，资金充足、管理及技术实力雄厚。例如在铁矿石方面，世界三大铁矿

巨头生产了全球约 1/3 的铁矿、控制了全球约 70% 的铁矿石贸易。中国目前很难有金属矿企能与如此实力雄厚的矿企竞争。加上国内非大型国有金属矿企还存在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等问题，导致中国金属矿企业整体国际竞争力不强。

（六）国际化人才储备不足

一个企业或行业的发展状况与人力资源有很大关系，拥有高质量的人才会使这个企业乃至行业的寿命更长。中国金属矿企业“走出去”历史较短，普遍不太熟悉国外金属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运作规则，缺少具有跨国经营能力的专业队伍，多数并购项目在整合过程中都遇到政治、经济和文化差异带来的障碍，这些障碍将最终影响境外投资项目的成败。

（七）顺周期并购较多

从 2005 年开始，受国际金属矿产品价格持续上涨的影响，中国金属矿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此时收购成本大大提高。而且由于国际上低成本的大型矿山多被西方跨国金属矿企业掌握，可供中国企业选择的资源质量普遍不高，加上来自印度、日本、韩国等资源消费国的竞争加剧，中国企业获得的优质项目不多。出于“控制资源”的目的，中国境外项目多数为成熟度普遍较低的项目，需要自主开发且由中方控股和管理，这类项目周期比较长，需要完全承担经营风险，加上中国企业国际化经验不足，导致学习成本较高，项目波折较多，风险难以掌控，面对周期波动十分脆弱。

（八）项目可行性判定标准与西方存在差异

中国企业由于进入海外金属矿投资市场的时间较短，对一些国际通用的勘探、投资标准不够熟悉，更多的还是凭借国内传统的标准，较为看重资源本身的条件，比如储量、金属矿石品位、开采条件等等。而海外投资者更看重长期投资收益，衡量的标准不仅仅是资源的质量，还包括一些收益指标，例如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投资回收期、长期市场走势等等。还有一些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是随大流，盲目找矿，很少进行尽职调查或可行性研究，投资之后才发现资产存在各种问题，或者未能选对投资的最佳时机，出现由于金属市场价格下跌而造成资产大幅缩水，只能暂缓开发。

三、推动中国金属矿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建议

中国金属矿企业对外投资除了上述问题之外，也面临相关政策和公司市值变化为境外投资提供的契机：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为“走出去”提供了新的动力，资本市场在境外

矿业投资中作用增强，境外开发成本下降，境外投资便利化程度不断加强，国企改革带来机会等。为了更好地解决现有问题，利用好中国的优势，推动中国金属矿企业“走出去”，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一）确立海外金属矿企业投资的总体战略

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都把资源安全放在对外贸易和对外交往的首位，高度重视海外矿产资源的勘探和开发。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对这一领域的参与和介入，从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高度制定具体的长期发展计划并付诸实施。第一，中国政府应加强对外投资立法、境外风险管理和海外国有资产监管，制定专门负责资源行业的对外投资战略，鼓励和保护中国企业进行国际化经营的动力与利益。第二，政府可以组建专门机构，为本国企业的跨国经营提供技术、经济、外交等全方位的支持，并通过“以合作求发展”的战略，促使企业在海外互相合作、相互扶持，提高整体竞争能力。第三，积极开展金属矿产资源外交战略，与资源国建立良好的政府关系和合作关系，争取签订政府间的合作开发协议与贸易协议，并运用包括经济、外交手段在内的相关可行措施，加强政府间的高层往来，带动两国企业的往来，影响有关国家政府的资源政策。

（二）改革境外金属矿业投资管理体制，建立投资激励机制

金属矿企业需要更加雄厚的资本保障，政府可以通过融资补贴提供资金支持，或者采取出口信贷、贷款补贴与投资担保等措施直接参与项目融资，使中国企业在投资海外时有能力承担更大的风险。在投资管理方面，制定整个金属矿企业勘查、开发投资计划和安排项目时，应统筹兼顾上下游、国内外。在融资方面，应扩大进行跨国金属矿业勘探开发活动的公司的境外融资权限、对外担保权限，在其期限范围内的境外融资、对外担保活动由事前申报制改为事后登记备案制；必要时可考虑由相关银行为海外投资项目的境外融资提供担保。在外汇管理方面，可视海外矿产勘查开发项目的需要，大幅放宽投资额核准的门槛。在税收方面，要鼓励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参与海外矿产的勘探开发，允许沉没的勘探投资列支抵扣税收；通过扩大综合抵免的适用范围和拓展税收饶让范围等方式消除国际双重征税。在矿产海外投资方面也要强调有退有进，对持续亏损的“僵尸企业”，要按照国家要求尽早关停；对没有可持续发展前景的、处在产能过剩行业的、不符合战略导向的亏损企业，也必须制定明确的处置方案；在战略重点业务，如铜、铅、锌等国内紧缺的基本金属资源开发等方面加大投入。

（三）以“一带一路”为契机，拓展金属矿产国际合作空间

“一带一路”区域成矿条件优良，覆盖了全球四大成矿域的 10 个重要成矿带，分别为冈瓦纳成矿区域（印度成矿区）、特提斯成矿域（地中海成矿带、西亚成矿带、喜马拉雅成矿带、中南半岛成矿带）、劳亚成矿域（欧洲成矿区、乌拉尔—蒙古成矿带及西伯利亚成矿区）、环太平洋成矿域（东亚成矿带及楚科奇—鄂霍茨克成矿带）。金属矿产种类齐全、资源丰富，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在全球金属矿业持续低迷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必将进一步拓展金属矿产国际合作的空间，为中国金属矿业对外投资发展带来新机遇。“一带一路”金属矿产资源合作，第一需要关注的是增强文化包容与合作意识，有的放矢地制定金属矿业投资政策。第二是在做好“一带一路”区域地质构造勘查工作的基础上，加快研究该区域的金属矿产资源赋存特征和分布规律，有效发挥地质勘查工作对“走出去”的先行和推动作用，引导和支持矿业企业勘查开发境外金属矿产资源，推动建立境外资源基地。同时，集成整合各类地质信息资源，统筹建立面向“一带一路”的地质基础数据库，加强信息资源积累与更新。建设和运行服务于“一带一路”的地质信息服务平台，组成地质调查数据服务网、全国地质资料信息网等网站群，实现互联互通、全球共享。第三是加强“一带一路”沿线金属矿业风险监测评价，搭建矿业合作的稳定平台。

（四）“公私结合”，走“优势互补”的联合之路

目前，国际上充斥着“中国经济威胁论”或“中国资源掠夺论”的舆论偏见，以国有企业作为对外金属矿产资源投资主体经常被国外认为是政府行为，易遭到东道国的抵制，面临较大的社会、政治风险。要想打消外国政府和民众的顾虑，就必须弱化国有企业的政府背景。第一，在投资过程中民营企业在前，淡化国家色彩，展现商业形象，同时强化企业自身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切实落实企业对外投资自主权。政府背景较少的中国民营企业，相比拥有政府背景的国有企业，具有更为自主的投资灵活性，可规避更多的政策风险。它们大多依靠自有资金或融资进行海外矿产投资，使得项目所在国的戒心大大降低，海外投资的成功机率也大大增强。第二，将民营企业高效的机制与国有企业强大的政策、资金支持和管理背景相结合。随着项目的不断深入，后续开发矿产资源和管理经营等程序仍需耗资数以亿计，且金属矿产资源投资本身就有很大固有风险。因此，项目在进入实质性投产阶段，民营资本可根据产业链关系，通过兼并、收购或战略联盟等形式，与国有资本组建金属矿业集团公司，形成利益共同体，实现中国企业在金属矿产资源产业链上的纵深发展。

（五）鼓励企业规模化经营

国际资源开发属于一项技术工作，其开发不仅依赖技术水平还包括以技术为核心的综合实力。中国金属矿业的良性发展，需要金属矿企业之间的深入合作。在参与海外企业生产与经营的过程中，应鼓励那些有意在海外进行金属矿业投资并且有一定实力的企业之间兼并重组，以形成一批资金实力雄厚、技术领先的大型跨国公司；鼓励已经在海外投资的金属矿业企业与当地有实力的企业进行兼并重组，特别是工贸联合；鼓励“中方资本、西方管理”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收购或与国际巨头合作投资成熟项目，并由外方具体运营，特点在于充分利用西方管理团队，开发风险小、见效快，能保证生产的运行，甚至马上可以得到矿产品且供应稳定。

（六）尊重国际金属矿企业投资规则，注重社区建设和人文因素

中国企业投资海外金属矿不仅要关注金属矿产的储量和矿区潜力，也必须认真研究和遵守国际规则，关心可持续发展、环保和人文等问题。第一，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要学会与当地媒体和社区进行有效的沟通宣传，淡化投资项目的政治色彩；避免使用投资东道国民众不喜欢的口号，如“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资源保障”等；避免渲染国内各级政府或领导对企业的关心和支持；不要对外宣称中资银行可以提供低息贷款，以免外方误认为中国企业存在不公平竞争。第二，企业在获利的同时要特别注重环保和社区建设，要兼顾东道国的利益，促进所在社区的发展，树立共同开发、互利共赢的形象，争取做合格的本地化公司公民。采用先进的技术方法，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严格实施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发展绿色矿业，避免开采过程中损坏植被、破坏地表结构等对环境有害的行为；加强社会责任的投入，主动采取资金援助、食物派发、房屋补修等手段帮助当地社区民众，建设与矿业发展相关的援助设施；聘用当地人员、搭建以本地员工为主的管理班子，促进跨国企业和东道国的良好互动，从而开启“双赢模式”。

参考文献：

1. 胡小平：《实施全球资源战略“走出去” 勘查开发国外资源》，《地质与勘探》2003 年第 1 期。
2. 陈建宏、王斌、程运材、何艳梅：《中国矿业发展海外投资战略研究》，《金属矿采矿科学技术前沿论坛论文集》2006 年。
3. 王斌、陈建宏：《关于中国矿业发展海外投资的研究》，《矿产保护与利用》2006 年第 12 期。
4. 陈志、金磊、李钢：《中国矿产资源存在着怎样的缺口？——一个基本面的分析》，《经济研究参考》2007 年第 10 期。
5. 刘天宇：《加快中国矿产资源企业海外拓展之策略》，《当代经济》2008 年第 8 期。

-
6. 杨先明、黄宁：《中国资源型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挑战与对策》，《经济界》2010年第11期。
 7. 邹晓明、马杰、王玲玲：《中国铀矿资源对外投资战略研究》，《中国矿业》2010年第12期。
 8. 周铁军、刘传哲：《中国采矿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及动因分析》，《中国煤炭》2011年第1期。
 9. 姜鸿、张艺影：《中国维护矿产资源供给安全的自由贸易区战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2期。
 10. 张友先、马欣：《促进中国企业进行海外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若干建议》，《国际金融》2011年第3期。
 11. 张建刚：《中国能源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对策与建议》，《国际贸易》2011年第4期。
 12. 裘露露、朱菲菲：《资源型企业海外资源开发合作模式分类研究》，《中国集体经济》2011年第11期。
 13. 陈琳、陈云：《矿产资源海外投资的国际经验借鉴及中国的战略选择》，《战略决策研究》2012年第1期。
 14. 袁颖、焦小伟：《中国企业海外资源开发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2年第5期。
 15. 关秀丽、陈龙桂：《对外开放新阶段矿产资源类企业“走出去”战略研究》，《国际贸易》2012年第11期。
 16. 张金杰：《中国能源与资源对外投资》，《中国金融》2013年第1期。
 17. 赵乐：《海外矿产投资策略研究》，《国际工程与劳务》2013年第6期。
 18. 沈亮：《关于中国企业海外矿产资源投资的相关思考》，《经营管理者》2014年第1期。
 19. 申万、柴玮、张广军：《中国对外化石能源投资特征和现状分析》，《亚太经济》2014年第7期。
 20. 高宇星、瞿伟：《中国采矿业及其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分析》，《中国集体经济》2014年第12期。
 21. 何建华、严良：《中国采矿业对外投资现状及问题分析》，《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5年第3期。
 22. 刘伯恩：《“一带一路”矿产资源合作：机遇、挑战与应对措施》，《国土资源情报》2015年第4期。
 23. 常兴国：《2014年中国境外矿业投资中的新变化》，《中国矿业报》2015年8月1日。
 24. 王琼杰：《“走出去”：回头看看走过的路》，《中国矿业报》2016年3月2日。

责任编辑：李蕊

“十三五”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李 锋

摘要：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快速发展的良好态势。“十三五”时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面临一些挑战。世界经济深度调整、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不断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政策持续优化，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带来重大机遇；新一轮国际投资规则兴起、国际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发达经济体经济结盟、地缘政治风险增加，给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带来严峻的挑战。中国经济和企业实力不断增强，“走出去”“一带一路”和自贸区战略的深入实施，都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重要支撑，但也面临法律制度不健全、企业负面影响不断显现和国际人才严重不足等问题。

关键词：十三五 对外直接投资 机遇 挑战

作者简介：李锋，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一、国际环境层面

（一）世界经济深度调整为对外投资带来新机遇

在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形势下，深度调整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的新常态。一方面，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将成为新趋势。国际金融危机使欧美发达经济

^{*} 本文为 2015—2016 年度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基金课题《“十三五”时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研究》阶段性成果。

体重新认识到制造业在推动技术进步、拉动就业方面的巨大作用，将再造制造业视作推动经济复苏、提升经济活力的关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吸引制造企业回归，进而实现本国的“再工业化”。美国推出了《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重振美国制造业政策框架》《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等一系列措施，将制造业放在核心地位，积极实施制造创新国家网络计划，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鼓励企业在美国建厂，为制造业回流本土创造更好的条件，使美国成为新的就业和制造业的增长极，以重新确立美国制造业在全球的领先地位。德国政府提出了“工业 4.0”战略，日本和韩国等国家也重新规划了相应的产业发展战略。发达国家吸引制造业回流本国，有利于促进我国制造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放缓成为新常态。当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已占到全球 50% 之多。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放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降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过去支撑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逐渐消减。一是支持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本优势和资源优势逐渐减弱；二是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周期已结束；三是极为宽松的融资条件开始消失；四是国际贸易占世界经济的比例显著下降，且目前没有出现显著改善的趋势。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陷入了“中年危机”，国家经济结构的长期失衡直接导致其经济更加脆弱。为避免经济陷入困境，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加大了利用外资的力度，有利于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开展投资活动。

（二）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为对外直接投资创造良好的环境

截至 2016 年 1 月 6 日，我国已经与东盟、澳大利亚、巴基斯坦、秘鲁、冰岛、哥斯达黎加、韩国、瑞士、新加坡、新西兰、智利签署并实施了 11 个自贸协定，涉及 19 个国家和地区，还签署并实施了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内地与澳门的《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以及大陆与台湾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截至 2016 年 3 月 17 日，我国已经与全球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投资协定。这些已经签署的自贸协定和投资协定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当前已进行到关键阶段的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如果成功签署将为我国企业“走出去”带来重大利好。第一，签署中美 BIT 有利于推动国内外商投资体制改革。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对资本项目进一步开放和金融体制改革等提出明确要求，有利于促进对外投资体制改革。第二，签署中美 BIT 有利于推动我国签署更多的 BIT。投资和服务贸易将取代货物贸易成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中国如果与美国成功签署 BIT 就会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推动中欧 BIT 以及各类自由贸易区谈判中的投资议题早日解决，促进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在融入国际贸易规则体系中获得了对外贸易快速成长的机会，显著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和经济高速增长。中美签署 BIT 以及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签署 BIT、完成相关自由贸易区投资议题的谈判，将使中国在投资高度自由化和便利化中获得投资快速增长的机会，推动中国经济进入第二个黄金期。第三，签署中美 BIT 有利于摆脱在新一轮全球化规则制定中的不利地位。与美国签署 BIT，可以缓解我国被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边缘化的危险，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第四，签署中美 BIT 有利于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制度保障。美国 BIT（2012）范本确立了投资协定的“准入前国民待遇 + 负面清单”的模式，在很多国家所签署的自由贸易区协定中都包含“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内容。2013 年 7 月举行的第五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同意在双边投资协议中采用“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消除了中美投资协定谈判中的最大障碍，有利于中美签订高水平的投资协定。第五，签署中美 BIT 有利于夯实中美关系。中美 BIT 有助于消减双方的投资壁垒，限制美国滥用投资安全审查，推动中国放开服务业的投资限制，促进中美两国经贸往来机制化。

（三）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政策不断优化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认识到外资流入对东道国的积极作用，如弥补投资缺口、促进出口增长、带来先进技术、引入竞争机制等。为了更多利用外资，无论是新兴市场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加强国际投资合作，放宽外资准入限制，加大政策优惠力度，不断优化吸引外资政策。为了吸引到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发展中国家采取了提供投资激励、实行投资自由化、改善投资环境、签订国际投资协议等不同的方式和手段。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为加大吸引外资力度竞相出台税收优惠措施，推动发展中国家不断提高对外资的优惠程度，很多发展中国家对外资企业征收的所得税率比发达国家低 1/3 左右。此外，很多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免税期，一般为 5 年。泰国规定，“奖励”产业可免征 5 年所得税或 1 年消费税。印度尼西亚、巴西、墨西哥、加纳等国家都出台了类似的法律规定。除以上措施外，许多发展中国家还通过提供公有土地租赁费用减免等优惠措施，全方位吸引 FDI。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近些年纷纷放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指出，最积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是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国家，这些国家出台的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占发展中国家全部政策的 1/3 以上。具体来看，减少禁止与限制外资投资的行业部门数量是放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举措，还包括降低外资投资股比的限制、允许外国公司对当地企业进行兼并、鼓励外国企业参与当地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造

等。2013年8月印度联邦内阁批准一项提案，放宽零售行业外商投资限制，以提振疲软的经济增长。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还借鉴中国发展模式并结合自身的发展需要，设立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给予外商更多的优惠投资政策和投资便利。总之，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环境的改善，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更大的便利。

（四）新一轮国际投资规则给对外直接投资带来新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正积极谋求制定新一轮国际投资规则。新一轮国际投资规则的内涵正在发生质的变化，除了政策透明度、非歧视待遇、投资便利、税收政策、竞争政策、公司治理、财产权保护等内容外，新增加了企业社会责任、劳工标准、环境保护、投资者市场准入前国民待遇、国有企业和主权基金的投资行为规范等。目前，全球尚未建立统一、系统的多边投资规则体系，美国为了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占有主导权，积极推动建立高标准的国际投资规则。一方面，积极推动相关国家签署 TPP 与 TTIP，建立高标准的投资协议，推动区域投资自由化，引领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全球化的秩序安排。另一方面，积极推动签署高水平的双边投资协定，促进投资自由化，引领全球投资规则。面对美国在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战略的调整，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美国主导的 TPP 与 TTIP 对中国对外投资将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第一，在国际投资规则体系中，排他性的双边和多边投资协定快速发展。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欧洲等传统的投资输出大国纷纷着手建立排他性的双边和多边投资协定，降低相互间的准入门槛和投资限制，拓宽投资领域，进一步推动相互间的投资自由化。第二，在国际投资规则的内容上，加大对国外直接投资的安全审查。国际金融危机后，许多国家在制定国际投资规则中，引入多种措施扩大东道国对国际直接投资的监管权力，扩大东道国政府对国际直接投资事务的管辖范围，特别是通过引入国家安全、金融安全、环境保护等一般性例外措施，扩大东道国的监管范围。第三，在国际投资主体上，更加强调投资公司的社会责任。为了使投资公司更好地服务于本国经济发展的目标，许多国家开始在其签订的国际投资协定中加入投资企业的社会责任条款，要求投资公司在环境保护、人权发展、遵守劳工标准及反腐败等方面发挥作用。

（五）国际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增加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不确定性

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了国际投资保护主义的抬头。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纷纷出台法律，对外资并购进行安全审查。澳大利亚 2008 年公布了规范和审查外国政府对澳大利亚投资的六项措施，主要审查外国国有企业和主权财富基金对澳大利亚的投

资是否损害其国家利益。由于我国境外投资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主要投资领域又集中于高新技术和资源能源方面，这些投资保护措施直接影响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二十国集团（G20）2011 年发布的《国家贸易投资评估报告》认为，G20 成员国的投资政策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整体而言近期投资的限制政策明显增多，导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放缓。尽管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强调和平崛起的发展方针，但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仍有一部分政治势力坚持“冷战”思维，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快速发展，频频以国家经济安全为由，阻止我国企业开展并购活动，这增加了中国境外投资的不确定性。由于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规模都比较大，涉及的利益面比较广，投资保护主义极大地打击了国内投资者的积极性。美国的外国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对我国企业赴美投资增加了障碍和不确定性。美国对外国直接投资坚持自由政策，基本没有限制，也没有专门的外商投资法律制度，更没有外资审批制度，对外资实行的是登记制、申报制。近 20 年来美国的投资管理制度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外资管理法律体系包括《国际投资与服务贸易普查法》《外国农业投资披露法》《1920 年矿产租赁法》《1950 国防生产法》《1954 年原子能法》等，以及对外签订的与投资有关的协定。但是，美国对外资进入国防、航空、海运、通讯、金融、水力发电、自然资源开发、原子能开发等领域设有禁止或限制措施。同时，美国还基于国家安全等需要，制定了投资审查和报告制度，对某些投资有权进行审查，并在特定领域实行有限的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根据美国总统第 11858 号行政令，美国于 1975 年组建了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着手建立美国外国投资安全审查制度。CFIUS 的法规经历了三次大的变革。第一次变革以 1988 年通过的《埃克森－佛罗里奥修正案》为标志，确立了以 CFIUS 为中心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第二次变革以 1992 年通过的《伯德修正案》为标志，主要是加强对有外国政府背景的收购案的审查。第三次变革以 2007 年通过的《2007 年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为标志，修改了 CFIUS 的立法依据——1950 年的《国防生产法》相关章节，重新规定了在国家安全审查案件中应当考虑的因素；其中就包含与国有企业直接相关的条款：是否是国有企业进行并购，该国有企业所属国是否有在防止核扩散、反恐、技术转移方面的不良记录。2008 年 12 月，美国财政部颁布了《外国人合并、收购和接管条例：最终规定》作为 2007 年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的实施细则。CFIUS 审查的重点是“关键性基础设施产业”和“关键技术”。“关键性基础设施产业”包括制造业、电信、能源、金融服务、水务、运输、信息等产业。中国与美国确定的“关键性基础设施行业”密切相关的行业主要是：制造业、电信业、能源业和金融业，其中制造业、电信业和能源业受到的影响最大。“关键技术”主要指与国防密切相关的关键元件、关键技术、关键技术项目。CFIUS 对“关键技术”的

审查特别关注并购企业和政府之间是否存在战略协调，而中国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使其成为该条款的重点应用主体。2005 年，美国国会以“战略产业安全”为依据否决了已被小布什政府所批准的中海油对美国石油企业优尼科的股权并购。2012 年，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在长达 11 个月调查后发表报告，以“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风险”为由，表示美国电信运营商不应和中国华为、中兴通讯两家公司进行合作。值得警惕的是，即使投资并购行为仅仅涉及经济安全问题，在 CFIUS 的审查过程中也可被政治化。主要是因为：收购对手希望以此获得更有利的谈判地位；或是被收购的美国公司想获得更高的要价；或是部分政治家希望以此表明对华立场、增加选票等。在中海油并购优尼科的过程中，并购案件被政治化是其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同时，由于威胁国家安全在跨国投资审查中是一个比较难界定和衡量的，美国国会通过的外资监管相关法律授予总统和外国投资委员会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外国投资委员会成为一个运作和审查过程都缺乏透明度的机构，其保密的特性使得相关信息公开程度非常有限，决策带有随意性并且缺少清晰的流程和文本说明，甚至一直未给出“国家安全”的准确定义。

（六）发达经济体经济结盟不利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一直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引擎，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为推动发达经济体经济快速复苏并继续主导世界经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始从军事结盟、外交结盟转向经济结盟。经济结盟的主要策略是组建自由贸易区，以此形成发达经济体的自由贸易网络，对于非经济结盟的国家和地区形成战略挤压。美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主要是“一体两翼”，一体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相当成熟；两翼就是美国正在努力推进的 TPP 和 TTIP。发达经济体经济结盟的突出特征是推行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高标准的劳动条件、居住条件、福利条件等都将对我国对外投资造成影响。当前，以“准入前国民待遇 + 负面清单”为核心的新一轮投资标准正在成为欧美主导国际投资格局的新手段。美国推动的最新版的双边投资协定成为范本，不仅包括以前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最惠国待遇、税收转移、损失补偿、投资争端解决等传统议题，还增加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国有企业、劳工、环境、业绩要求等新条款。美欧两大经济体正试图通过经济融合，联手将欧美标准拓展为全球标准，虽然有利于促进发达经济体相互投资，但是将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

（七）政治风险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障碍

对于企业对外投资来说，政治风险是集成的、巨大的、不可抗的。特别是固定资产投入大、投资回报期限长的海外基建项目，对当地政府的履约能力依赖性更高，企业对

外投资所在地执政政府一旦更迭或者政治环境发生变化，投资企业将遭受巨大损失。西亚、北非局势动荡时期，中国在利比亚有 70 多家企业投资基建和电信项目，其中 50 个大项目的合同金额近 190 亿美元；中资企业在利比亚的固定资产、原材料、工程垫付款等方面的损失以及撤离安置人员费超过 200 亿美元。2015 年的希腊比雷埃夫斯港事件凸显我国政府在对外投资政治风险担保等方面还存在巨大的提升空间。多数情况下，往往都是企业独自承担对外投资的政治风险，这无疑加大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系数。当前，国际形势纷繁复杂，在欧洲，英国脱欧公投引发的地缘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冷战后最剧烈的变化，其外溢效益将传递到更多国家和地区；在亚洲，一些国家受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推动，在岛屿争端和海洋权益问题上不断挑衅；在中东，“伊斯兰国”“基地组织”等极端恐怖势力的异常活跃，不断影响中东政治版图与国际反恐格局；在西亚北非，政局持续动荡，埃及政局发生剧变，利比亚局势严重恶化。同时，中国周边地缘关系复杂，民族、宗教矛盾突出，价值观和战略诉求不同，一些国家发展基础薄弱，各种矛盾冲突突出，政局不稳，局部冲突时有发生，一些国家法制不健全，投资风险较大。这些因素导致少数国家在大国之间左右逢源，对我国抱以既合作又防范的矛盾心态，带来很多不确定性，抬高了我国企业进入的门槛，增加了企业对外投资的难度和风险。

二、国内环境层面

（一）“十三五”时期国家更加重视企业走出去

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走出去步伐，要求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努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的角度提出，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的角度提出，支持企业扩大对外投资，推动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物流链，建设一批大宗商品境外生产基地，培育一批跨国企业。《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从建立促进走出去战略新体制的角度提出，确立并实施新时期走出去国家战略，加强对走出去的统筹谋划和指导，提供政策支持和投资促进，研究制定境外投资法规，放宽境外投资限制，简化境外投资管理，加快建立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制度，加快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商签投资协定，推进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有机结合、相互配合，促进高铁、核电、航空、机械、电力、电信、轻工、纺织等优势行业走出去，支持我国重大技术标准走出去，鼓励企业制定中长期国际化发展战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从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的角度提出，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

济的趋势，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完善境外投资发展规划和重点领域、区域、国别规划体系，健全备案为主、核准为辅的对外投资管理体制以及对外投资促进政策和服务体系，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深入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因地制宜建设境外产业集聚区、大宗商品境外生产基地及合作园区，支持企业扩大对外投资，引导企业集群式走出去。

（二）我国进入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根据国际经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 5000 美元的国家，将进入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阶段，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明显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往往表现为正值，并呈逐步扩大的趋势。2011 年我国人均 GDP 超过 5000 美元，对外投资呈现加速上涨的趋势，印证了对外投资发展阶段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匹配的规律。“十二五”期间，我国“走出去”战略加快推进，企业“走出去”水平不断提高，境外投资加快发展，主体多元、领域广泛、规模扩大、水平提高，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十二五”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是“十一五”的 2.3 倍；2015 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创下 1180 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实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连续 13 年增长，年均增幅高达 33.6%；2015 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首次超过万亿美元大关。目前，我国人均 GDP 已超过 8000 美元，经过近 15 年的积累与准备，中国新一轮的对外直接投资正在开启，“十三五”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将继续保持快速发展的态势。商务部公布的有关数据显示，2016 年上半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155 个国家和地区的 4797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投资额累计 888.6 亿美元，同比增长 58.7%。

（三）“一带一路”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战略支撑

目前，“一带一路”已经从倡议变成了实际行动，从理念和总体框架设计进入实质性合作阶段。从筹建亚投行到成立丝路基金，再到国家开发银行的近千个项目，“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明显进展，获得了多方积极响应，为各方在投资领域的深度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积极统筹国内各种资源，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合作和对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主要领域的合作进展顺利。中国与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卡塔尔等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与俄罗斯、老挝等毗邻国家签署了地区合作和边境合作的备忘录以及经贸合作中长期发展规划。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毗邻国家研究提出了中哈、中吉毗邻地区合作规划纲要。一批重大设施联通项目取得突破，中国与塔吉克斯坦启动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 D 线建设，开工建设中俄天然气管道东线，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项目正在加快推

进，中缅铁路和公路、中老铁路、中巴公路、中吉乌铁路、缅甸皎漂港、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等一批重大项目也取得突破。沿线各国的资金融通取得重大进展，发起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重点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互联互通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促进沿线国家互通互联，形成互补共赢的合作局面，进一步增强沿线国家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加速经济一体化进程。“一带一路”战略将成为亚洲经济一体化的“两翼”，有效连接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等地区，显著改善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状况和营商环境。“一带一路”战略将打造互联互通的亚欧大陆，改变亚欧大陆长期封闭的状态，推动亚欧大陆各国进行更深层、更广泛、更多样的区域合作，为亚欧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一带一路”将通过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战略合作，促进政策沟通，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新架构，促进经济要素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区域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经济、教育、科技和金融合作。

（四）自贸区战略有利于促进对外投资加快发展

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关键举措。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自由贸易区，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自由贸易区战略成为深化对外开放、全面融入世界经济的新途径。党的十八届三中、五中全会提出自由贸易区战略的主要目标是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自由贸易区不仅包含区域贸易自由化内容，还包括推动区域内投资便利化。目前，我国已与 22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 14 个自贸协定，为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条件。近期，我国积极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和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推动建立亚太自贸区，这些双边和多边自贸协定是深化经贸合作的制度性安排，有助于全面推进双向开放，将极大便利对外直接投资，把加强相互投资合作带向更高的水平。

（五）国家积极推动国际产能合作

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是我国顺应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和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现实需求的战略举措，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国、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各自的比较优势。“十三五”时期，国家将大力推动国际产能合作，2016 年 3 月发布的《“十三五”规划纲要》全面部署了“十三五”期间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的主要方向和重点领域，把中国的优质产能与发达国家的关键技术结合起来，把中国的优势装备同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需求对接起来，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中国积极推动开放、包容、

互利、共赢的国际产能合作，得到了很多国家的积极呼应，部分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释放了企业跨境经营的活力。我国将围绕“一带一路”战略，积极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加快构建利益共享的全球产业链，推动企业国际化发展，将中国的产能优势与国外的市场需求有机结合起来。

（六）中国企业具备了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实力

伴随中国经济和全球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近年来，一批批中国企业奔赴海外，正逐渐从本土企业发展为跨国企业，并朝着全球化企业跨越，战略布局基本上具备全球化的视野，通过整合全球市场资源与国际资本要素积极参与全球竞争，正逐渐成为对外投资的主体。随着国内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企业“走出去”的愿望日益强烈，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已从传统的在境外设立贸易公司发展 to 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境外建立研发中心或通过并购等方式开展高新技术和先进制造业投资，这些都成为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新动能。同时，民营企业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推动力，开始在科技研发、高端制造和现代服务业等高附加值行业进行投资，改变了以前主要靠国有企业“走出去”的局面，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占比已由 2006 年的 19% 升至 2014 年的 46.4%。

（七）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制度不健全

尽管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日益完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1948 年，美国就制定了《经济合作法》《对外援助法》《税收法》和《共同安全法》，以法律保障私人对外直接投资。随着美国经济日益强大，美国政府又出台了《美英贸易和金融协定》《肯希卢伯修正案》等系列法规，鼓励本土企业向全球投资。目前，美国签署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有 1800 多个，避免双重征税协定 1900 多个，为美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制度保障。欧盟制定了《多边投资协定》，不仅减少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还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机制保障和各种便利。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法规体系不够完善，尤其是缺乏一部统一的对外投资法。

（八）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不断显现

随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步伐的加快，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负面影响不断显现，特别是民营企业大面积对外投资带来了一系列负面作用，如逃税、资本外逃、人民币套利、政治避险等。同时，一部分对外投资企业忽视企业社会责任，不重视安全生产，违法用工，破坏生态环境，让中国对外投资承担了很多骂名，甚至引起一些国家强烈的反

华情绪。在与东道国政府交往的过程中，一些企业违反商业道德，通过贿赂等非正常手段争取项目和投资机会。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负面影响的主要原因是：缺乏长期规划，追求短期利益，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不强，经营管理能力较弱，不了解东道国的法律制度，不熟悉国际通行的做法，企业经营的随意性比较大。

（九）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人才严重不足

对中国企业而言，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的挑战是国际化人才严重不足。一方面，缺乏具备良好协调能力的海外投资人才。对外直接投资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章、文化习俗和营商环境，比国内更为复杂，需要熟悉异域文化、法律体系、商业习惯的海外投资人才，开展协调与项目管理工作。另一方面，对外投资企业还没建立充分利用海外人才的用人机制。很多对外投资企业薪酬体制、经营理念、管理方式尚未与国际接轨，无法吸纳全球英才为企业所用。美国很多跨国公司都在享受国际人才红利，谷歌 30%的员工是亚裔，其中大部分是中国裔。

参考文献：

1. 崔凡、赵忠秀：《当前国际投资体制的新特点与中国的战略》，《国际经济评论》2013 年第 2 期。
2. 裴长洪、樊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特定优势》，《中国工业经济》2010 年第 7 期。
3. 桑百川、靳朝晖：《国际投资规则新发展及对中国的影响》，《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3 期。
4. 王金波：《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应对》，《国际问题研究》2014 年第 2 期。
5. 王玉主、富录筠：《当前亚太区域合作形势分析》，《亚太经济》2013 年第 4 期。
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新华网，2015 年 9 月 17 日。
7. 杨志琴：《新形势下企业“走出去”：机遇、挑战与策略》，《江苏商论》2012 年第 10 期。
8. 张建红，周朝鸿：《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制度障碍研究》，《经济研究》2010 年第 6 期。

责任编辑：艾 冰

加强财政、货币、发展政策 协调配合研究

梁云凤 刘西友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逐步建立起的发展（计划）、财政、货币三大政策相互协调的宏观调控体系，是我国经济能够长期保持较快发展的重要保障。当前，需求管理政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间缺乏有效衔接，三大政策的配合效果，受到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国有企业制度等因素的制约，宏观调控目标与手段在个别领域和环节存在脱节现象。要围绕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形成战略构想、发展规划、政策思路、改革方案、重大工程等领域的政策储备，统筹协调财政、货币、发展三大政策，增强宏观调控政策体系的有效性。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 宏观调控 政策协调 财政 货币 发展

作者简介：梁云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刘西友，国家发展改革委重大项目稽察办助理研究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其中经济制度与体制发挥着基础性支撑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能够长期保持较快发展，还取决于有一个平衡机制。这个平衡机制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逐步建立起的发展（计划）、财政、货币三大政策相互协调的宏观调控体系。“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为主，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价格政策协调配合的

政策体系，增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性。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建立和完善，我国借鉴西方经验，结合实际国情，加大了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政府在宏观调控过程中，经验越来越丰富，手段也越来越多样，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越来越要求精准和科学。当前，要围绕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形成战略构想、发展规划、政策思路、改革方案、重大工程等领域的政策储备，统筹协调重大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增强宏观调控政策体系的有效性。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财政、货币、发展政策协调配合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总体方向和重要任务，是经济新常态时期立足现实做出的重大部署。应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通过改革的办法来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的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改善供给质量，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主要内容包括化解过剩产能、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新兴产业的支持和培育等方面。具体任务包括：去产能，先从钢铁和煤炭两个行业入手，因为钢铁和煤炭现在产能过剩的情况比较突出。去库存，关键还是房地产库存，特别是三、四线城市。去杠杆，主要是企业的杠杆，从金融系统一直到企业，都需稳妥处置。降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不合理收费等。补短板，主要是通过加大投资的力度来补短板，促进结构的调整。

财政收支和信贷收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两大基本工具。从中外各国宏观调控实践看，财政政策着重于结构优化，在促进经济增长、推动结构调整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货币政策带有总量调节特征，在总量平衡和保持币值稳定方面作用显著。财政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及差异性特征，决定了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使用的必要性。发展政策体系主要由中长期规划、专项规划和年度计划等组成。研究制定中长期规划，是发展政策制定工作的重点。专项规划对于改变经济和社会某些方面的面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制定专项规划必须有明确的任务、目标和相应的政策措施、组织体系。年度计划的主要任务是根据中长期规划和专项规划的要求，搞好短期社会总供求的大体平衡，保证经济的健康运行。

财政、货币、发展政策之间形成合力，是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特色。财政、货币政策的政策工具单一，财政、金融两部门的配合有时不一致，两大政策相互越位等，迫切需要发展政策从中予以协调。实践中，三大政策既相互制衡，又相互配套，形成调控合力，才能达到减缓波动、优化结构、稳定发展的目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发展政策，同计划经济的计划有着根本的不同：它不再是指令性计划和以实物指标为主的计划，而是指导性、预测性、政策体系。在发展政策统筹下，财政、货币政策具有明确的

分工。财政政策运用预算和税收杠杆，促进结构的优化。财政资金对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起引导作用，通过贴息、减税、资本金补助等手段，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货币政策利用货币杠杆，保持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大体平衡。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对货币总量的调控，调节总需求规模，保持币值稳定。根据国际经验，在经济快速成长期，广义货币（M2）的增长速度保持在经济增速的2倍左右比较合适，既能满足经济发展对货币的需求，又不会产生通货膨胀。大体说来，市场经济基础较强、金融体制较完善的国家，货币政策相对有效；市场经济脆弱、金融体制落后的国家财政政策相对有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与一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市场体制和金融体制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

建国初期，国家重视财政收支平衡、市场商品供求平衡、信贷收支平衡以及三者之间的协调。毛泽东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中，把“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提出来。20世纪70年代，发展形成了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理论和财政信贷政策协调配合理论。改革开放以来，在吸取计划经济时期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我国在政策制定和调整上作了较大变革，尤其在发展政策引导下，财政、货币政策围绕宏观调控目标协同运作，适时适度，提高了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二、财政、货币、发展政策协调配合中的几个突出问题

（一）经济体制制约三大政策未实现有效协调配合

财政、货币、发展三大政策的政策效能，不仅取决于单个政策本身，更取决于政策对于经济社会结构的合理性和体制条件的适宜性。预防性储蓄需求强，收入分配差距大，消费需求不足，经济结构调整不到位，这些因素都制约财政政策发挥预期作用；货币政策目标的多重性、货币传导机制不畅通等因素，制约货币政策有效发挥作用；市场体系尚不完善，要素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信息市场的发展与商品市场的成熟程度呈现明显的不协调，导致发展政策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三大政策的配合效果，除决定于各自政策的作用机理、政策间的合理搭配外，更受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国有企业制度等因素的制约。财政体制方面，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空间下降，削弱了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金融体制方面，国有商业银行仍没有真正摆脱行政隶属的地位，国有企业对银行的过度依赖，不仅加大了银行的负担和风险，也导致银行角色和功能的模糊与紊乱，使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调控举措难以做出灵敏的反映。

（二）宏观调控目标与手段在个别领域和环节存在脱节现象

财政、货币、发展政策工具并不能完全符合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充分就业、高速增长、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需要。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应该由市场发挥作用和企业自主决策的经济活动有些还没有放下去，中央已经放权的，有的没有落实到企业；在微观经济放开搞活的同时，还缺乏有效的宏观指导和调控；货币政策操作空间受到限制。一方面，稳增长需要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另一方面，大量资金可能流入过剩行业，对结构调整起到负面作用；发展政策决策缺乏责任约束和行为规范，还存在某些脱离实际、不能及时反映经济社会运行变化的现象，政策确定以后，缺乏有效的实施手段和措施，常常出现目标与手段脱节问题。如中央早就提出扩大居民消费、提高第三产业比重等，但收效甚微，有的问题甚至更加恶化；各种调控手段的运用难以协调配套，宏观调控偏重于直接干预，方法和手段比较单一，缺乏有力的调控手段。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单项政策内部不协调、财政、货币和发展政策主管部门配合不默契、缺乏政策效应的传导机制及协调机制等。

（三）需求管理政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

针对当前经济下行的趋势，仅从需求侧着手，已经很难有所突破。需求管理，主要是对拉动经济增长的最终消费、总投资和净出口三大因素的管理。总需求增长过快，短时期内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了，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引起经济的大起大落；需求增长过慢，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偏小，经济增长速度则减慢，使经济中蕴藏的潜在增长能力不能充分发挥。供给侧与需求侧双侧入手进行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实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使供给体系更好地适应需求结构变化。同时要看到，在需求和供给两者之间，还有一个中间端。这个中间端有政府的因素，有市场的因素，有法治社会环境的因素，比如税负负担重、物流成本高、场地租金贵、流通环节多、消费环境差等。以上因素并未有效衔接好供给侧和需求侧，阻碍了需求管理政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举措之间良性互动。

三、财政、货币、发展政策协调配合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一）德国

德国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时，注重建立法律和法规，将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纳入法制化轨道，并重视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协调配合。从战后初期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维护保持通货稳定，德国政府主要采取了控制财政赤字和货币供应量等措施。通过价格改革，恢复了市场机制的功能；通过货币改革，重新确定了有效的货币制度。德国中央银行全权负责货币发行和市场物价的稳定，独立性较强。独立运行的银行体系，为德国经济在这一时期保持稳定增长提供了环境条件。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初，以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持高就业为主要目标，德国推行了凯恩斯主义政策，实行了政府全面干预的市场经济体制。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以后，恢复了政府有限干预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财政政策注重维持收支平衡，货币政策注重保持物价稳定。

2007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德国政府采取了积极宽松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帮助金融机构和企业及时克服危机带来的困难：2008 年 10 月—11 月，推出 5000 亿欧元救市计划稳定金融市场、通过“以促进增长保障就业”振兴经济方案、批准 310 亿欧元经济激励计划。

（二）欧盟

为了保持欧盟经济的稳定、欧盟国家从整体上能够采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及其不同的政策组合。但是，对欧盟成员国每个主权国家来说，他们均向欧盟让渡了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两种宏观经济调控手段，财政政策就成为调控经济、应对外部冲击的最主要措施。这种情况下，财政、货币两大政策的协调呈现单向特征：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远不如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灵活、积极。为促进成员国加强财政约束，负责欧盟货币政策的欧洲中央银行不愿放松货币政策。罔顾瞬息万变的欧盟经济运行形势和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欧盟长期实行的宽松财政政策与从紧货币政策组合，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投资和经济增长。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欧盟成员国普遍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刺激计划。再加上老龄化问题、医疗支出压力等长期因素的作用，各国财政赤字急剧攀升。由于担心希腊政府违约，投资者开始大规模抛售希腊国债，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全面爆发，并出现在欧元区传染的态势，欧元面临贬值压力。货币政策需要强有力的财政政策的支持。欧元区两大

政策不协调的理论后果在主权债务危机中得到验证。缺乏应对危机的应急救援机制，是欧盟财政货币两大政策不协调的又一表现。欧盟需要加强财政政策或经济政策一体化，使用好财政政策，有助于实现欧洲中央银行的中期物价稳定的目标。2016 年 1 月 27 日，欧洲中央银行执委库勒表示，为实现欧元区经济复苏，成员国政府需采取以稳定为导向的财政政策，以支持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

（三）韩国

韩国的宏观调控长期是以计划为中心。把财政预算支出计划和经济发展计划统一起来，用预算计划和信贷计划支撑经济发展计划是韩国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上的一大特点。20 世纪 60 年代初期成立的经济企划院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中枢，负有制定计划、政策协调、编制预算和维护市场四大职能。

韩国从 1962 年至 1991 年 30 年间，经济年均增长 8%，特别是 1986—1988 年，其利用国际范围内出现的石油价格低、国际贷款利率低和美元比率低的有利环境，实现经济增长连续 3 年平均达到 12%，同时物价上涨率不超过 3%。1997 年 11 月，韩国爆发金融危机，促使韩国对经济进行了全面重组和改革。为了应对突然贬值给韩国经济造成的混乱，韩国政府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收紧国内需求，改善了经常账户，稳定了汇率。流动性危机解决之后，韩国政府转向扩张性政策，产出随之迅速增长。在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韩国金融体系再次暴露出其自身的脆弱性，在韩的外国资本大量出逃，金融状况恶化。面对冲击，韩国建立了由总统直接负责的“非常经济对策会议”制，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放松国内货币政策，对金融机构进行再注资。同时，为增强经济在中长期的竞争力，韩国政府积极改善经济结构，对企业、劳动力市场等各部门进行全面改革，增强了经济活力。

（四）日本

日本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国家。日本政府重视产业政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其中产业政策处于主导地位。二战后，日本在解散财阀、农地改革和劳动制度改革等措施基础上，重建起竞争性寡头垄断市场经济。政府通过行政、法律、经济等手段，主动介入经济活动。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任务，制定产业政策，并在财政、金融政策上给予扶持。通过减免税收、提供优惠利率等手段，重点扶持国家基础产业和有发展前途的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促进经济的均衡快速发展。

日本的宏观调控实际上是以财政为中心。日本在短时期内迅速实现现代化，出口大幅度增长，靠的是财政投资、融资的支持。特别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70 年代经济高速

增长时期，政府用财政手段集中了大批建设资金，将政府、民间储蓄、年金收入等集中起来，建立“官民并举”的财政投资贷款，以贯彻政府产业政策。日本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中，财政预算资金、国债基金、邮政储蓄和保险基金等，被用于政策性投资贷款。在政府的窗口指导下，上述来源的资金通过引导商业银行贷款，支持了产业政策的实施和经济计划的实现。采取扩大生产性开支的财政政策，对不景气的行业实行特别的财政优惠政策，对有发展前景的行业给予免税和财政补贴。可以说，财政投资、融资是日本宏观经济管理的最成功之处，是日本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美国

美国是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决策的主体是消费者、生产者和政府。联邦政府层面不制定统一的经济发展计划，只制定以经常项目为主的财政预算计划；国家也不制定产业政策，但在不同时期，对某些行业实行保护性关税政策；企业资金的来源以直接融资为主，以间接融资为辅。

美国重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但没有明确的产业政策。罗斯福新政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中更偏重于财政政策，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70 年代以后，美国随着经济陷入滞胀，逐渐地从倚重财政政策转向货币政策，采用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为基础的混合经济政策，较多地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进入 90 年代后，继续偏重货币政策，而且将原来控制货币供给量和利率的两大政策手段并用变为重视贴现率，很少运用改变存款准备金制度，也极少采取公开市场业务手段。

美国虽无明确的产业政策，但是美国政府一直重视教育和科研及新产品开发，对其进行财政和金融方面的支持，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产业升级。美国的外贸政策则为产业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使得市场需求充足，极大地带动了产业的增長。这说明，为了保证经济长期的稳定发展，仅仅依靠财政和货币政策是不够的，只有搭配比较合理的产业政策、外贸政策等，才能够从根本上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六）启示

第一，要总结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历史经验教训证明，为了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必须搞好经济总量的管理。避免财政支出和货币供给失去控制，进行科学的需求总量管理，才能防止经济增速大起大落。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都把需求总量的管理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东亚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某些时期内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只有按照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客观规律，合理把握和适

时适度调节社会需求总量，才能把握好经济发展的势头，既避免需求过旺、经济过热为后几年的发展埋下隐患，又避免刹车过猛，引起社会经济的震荡。

第二，要选择符合本国实际国情的宏观调控体系。虽然德国、日本和韩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各有不同，但实践证明都是成功的。这是因为他们的体制符合本国的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文化和社会背景、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同时适应了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主要任务的要求。尽管目前日本和韩国的宏观经济体制同高速增长时期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但他们的历史经验以及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都证明，后发展国家要实施赶超战略，在较短的时间内走完发达国家用两三百年走过的道路，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把资源集中配置到经济效益最好的地方，依靠国家的力量来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如果没有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仅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工业的发展必然要走一条漫长的道路，即先是大量低水平的重复建设，然后再通过竞争不断地提高生产技术水平 and 集中度。如此，后发展的优势就不可能得以发挥。

第三，不同经济运行阶段要选择不同的政策搭配方式。宏观经济有其运行和发展的内在规律。财政、货币、发展政策的协调配合，要从把握经济运行规律的角度出发，针对不同的经济形势和现实必须采取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既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遵循一定的原则，又要保持其灵活运用的可能性和抉择性。以德国为例，20 世纪 60 年代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而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由于通胀居高不下，经济增长乏力，出现了严重财政赤字和经济危机，转而实行了平衡财政政策，经济运行状况逐渐好转。

四、完善财政、货币、发展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财政、货币、发展政策三大调控杠杆相互协调的宏观调控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面临重大调控任务时，三大政策必须密切配合，协调行动，如能形成合力，则事半功倍。当前，三大政策围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增速止跌回升，在结构优化中实现平稳较快发展，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协调配合，共同发力。

（一）深化行政管理、财税和金融体制改革

当前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归根到底是结构问题、增长方式问题和体制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只有靠改革。改革必须抓住主要矛盾，深化关键领域的改革，完善政策效应传导机制。

改革行政管理体系。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和社会

自治功能优势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管理网络，形成对全社会有效覆盖和全面管理的体系。完善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方式和方法，注重从源头上减少人民内部矛盾的发生，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公共财政制度，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建立责任与支出相适应的财税制度。加快形成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深化税制改革。对收入水平低的行业实行结构性减税让利，降低中高档消费品进口关税，进一步提高小微企业增值税的起征点，加快服务业营业税改增值税推广，加大对自主创新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

加快金融体制改革。1998年及后续几年，扩大内需中货币政策的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关键是金融体制改革后，历史遗留的不良贷款过多，银行难以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要建设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规模和比重。深化银行、保险业改革。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满足中小微企业和农户贷款需求。建立以用汇为主的外汇管理体制，提高资金周转率和使用效益。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及时化解金融风险，切实维护金融安全。

（二）加强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机制化建设，突出发展政策的综合协调功能

深入领会和贯彻“五大发展理念”，把握发展新特征，正确运用宏观调控的手段，更好地发挥国家发展政策的综合协调功能，使发展、财政、货币三大宏观调控手段形成合力。

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突出战略性、宏观性和政策性，更好地发挥发展政策的综合协调功能。抓紧改革和完善规划体制，健全编制程序，完善国家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的管理和实施机制，形成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为统领，各类规划定位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规划体系。加强对重大问题的研究，搞好年度计划、专项计划和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通过中长期发展规划与年度计划，围绕提高居民消费率等目标，制定国民收入分配政策、投资与消费政策、国际收支平衡政策等。通过制定发展战略、产业政策、区域规划，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和地区生产力的合理布局。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统筹安排和政策协调，协调财政货币政策的目标、财政赤字和金融不良资产的定期跟踪测算、财政金融稳定性的预安排、财政金融政策和操作工具进行互动效率评估和化解金融不良债务安排等。完善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财政支出要能够支持产业政策目标的实现，政策性信贷体现产业政策规定的优先顺序，税收政策按产业政策有所倾斜和体现

差别，国有资产存量分布结构按照产业政策进行调整。通过改革创新、结构升级重点提高财政、金融、能源、矿产资源、水资源、粮食、生态环保、安全生产、网络安全等方面的风险防控能力，将发展成果更多转化为防范风险、保障安全的能力。

（三）更加注重宏观调控政策的中长期选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长远来看，我国经济成长中结构性矛盾的不断积累，短期政策连带的“副产品”，可能将在长期使得我国经济成长中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所以，在考虑应对危机的策略时，既要考虑眼前救急，也要考虑中国经济更为长远的可持续、健康、和谐的发展。在继续搞好对总需求短期调控的同时，要把更多的精力用到研究并采取长期供给政策上，着眼于改善中长期供给能力，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化解过剩产能、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增长极、增长带，加快推动经济结构优化，不断提高要素产出效率，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提升经济潜在增长能力，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在宏观调控的实践中，应把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区别开来。在这方面，应汲取经验教训。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我国经济始终未能摆脱周期性大起大落的困扰。每隔四五年就要出现一次波动。在经济上升期时，各方面盲目增加投资，很快引发通货膨胀，紧接着开始治理整顿，压缩投资，正在建设的项目被勒令停工，造成较大的损失和浪费，并形成通货紧缩、增长乏力的后果。进入新世纪以来，通过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善宏观调控，我国终于摆脱了周期性大起大落的困扰，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高效益，走上了长期持续稳定增长的道路。这个经验没有过时，应当继承和发展。在当前的宏观调控工作中，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大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使总需求保持均衡增长，对经济增长保持均衡持久的拉动力。以结构调整为主的宏观调控，更需要财政、货币、发展三大调控杠杆形成合力。在宏观调控转向结构调整为主的时候，要更多地发挥财税杠杆的作用，运用贴息、资本金补助、降税等手段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特别是引导银行贷款投向。

（四）关注全球经济形势，财政、货币、发展政策要兼顾内外部均衡

在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财政货币政策、发展政策要实现协调配合，必须具备全球视野，统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多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蒙得尔·弗莱明提出的财政货币选择新理论指出，现实世界中的资本具有不完全流动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有效的，但其政策效应的大小取决于资本流动的完全程度。资本流动性越大，财政政策的作用越小，而货币政策的作用越大。在改革开放日益

扩大的进程中，随着资本流动性越来越大，要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应发挥的主要作用，实现以资源效率为主，兼顾机会公平原则。随着商品及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国际流动的发展，以及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度的增加，出现外部失衡问题在所难免。尤其是随着一国经济的逐渐开放，汇率水平变动的其他经济效应，如财富效应、收入分配效应、投资效应、资源配置效应、资本流动效应、货币效应等都会得到强化，汇率变动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更加复杂化。宏观调控不仅需要关注经济的内部均衡发展，同时也要注意重经济的外部均衡发展。政策搭配更加需要兼顾内外均衡。

在开放经济下，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之间的互动是频繁、复杂和多样的，这意味着传统理论很容易顾此失彼，无法统筹规划宏观调控的整体动态路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兼顾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根据自身政策搭配的历史演进和现实宏观经济环境变化作出相应调整。一方面，加快形成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主动加强与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协调和沟通，更加积极地参与多双边国际经济合作，提升国际话语权，推动国际宏观经济治理结构改革，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更加公正合理。另一方面，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拓展发展空间，为世界经济稳定复苏作出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 郑新立：《高度重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宏观经济管理》2015年第8期。
2. 郑新立：《关键是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平衡——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求是》2015年第4期。
3. 刘兴华：《德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走向及其协调》，《德国研究》2009年第4期。
4. 姜云飞：《债务危机背景下欧盟财政一体化的进展与挑战》，《世界经济研究》2013年第4期。
5.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韩国经济发展中的财政货币政策及对外经济政策协调》，《经济研究参考》2012年第37期。
6. 龔玮：《日本1985—1990年财政货币政策配合分析及对我国的启示》，《全国商情（理论探究）》2012年第2期。

责任编辑：艾 冰

我国真实城镇化率的特征、成因及对策建议

——国际比较视角

易 信

摘要：受大国客观因素与“重物轻人”城镇化发展模式双重影响，目前我国真实城镇化率水平与上升速度低于相似经济发展水平和相似发展阶段的国家，分别低于与我国经济发展特征相协调的城镇化率“正常值”约 4 个百分点和 0.17 个百分点。促进我国真实城镇化率水平适度上升与速度合理提高，应在理性认识大国城镇化规律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破农民进城的户籍、土地和社保等制度障碍，因地制宜发展比较优势产业，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走“产城人融合”“城乡协调互惠”的内生新型城镇化道路。

关键词：城镇化率 国际比较 新型城镇化

作者简介：易信，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预言：“中国的城镇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成为影响人类 21 世纪的两件大事”。预言已渐成现实，城镇化带动了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区域格局变化，并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版图。国际上衡量城镇化水平的主要指标是城镇化率。相对于我国的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和制度基础，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水平和上升速度是否合理，学界仍然存在较大分歧。总结分歧并测算我国真实城镇化率，进一步国际比较分析真实城镇化率的特征，探究真实城镇化率特征的形成原因，对于准确评估我国城镇化进程及制定合理的城镇化政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学界对我国城镇化率水平和上升速度的判断存在较大分歧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户籍制度从城乡隔离到开放本地有效的蓝印户口，再到中小城市的落户准入条件的放开，政府对户籍的管制程度越来越宽松，显著改善了人口在城乡间、区域间流动的制度条件和社会环境，促进了人口加快向城镇集聚的城镇化进程（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2013）。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4年的54.8%，年均增长达1个多百分点，每年有近1559万人成为城镇常住人口。同期，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从15.8%提高到36.3%，年均增长0.57个百分点，每年有近956万人取得城镇非农户籍。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前30年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从1949年的10.6%提高到1978年的17.9%，年均增长仅0.25个百分点，城镇常住人口年均增加也只有约396万人。此外，从全球城镇化大背景来看，全球城镇化率也仅从1978年的38.5%提高到2014年的53.4%，年均增长只有约0.41个百分点，远低于同期我国的城镇化速度。这均表明，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国的城镇化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绩。不过，需指出的是，由于这一时期推进的城镇化是在新一轮全球化、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以及城乡体制加快变革的复杂背景下展开的，学界对于我国城镇化率水平、上升速度与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和制度条件是否相协调仍然存在较大分歧，归结起来大致有如下三类观点：

一类观点认为我国的城镇化率水平偏高和上升速度偏快，即城镇化超前论。伴随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出现的城镇化率适度提高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我国城镇化在经过持续30多年的加速发展后，目前的城镇化率已经不低，再加上有些地方盲目攀比城镇化率指标，还形成了城镇化冒进趋势；我国目前的城镇化脱离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已经出现实际城镇化率偏高问题（陆大道，2007）。而且，现在广受质疑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指标，不仅没有高估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反而还因没有将大量具有城镇特性的“准城镇人口”纳入了城镇人口统计，在事实上低估了我国实际城镇化的广度和深度（朱宇，2011）。

另一类观点认为我国的城镇化率水平不高和上升速度也不快，即城镇化适宜论。我国当前的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在总体上是基本相适应的，只是城镇化的质量还需进一步提高（周一星，2006）。也有研究指出，总体上来说，我国城镇化水平虽滞后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以及国外同等发展水平国家或同样发展阶段的城市化水平，但目前的城镇化速度是基本合适的，不慢也不太快（简新华等，2010）。与由经济发展水

平决定的自然城镇化率相比，我国目前的实际城镇化率与自然城镇化率同步上升，而目前的城镇化水平偏低则主要是由前期城镇化不足所致（苏剑等，2013）。并且，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已经与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基本一致（许庆明等，2012）。

还有一类观点认为我国的城镇化率水平偏低和上升速度偏慢，即城镇化滞后论。建国以来，经过 60 多年的发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从解放初期的 20% 提高到 2009 年的 46%，城镇化率水平太低、上升速度太慢（厉以宁，2011）。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虽然偏低，但和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却是相协调的，只不过是低水平协调（陈明星等，2009）。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统计涵盖了大量不能与本地户籍城镇人口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农民工^①，因而高估了我国城镇化水平，我国的实际城镇化水平仍然偏低、上升速度偏慢（贾康，2012）。

综合来看，学界对我国城镇化率水平高低及上升速度快慢的判断仍然存在分歧，而形成分歧的主要原因则是城镇化率统计口径差异及比较标杆选取不同。具体来说，学界主要基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指标来判断我国城镇化率的合理性，而各研究采用的比较标杆则主要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历史城镇化进程、工业化历程以及其他国家城镇化水平等。笔者认为，判断我国城镇化率水平和上升速度是否合理，首要的是要选取能够真实反映我国城镇化率的指标，在此基础上通过与可比国家进行比较分析并基于各国城镇化的一般规律测算我国城镇化率的“正常值”，才能避免单个国家纵向比较中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弊端及横向国际比较中的“伪比较”等问题。

二、我国真实城镇化率水平和上升速度 均低于相似发展水平和相似发展阶段国家

事实上，目前学界广泛采用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指标均不能反映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状况。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指标以在城镇生活六个月以上的城镇常住人口作为城镇化率的统计基础，虽然考虑了农村转移进城人员已作为生产方式、就业方式实现了工业化，但是未考虑生活方式的变化，其实质上还只是劳动力的工业化，反映的是劳动力城镇化水平或生产方式的城镇化水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指标以城镇非农户籍人口作为城镇化率的衡量基础，没有包含已经从就业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城镇化的

^①据《2014 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4 年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已经达到 2.7 亿，约为我国城镇常住人口的 36.7%。

举家转移人口，反映的还只是公共服务意义上的城镇化率。理论上来说，能客观反映我国城镇化状况的真实城镇化率指标，应考虑了已实现劳动力与生活方式城镇化的举家转移人口。他们在城镇有固定的职业和居住条件，即便还没有被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或完全覆盖，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城镇居民或没有完全被市民化，但可以反映我国生活方式的城镇化水平，与国际上通行的城镇化率指标有可比性（宋立，2014^a）。

以城镇非农户籍人口与举家迁移农村人口作为城镇人口的统计基础，测算我国的真实城镇化率。测算结果显示，我国的真实城镇化率从 1978 的 16.4% 提高到 2014 年的 39.8%，36 年间上升了 23.4 个百分点，年均提高 0.65 个百分点。这表明真实城镇化率，无论在城镇化水平上还是在上升速度上均远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说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指标确实高估了我国实际城镇化水平。与此同时，我国的真实城镇化率，无论在城镇化水平还是在上升速度上均略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且差距在逐年拉大。这说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指标低估了我国实际城镇化水平，并且低估程度在不断扩大。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随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更多农业转移人口、城乡人口流动的制度门槛下降等不断增多的城镇化积极因素，引致了农村举家迁移人口数量增加。当然，尽管我国的城镇化在积极推进，但与国际上处于相似经济发展水平、相似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我国的真实城镇化率仍处于较低水平与较低上升速度。

表 1 我国主要年份三种统计口径城镇化率比较

单位：%

年份	1978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4
常住（a）	17.9	19.4	23.7	26.4	29	36.2	43	50	54.8
户籍（b）	15.8	17	20.1	20.9	23.8	26.1	32	34.2	36.3
真实值（c）	16.4	17.7	21.2	22.3	25.2	28.6	34.6	37.4	39.8
差距（a-b）	2.1	2.4	3.6	5.5	5.2	10.1	11	15.8	18.5
差距（a-c）	1.5	1.7	2.5	4.1	3.8	7.6	8.4	12.6	15.0
差距（b-c）	-0.6	-0.7	-1.1	-1.4	-1.4	-2.5	-2.6	-3.2	-3.5

注：“常住”表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户籍”表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真实值”表示笔者测算的以非农户籍人口与举家迁移农村人口为基础的真实城镇化率。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 wind 数据库的有关数据测算。

首先，我国的真实城镇化率水平偏低。2014 年，我国的真实城镇化率为 39.8%，远低于世界各国城镇化率的均值 53.4%，也低于处于相似人均收入水平（3500~4000 美元，2005 年不变价美元）的泰国（49.2%）、土库曼斯坦（49.7%）、伊朗（72.9%）等国家，

并低于钱纳里“正常发展型式”标准下与经济发展特征相协调的城镇化率。其次，我国的真实城镇化率上升速度不快。1978—2014 年，我国人均收入从 189.4 美元增加到 3862.9 美元（2005 年不变价美元），基本相当于韩国 1960—1990 年、日本 1950—1980 年、英国 1850—1880 年、加拿大 1880—1910 年、美国 1880—1910 年、法国 1880—1910 年、德国 1880—1910 年、墨西哥 1960—1990 年所处的发展阶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2014）。与这些国家在相似发展阶段下的城镇化进程相比较，我国的真实城镇化率仅增加了 23.4 个百分点，远低于城镇化率上升速度最快的韩国，以及沙特阿拉伯、日本、印度尼西亚、英国等国家，并低于各可比国家的城镇化率上升平均值 2.2 个百分点。而且，我国的真实城镇化率在过去 36 年间取得了 23.4 个百分点的上升幅度，与可比国家在相似发展阶段所用 30 年左右时间相比，我国也不具有大量基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研究所得的“压缩式”城镇化特征。

表 2 我国与钱纳里“正常发展型式”城镇化率比较 单位：%

人均 GNP（美元）	100	200	300	400	500	800	1000
“正常发展型式”	22	36.2	43.9	49	52.7	60.1	63.4
中国	15.9	16.5	21.2	22.7	23.9	27.9	30.6

数据来源：钱纳里等（1988），简新华和黄昆（2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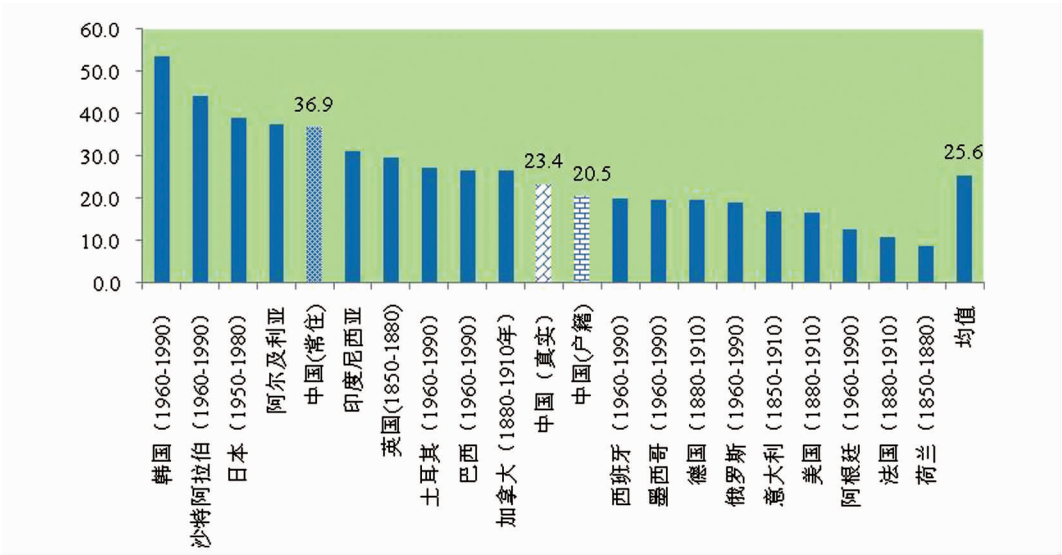


图 1 相似发展阶段国家的城镇化率变化比较（单位：百分点）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Bairoch & Goertz（1986）的有关数据测算。

三、我国真实城镇化率水平和上升速度 均低于与我国发展特征相协调的城镇化率“正常值”

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规律性的定量关系。钱纳里等（1988）认为伴随收入水平或其他发展指数的提高，城镇化率等经济社会结构会出现系统性变化，并进一步基于1950—1970年的跨国数据测算了城镇化率的“正常值”。然而，若仍以钱纳里等（1988）基于1950—1970年数据研究所得城镇化率“正常值”作为当前城镇化率合理性的比较标准，则忽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信息革命、全球化等对城镇化的影响，因而有必要更新数据重新估计城镇化率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陈明星等，2013）。

笔者借鉴钱纳里等（1988）测算经济结构“正常发展型式”方法，构建了反映我国经济发展本质特征的城镇化率标准回归方程：

$$X = \alpha + \beta_1 \ln Y + \beta_2 (\ln Y)^2 + \gamma_1 \ln N + \gamma_2 (\ln N)^2 + \sum_{j=1}^5 \delta_j T_j$$

其中， X 是城镇化率变量， Y 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N 为人口总量， T 为时期虚拟变量（以五年为一个时期）。

基于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1990—2013 年的跨国面板数据估计钱纳里城镇化率标准模型。在数据处理中，考虑到小国城镇化进程受到的约束显著不同于大国，笔者剔除掉 1990 年人口规模小于 100 万的国家；同时，为获得各国城镇化发展的更多信息，采用最大抽样与全期抽样^①相结合的方法得到 134 个国家 1990—2013 年的跨国面板数据。进一步，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回归结果报告在表 3 中。

将我国 1978—2014 年的人均 GDP、人口规模数据代入估计的钱纳里城镇化率标准模型 1 和模型 2，得到各发展阶段下我国城镇化率的“正常值”（表 4）。模型 1 和模型 2 估计的城镇化率“正常值”基本一致。估计结果表明，我国的真实城镇化率在 20 世纪 80 年代高于“正常值”约 2 个百分点，但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真实城镇化率渐渐低于“正常值”，二者差距在 2 个百分点左右，之后逐渐扩大到目前的 4 个百分点左右。这说明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存在真实城镇化率偏高的过度城镇化问题，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这一问题被逆转，我国转而出现在真实城镇化率偏低的城镇化不足问题，且在近些年来有加剧趋势。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的真实城镇化率上升速度也偏慢，每年至少比“正常值”的上升速度慢 0.17 个百分点左右。

^①抽样方法借鉴了钱纳里等（1988），完全或最大抽样包括了所有可能得到的信息，但随着时间推移又有别的国家的进入样本，因此这种抽样会产生偏差；而在此基础上的全期抽样则可以避免这种问题。

表 3 钱纳里城镇化率标准模型的最小二乘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LNURB			
	(1)		(2)	
C	- 7. 341 * * *	(- 10. 476)	- 7. 263 * * *	(- 7. 391)
LNGDP	1. 116 * * *	(29. 238)	1. 120 * * *	(29. 074)
(LNGDP) ²	- 0. 054 * * *	(- 22. 784)	- 0. 054 * * *	(- 22. 686)
LNN	0. 699 * * *	(8. 780)	0. 687 * * *	(5. 934)
(LNN) ²	- 0. 021 * * *	(- 8. 766)	- 0. 020 * * *	(- 5. 808)
T2	0. 033 *	(1. 798)	0. 034 *	(1. 841)
T3	0. 040 * *	(2. 171)	0. 042 * *	(2. 217)
T4	0. 029	(1. 594)	0. 031 *	(1. 661)
T5	0. 028	(1. 445)	0. 031	(1. 534)
R ²	0. 622	0. 618		
观测数	3213	3165		

注：圆括号内为 t 值，*、**、*** 分别表示 10%、5%、1% 显著性水平。估计模型 2 时剔除了全球人口规模最大的中国与印度。LNURB、LNGDP、(LNGDP)²、LNN、(LNN)² 分别为城镇化率的自然对数、人均 GDP 的自然对数及其平方项、人口总量的自然对数及其平方项，T2、T3、T4、T5 分别为时期 1995—1999 年、2000—2004 年、2005—2009 年、2010—2013 年时期虚拟变量，C 为常数项。

表 4 我国主要年份真实城镇化率与“正常值”比较 单位：%

年份	1978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4
真实值 (a)	16. 4	17. 7	21. 2	22. 3	25. 2	28. 6	34. 6	37. 4	39. 8
正常值 (b)	14. 4	15. 6	18. 9	22. 4	26. 9	31	35. 7	41. 1	44. 0
差距 (a - b)	2	2. 1	2. 3	- 0. 1	- 1. 7	- 2. 4	- 1. 1	- 3. 7	- 4. 2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 wind 数据库的有关数据测算。

四、我国真实城镇化率水平偏低、上升速度不快的原因

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真实城镇化率水平偏低、上升速度不快，主要是后发大国客观因素及“重物轻人”城镇化发展模式共同影响的结果。

一是后发大国可能出现城镇化率水平偏低和上升速度不快。我国集国土大国、人口大国与经济大国等多重大国特征因素，大国城镇化有其自身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要求大国在较短时间里实现高城镇化率水平既无必要也不可能。作为后发国土大国，既有资源丰富、市场巨大、自成经济体系等发展优势，但也有地区差异大而难以协调区域平衡发展的困难，同步实现快速的高水平城镇化既无必要且难度大；作为后发人口大国，既有劳动力丰富、内需市场潜力巨大等发展优势，也有城市承载力建设滞后与城市人口快

速增长之间的激烈矛盾，快速推进城镇化面临较大压力；作为后发经济大国，既有支撑城镇化建设的实力，但国土大国、人口大国的并存，则削弱了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动力及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即取得较高城镇化率的经济支撑。

二是重视劳动力工业化与轻视劳动力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使得城镇化率偏低和上升速度不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及丰富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为我国加入新一轮全球分工体系融入全球化、释放“人口红利”、加速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但同时在发展过程中由于重视劳动力工业化而轻视劳动力城市化，以致形成了农民“进得了城”而“留不住人”、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等问题，并出现了劳动力城镇化与消费者城镇化分离，包括劳动力自身城镇化与消费者城镇化的分离及其家属作为消费者城镇化的分离（宋立，2014^b）。重视劳动力工业化而轻视劳动力城市化的发展模式集中体现在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滞后的农村土地制度。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导致大量进城农民工无法取得城乡均等的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提高了农民工进城的制度门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滞后，导致农民工的宅基地、林权、承包地等农村财产权益得不到应有保障，削弱了农民进城落户的能力。

三是重视土地城镇化与轻视人口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使得城镇化率偏低和上升速度不快。中国区域经济和城市规划专家陈栋曾指出，“中国城市化的主要问题是化地不化人”^①。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地区激烈的标尺竞争和土地财政双轮驱动下，各地以发展城镇化为名大量征地开发，再加上“县改区”“县改市”“乡改镇”等一系列行政区划调整以及市镇设置标准的放宽，出现了城镇建设用地规模过快扩张，并陷入集聚土地资源、大搞工业园区而轻视劳动力就地城市化的困局。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城市化的速度明显慢于空间城市化的速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6年以来，我国城镇面积从1.3万平方公里扩大到2014年的8.9万平方公里，增长了5.8倍，而同期的城镇常住人口仅从30195万人增加到74916万人，仅增长了1.5倍（如果采用真实城镇化率统计口径，增长率更低），城镇用地增长弹性系数达到3.9，远高于国际社会公认的合理阈值1.12。

五、促进我国真实城镇化率水平适度上升和 速度合理提高的思路和对策建议

推进我国城镇化更好、更快发展，促进真实城镇化率水平适度上升与速度合理提高，应在理性认识大国城镇化规律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破农民进城的户籍、

^①陈栋在2010年12月8日“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浪潮下皖江城市带产业承接战略与对策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土地和社保等制度障碍，因地制宜地发展比较优势产业，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转变不尽合理的城镇化模式，走“产城人融合”“城乡协调互惠”的内生新型城镇化道路，分步实现农民既“进得了城”也“留得住人”。

一是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破制度障碍。户籍、土地和社保等城乡二元制度提高了农村劳动力市民化的制度成本，成为农民进入城市难以逾越的制度门槛。需要推动户籍、土地和社保制度联动改革，构建及完善城乡一体的户籍、土地和社保等制度体系，打破农民进入城市的制度障碍，让农民及其家人既能够进城、也愿意进城、还能留在城里。户籍制度改革方面，应以剥离户籍与福利的内在联系为重点，探索新型户籍准入制度和城市福利保障获取机制，可以在已有户籍制度改革基础之上，先放开中小城镇户籍、后逐渐放开大城市户籍，最终实现城乡户籍实质性的一体化；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应充分发挥市场在土地用途转换和出让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农民分享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土地增值收益的相关制度，可以在土地确权、成立城乡产权交易所、推进城乡土地入市流转基础之上，逐步实现农村宅基地自由退出与入市交易，最终实现城乡土地制度的一体化；社保制度方面，应在完善农村社保制度、进城务工农民享受城市同等公共服务基础之上，逐步实现城乡社保制度的并轨与异地流转。

二是发展比较优势产业，消除经济障碍。有悖本地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与产业形态，既不能有效利用本地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资源要素，也不能实现城乡包容、可持续发展。应逐步摆脱激烈的地方标尺竞争中形成的脱离本地实际的产业格局，根据本地资源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发展比较优势产业，为农民进城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降低农民进入城市、融入城市的经济成本。为发展比较优势产业，首先需要改革现行以经济总量为核心的政绩考核制度，实现多元、可持续的政绩考核体制机制；其次需要改革现有不公平的投融资体制机制，实现国有与民营、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等享受同等待遇的投融资体制机制；最后还需要逐步推动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形成产业要素密集使用主要依赖于市场价格的体制机制。

三是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破除发展障碍。城乡二元发展体系，既不利于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也不利于城乡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更不利于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应建立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为此，首先需要继续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方针，进一步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其次需要通过完善城乡发展规划编制，在切实解决规划上城乡脱节、重城市轻农

村问题基础上,继续加快推进农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形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体制机制,健全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最后还需要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措施,加快培育现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激发农村、农业发展活力,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有效、包容与可持续发展,实现农民、农村与农业现代化。

参考文献:

1. 陈明星、陆大道、查良松:《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国际比较》,《地理研究》2009年第2期。
2. 陈明星、唐志鹏、白永平:《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模式——对钱纳里模型的参数重估》,《地理学报》2013年第6期。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改革红利与发展活力》,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4.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银行:《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2014。
5. 贾康:《关于我国若干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思考(上)》,《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6. 简新华、黄锴:《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的实证分析与前景预测》,《经济研究》2010年第3期。
7. 厉以宁:《关于中国城镇化的一些问题》,《当代财经》2011年第1期。
8. 陆大道:《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与空间扩张》,《城市规划学刊》2007年第4期。
9. 陆大道、姚士谋、刘慧等:《2006中国区域发展报告:城镇化进程及空间扩张》,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10. 钱纳里、塞尔昆:《发展的型式:1950~1970》(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11. 宋立:《中国人口城镇化的逻辑与发展趋势》,《中国物价》2014年第8期。
12. 宋立:《劳动力与消费者“分离式”城镇化——劳动过剩经济体的全球化现象还是中国特色问题?》,《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5期。
13. 苏剑、贺明之:《对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一个定量解读》,《经济学动态》2013年第9期。
14. 许庆明、胡晨光:《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研究——基于转型升级与国际比较的视角》,《中国人口科学》2012年第10期。
15. 朱宇:《51.27%的城镇化率是否高估了中国城镇化水平》,《人口研究》2012年第2期。
16. 周一星:《关于中国城镇化速度的思考》,《城市规划》2006年增刊。
17. Bairoch Paul, and Goertz Gary: Factors of Urbaniza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Developed Countries: A Descriptive and Econometric Analysis. *Urban Studies*, Vol. 23, 1986.

责任编辑:沈家文

· 调 研 报 告 ·

大力推动民营企业 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对浙江省杭州、温州两市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情况的调研

李 蕊 王晓红

摘要：“十三五”是构建“一带一路”战略下全球产业链布局的关键时期，民营企业的贡献和作用日益突出。根据课题组对浙江省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情况的调研发现：浙江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实力和国际化水平显著增强，大规模及先进技术型国际并购实力增强，境外工业园区快速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困难包括：国际政治经济风险因素加大，融资难及资质“玻璃门”等政策歧视，核准备案程序复杂且周期长，签证问题，政府支持力度不足等。建议：放宽民企对外投资管制，加强金融保险政策支持，加强对外投资平台建设，完善政府预警援助机制，以及加快民企在“一带一路”重点行业、重点区域战略布局。

关键词：民营企业 对外直接投资 浙江 调研

作者简介：李 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助理研究员；
王晓红，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教授。

自 2000 年全面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快速增长的阶段。2015 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金额达 1180.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7%，实现连续 13 年增长，年均增幅高达 33.6%，居世界前列。其中民营企业的贡献和作用日益突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已经由国企主导向国企、民企双轮驱动转变。“十三五”时期既是我国

^{*} 本文为 2015—2016 年度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基金课题《“十三五”时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研究》阶段性成果。

对外直接投资的加速期，也是实现以“一带一路”战略为统领的产业链全球化布局的关键时期，大力推动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民营企业在对外投资中拥有诸多国有企业不可替代的优势，尤其体现在对高新技术、能源资源、军工等敏感行业投资以及实施重大项目海外并购上。同时有利于防止国企对外投资中的贪污腐败、资金外逃、严重亏损等问题。但目前对于民营企业对外投资还存在着认识误区、政策歧视和体制机制障碍，需要尽快加以解决。针对这些问题，课题组于2016年5月8日至14日赴浙江省杭州市、温州市调研，座谈并走访了当地民营企业代表及相关部门和机构。

一、浙江省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发展

（一）对外投资规模实力壮大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浙江民营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规模逐年扩大。浙江省对外投资绝大多数是民营企业，“浙商”已成为我国民企“走出去”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浙江民营企业对外投资规模壮大、实力增强、国际化程度显著提高、投资区域广泛，投资产业不仅涵盖进出口贸易、服装、轻工、餐饮等传统领域，高技术、新能源、军工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发展迅速，在国家实施“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根据《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占全国对外投资总额从2005年的1.29%上升至2014年的3.6%（见表1）。根据浙江省商务厅数据，2015年全省对外实际投资金额约55亿美元，同比增长约55%左右，约占全国总量的4.6%，主要涉及制造业、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行业；截至2016年6月底，全省经审批核准或备案的境外企业和机构共计8254家，对外直接投资覆盖142个国家和地区，全省对外投资前五位的国家和地区是香港、美国、印度尼西亚、瑞典和德国。

表 1 近年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额及在全国总额中占比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额	全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	浙江省在全国占比（%）
2005	1.58	122.6	1.29
2010	26.79	601.8	4.45
2011	18.53	685.8	2.70
2012	23.60	777.3	3.04
2013	25.53	927.4	2.75
2014	38.62	1072.0	3.60

注：作者根据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整理而得，其中各年度报告中没有2006—2009年浙江省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各年份数据均为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

（二）涌现出一批优秀跨国企业

“走出去”一直是浙江民营经济的一大特色。从产品走出去到企业走出去，从尝试性、探索性到规模化走出去，浙江民营企业已经实现了从“小作坊到跨国企业”的转变。近年来，浙江民企海外投资实力和国际化水平显著增强。涌现出吉利、万向、华立、恒逸石化、正泰、海康威视等一批优秀跨国企业，尤其是高技术、新能源、电力、军工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海外投资快速发展。吉利集团 18 亿美元收购沃尔沃，2012 年进入世界 500 强企业，是唯一入围的中国民营汽车企业；万向集团经过 20 年的海外发展，目前已在美国 14 个州设立或收购 28 家企业，年产值 20 多亿美元，员工 5000 多人，并于 2011 年在杭州投资 1.2 亿美元成立万向意能电力公司，将美国先进电池技术引入国内；华立集团在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公司和办事处，涉及工业地产、大宗资源产品贸易、制造（原料）基地及海外电力工程 EPC（设计－采购－建造）总承包等众多领域；恒逸石化有限公司在文莱投资建设年加工 800 万吨原油的石化项目总投资 43.2 亿美元，是文莱建国以来最大的投资项目，打通企业石化、化工产业链，有效解决国内化工原料和资源不足问题；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收购、自建，在美国、德国等国家设立了 8 家子公司，在 8 个国家持有海外电站 18 个，积极进行全球布局，有效规避了欧美“双反”的狙击；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已成立 21 家海外子公司，覆盖欧、亚、北美、非洲及大洋洲，建立了全球销售网络体系，海外市场覆盖 156 个国家和地区；青山控股集团在印尼投资 18 亿美元建设镍铁冶炼项目，初步实现企业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有效破除欧美对中国不锈钢初级产品的贸易壁垒；瑞立集团通过买壳在美国纳斯达克的 OTCBB（柜台交易市场）上市。

（三）大规模并购、先进技术型并购实力增强

2008 年金融危机和 2009 年欧债危机爆发，欧美经济增速低迷，一些世界知名企业由于陷入困境亟待出售，为我国企业实施海外并购，获取先进技术、知名品牌、行业领军人才等优质资产，加快实现自主创新、打造自主品牌提供了难得机遇。2007 年之前浙江企业的海外并购每年都在 20 单以内，2008 年开始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15 年达到 135 件，海外并购数量居全国第一。并购领域主要集中在汽车、机电、装备制造、化纤纺织、医药等制造业领域，商务服务业、零售业、娱乐业等领域项目不断增多，大型项目多为本行业领域的高端并购；并购地区从主要集中在美国、德国、日本、意大利、以色列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逐渐向印尼、印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延伸。^① 企业通过国际并购

^① 陈佳莹：《海外并购涌起“浙江潮”》，《浙江日报》2016 年 5 月 24 日。

不仅规模扩大，而且获得核心关键技术、品牌，实现了产品结构升级和国际化发展。吉利 2010 年并购沃尔沃，获得沃尔沃轿车公司 100% 股权以及相关资产（包括知识产权），包括 9 个系列产品、3 个最新平台、2000 多个全球网络，2013 年吉利—沃尔沃联合研发中心在瑞典哥德堡开始试运营。2010—2015 年万向集团在美国加快了技术型并购步伐，先后成功收购汽车电池生产商 ENER1、A123 电池系统公司、电动汽车生产商菲斯克公司，实现技术合作，提高产品美国市场占有率，并整合 A123 先进电池技术和菲斯克的先进汽车整车技术。此外，富通集团通过并购日本昭和电线、吉利集团并购沃尔沃公司都成功实现国产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对欧美国家军工企业实施并购。日发集团并购了先进机床行业优秀企业 MCM 公司，其产品广泛应用于航空、兵器、汽车、能源等领域，2011—2013 年其产品在航空业的销售占比分别为 45%、50% 和 53%。中航工业集团曾对该公司试图并购，由于其国有军工集团的敏感性未获成功。日发集团成功进入这一敏感领域，既为国家军工产业获取了先进产能，又为自己从纺织机械向精密机械的转型打下坚实基础。江银实业有限公司以 1700 万欧元与法国泰乐玛公司达成收购协议，获得了泰乐玛公司的动产、不动产、全部技术专利、自主知识产权、品牌和销售网络，从而跃上国际缓速器产品技术的最先进水平。

（四）境外工业园区快速发展

自 2006 年以来，我国境外产业园区建设稳步推进，成为推动“走出去”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平台。目前浙江境外经贸合作区共 6 家，其中泰国罗勇工业区、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合作区、越南中国龙江经济贸易合作区 3 家为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乌兹别克斯坦鹏盛工业园、越美尼日利亚纺织工业园、塞尔维亚贝尔麦克商贸物流园区 3 家为省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其中，华立集团与 Amata（安美德）集团合作开发的泰中罗勇工业区是国家首批“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之一，目前已有超过 60 家企业入驻园区。这些园区成为集聚国内企业的重要载体，在帮助企业解决投资中的困难和争端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提供了稳固可靠的海外发展基地，有利于形成融入当地市场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降低企业海外投资经营成本；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企业各自为阵的松散局面，实现抱团出海，加强了我国企业对当地政府、社会的整体影响力，提升话语权，形成“避风港”，有助于企业发挥投资规模效益，实现互补协同、共同抵御风险，并争取所在国的优惠政策。

二、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问题

据被调研企业反映，目前企业在对外投资中面临以下主要问题。

（一）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风险因素加大

金融危机以来，由于全球政治、经济、外交形势变幻动荡，导致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企业在向“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投资时，通常面临东道国政局不稳、汇率大幅波动、重大突发事件干扰增多，法制环境和市场环境差等问题；在向欧美发达国家投资时，则通常面临保护主义严重等问题。这些都使企业面临更大的困难和挑战。2014 年泰国政变对罗勇工业园区招商造成影响，部分赴泰投资企业推迟甚至取消了投资计划；越南龙江工业园因去年越南发生针对中资企业暴力事件，招商工作也受到一定程度影响；乌苏里斯克经贸合作区企业受卢布贬值冲击经营困难，导致部分入驻企业离开合作区。企业反映，越南、柬埔寨、缅甸等国家市场环境差、政府贪污腐化、政局动荡及反华势力较强等因素，加大了投资风险和投资成本。由于国际经济波动使汇率风险成为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风险，部分国家货币如俄罗斯卢布、巴西雷亚尔、墨西哥比索等都出现了断崖式下跌，但中信担保公司的现有保险并不涵盖汇率保险，导致企业因此遭受巨大损失。

（二）企业在与东道国沟通协调中政府支持力度不够

企业反映，由于民营企业在与东道国政府沟通时身份地位不平等，我国外交使馆又缺乏政府层面的有力支持，导致项目谈判经常受挫、推进实施困难重重。如，恒逸集团在文莱投资的石化项目，与当地政府沟通时被长时期拖延、搁置，导致项目进展缓慢；华立集团在墨西哥建立工业园时，当地要求企业自行解决园区的配套基础设施包括公路、水电气等，由于我国政府支持力度弱，无法与当地政府形成有效沟通；瑞安杰禾贸易有限公司在尼日利亚投资时，遇到困难寻求当地使馆帮助却无人接待等等。

（三）企业在对外投资及并购中存在融资难、资质“玻璃门”等政策歧视

企业反映，由于政策性银行融资门槛过高、商业银行融资产品缺乏，融资贷款主要向国企倾斜，导致民营企业对外投资融资困难。尤其体现在“蛇吞象”的重大海外并购项目上，由于民营企业融资渠道狭窄，主要依靠自有资金，且担保体系不健全，境外资产无法抵押，导致并购项目难以实施。如吉利并购沃尔沃，如果没有大庆、成都、上海等地方政府的股权融资，吉利是无法凭借银行融资完成并购的。三花集团曾有意收购美国某火箭发动机企业，经过几轮谈判，但最终因贷款融资困难，未能形成收购。一些企业反映，国企投资可以亏掉本金，但民企贷款都困难重重，这是不公平的，目前国家在投资审核方面对于民企要求比国企还要严、还要紧，资源主要向国企和央企倾斜，政策红利收益民企享受较少。此外，民企在援外项目资质上还遭遇“玻璃门”问题。随着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我国援外项目规模必将扩大。但民营企业由于不具备援外资质而被拒之门外。如浙富水电、大华股份、浙大网新等优秀企业申报援外物资供应商、成套设备供应商资格未获批准。这既有违市场公平原则，又不利于国家援外项目发展。

（四）签证问题成为影响人员往来的重要因素

一是国内人员出境签证手续繁杂、签证名额少、签证困难等因素，造成企业内部人员往来不便，影响投资项目运营。如青山控股在印尼投资镍铁冶炼项目，需要从国内派遣技术管理人员，但由于签证名额较少影响项目进展。二是国外员工入境培训无法签证。由于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生产基地需要对海外员工进行培训，带来大量的境外人员入境培训项目。但目前只有学生签证和工作签证是中长期签证，而没有设置研修人员签证，导致东道国受训员工无法入境，不仅影响境外企业的人才供给，也制约了我国教育培训服务贸易发展。为此，一些企业只好采取“变通”办法。如锦江集团在印尼投资时计划在国内组织培训印尼员工，由于印尼员工无法获得签证，该企业只能与某大学合作办理学生签证。三是在华外籍员工办理工作签证耗时较长。如华立集团的外籍管理人员在杭州第一次办理工作签证需要半年时间，此后每年都要用 2 个月时间办理签证。

（五）海外投资项目备案程序复杂、周期长而导致商机延误

2014 年国家相关部门均分别出台了《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境外投资管理办法》等新规，推进对外投资管理方式改革，实行以备案制为主，大幅下放审批权限。这无疑加速了我国企业进行境外投资与并购的步伐。但调研企业反映，目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审批制已经改为备案制，然而企业所需要的报送审核材料清单并没有减少，手续复杂、时间长的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中方投资额 3 亿美元以上的境外投资项目仍需经国家有关部门备案，10 亿美元以上的则需核准。但是海外并购项目时间紧、招标前置条件多、保密性要求高，容易贻误商机。如万向集团某并购项目，在国家有关部门走完全部手续需花费 3 个月时间，导致项目进度延误。许多并购项目需要在短时间内支出保证金并派出专业项目团队，但经常由于手续不完备、购汇、出入境审批不及时等错过良机，挫伤了民营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此外，也使得一部分民营企业绕开国家监管体系“曲线救国”，不利于国家对境外投资情况的准确掌握。

三、促进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力军，并在“一带一路”战略布局及敏感

性、关键性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当前我们面临来自以美国为首的遏制势力日益加大，许多国家对国企身份较为敏感，更应该发挥民营企业的作用。应积极消除各种思想认识误区、政策歧视和体制障碍，为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创造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保障。

（一）放宽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管制，促进投资便利化

由于民营企业主要依靠自有资金进行对外投资，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应重点加强对国企对外投资的监管审核，对于民企而言，按照“谁投资、谁决策、谁受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只要符合东道国准入条件的都应该给予通过。由企业自主决策、自担风险、自负盈亏，政府重点加强事后监管和服务。国家在投资领域、重大项目、金融支持等政策方面，做到国企与民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二）简化手续，促进对外投资便利化

一是逐步对民营企业的境外投资项目采取登记制。切实简化对外投资审批和管理，加强对外投资的政策协调机制，提高对外投资效率；研究制定境外投资法，形成良好的政策环境，促进对外投资合作的便利化。二是简化签证手续。对境外投资项目工作人员前往落地签证国家享受绿色通道和直通放行等具体政策，进一步完善境外并购的便利化程序。设立研修人员签证，为入境参加培训人员提供便利。三是建立“非禁即入”的援外准入制度。取消目前的准入审查制度，直接向具备工程承包资质的企业放开成套项目援外资格，向具备进出口经营权企业放开物资供应商资格。

（三）发挥民营企业在“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中的优势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装备和基础设施需求强劲，市场潜力巨大。鼓励民营企业紧密结合“一带一路”战略，对重点行业、重点地区进行战略布局，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全球资源配置的能力，增强国际竞争力。加强投资基础设施、海洋、能源资源、高新技术、军工、农业等领域，构建全球产业链。重点推动高技术企业对欧洲地区投资，积极支持民营企业设立或收购海外研发中心。企业普遍反映，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欧洲国家法制规范、市场环境好、先进技术多，企业投资综合成本较低、风险相对小，不仅可以规避贸易壁垒，而且有利于掌握世界先进技术，获取外溢效应。

（四）加强金融、财税、保险等政策支持

一是加大政策性贷款优惠。加大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对民营企业对外投资优惠贷款规模、适度降低门槛，完善对外投资贷款的风险补偿金和贴息制度。二是创新金融产品和模式，发展产业基金、投资基金等解决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融资难问题。

鼓励有条件的境外投资企业和金融机构共同发起设立民间融资机构和担保机构，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探索设立社会资本参与的海外产业投资合作股权投资基金。三是设立海外并购基金。利用中投公司等主权基金设立境外并购基金，主要面向发达国家的医疗器械、航空、机器人、军工、高端装备等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重大优质项目并购。四是在税收方面，对于企业在国外投资形成的利润如继续在国外设立企业可以实行税收抵扣。返程投资实行股权穿透原则，穿透到自然人。五是扩大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业务范围，对企业对外投资的汇率风险提供保险业务，以对冲因东道国汇率大幅波动对企业造成的巨大损失。建立进出口银行、国开行对于政治、战争等不可抗拒的风险实行可转债制度。

（五）完善对外投资公共服务平台和服务网络体系建设

一是加强对外投资大数据建设，为企业提供各类相关资讯、信息服务，及时发布国别投资合作指南、投资风险报告等信息。二是大力发展金融保险、法律、财务评估咨询、勘察、技术援助、信息服务、培训、会展、市场推广等服务机构，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专业化服务。三是积极发挥工商联、商会、贸促会、行业协会及各类中介服务机构作用。四是加强境外工业园区建设，加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可给予一定补贴，充分发挥境外工业园区平台作用，为境外投资企业提供公共服务。充分发挥行业龙头企业的作用，通过集群式投资建立海外生产基地及全球生产体系，推动产业集群式走出去，形成大企业带动小企业投资、上下游联动“走出去”的规模效应。

（六）发挥驻外使领馆作用，建立健全政府预警援助机制

推动多双边或区域投资保护协定以及避免双重征税条约的商签工作，提供权益保障、投资促进、风险预警等多种服务，保障企业对外投资利益。利用外交渠道在为境外投资企业协调东道国关系和事务、提供各类资讯服务、建设网络资源等方面发挥作用，提高海外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增强驻外使领馆的应急处置能力，协调当地商会、侨团等多方力量，完善经贸争端和突发事件处置工作机制，畅通海外维权投诉和救助渠道，切实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有效化解风险。引导企业规范投资，遵守所在国法律，尊重当地文化风俗。

责任编辑：艾 冰

美国全球知名智库考察报告^{*}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赴美考察团

摘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要充分学习借鉴发达国家智库建设的经验，特别是研究智库思想品生产中的一般规律和好的做法。作为一家具有较强政策影响力和较高国际化程度的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今年设立专门课题比较国外智库体制机制，研究如何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并于 2016 年 4 月下旬组织专门人员赴美考察交流，对美国知名智库筹资、内部分配、人员奖励、日常管理等进行了系统考察，并提出了未来中国智库建设的方向性建议。

关键词：中国特色 新型智库 体制机制 运营模式

2016 年 4 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下文简称：国经中心）以副理事长张大卫同志为团长的代表团，赴美国就美国全球知名智库的内部管理机制和运营模式进行了实地考察，此行是国经中心承担“国际著名智库机制比较研究”重要课题的调研任务。考察团在美期间走访了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布鲁金斯学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传统基金会、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皮尤研究中心、大西洋理事会等美国全球知名智库，就美国智库发挥作用的总体情况，特别是智库内部管理体制和运行模式进行了充分交流。

^{*} 本文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2016 年基金课题《国际著名智库机制比较研究》的调研成果。课题组赴美考察团团长：张大卫；考察团成员：陈文玲、王军、徐占忱、刘向东；执笔：徐占忱。

结合当前国家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新要求，课题组成员进行了深入思考，形成了一些建议。

一、美国智库管理与运营的特点

智库作为现代社会科学化、民主化、复杂化条件下政府决策的专门参与机构，是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可以说是当今世界智库数量最多、类型最完整、对决策影响力最大的国家，智库其以自称非政府性、非营利性、非党派性等特征，在美国政府内外政策方面发挥巨大的影响。美国智库管理与运营有几个主要特点。

（一）有相对稳定的经费来源，形成了以社会捐助为主的多样化融资机制，用大量经费支持研究工作

融资能力是智库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美国税法规定，企业或个人捐款数额超过应缴税收的一定比例，可以减免或全额抵扣应缴税款。美国几个主要智库形成了社会捐赠、政府资助、市场化运作收益、国外捐助、个人捐助、PPP（公私合营）模式以及委托研究项目经费等多样化的筹资渠道。从走访的各家美国知名智库来看，其都有相对稳定的经费来源，经费筹集是智库的一项重要经常性工作，不少机构有规模较大的工作团队。布鲁金斯学会已拥有3亿美元资产，20个研究中心和3家海外机构，有400名工作人员和200名不驻会的客座研究人员，还有60~70名访问学者。学会每年预算0.91亿~1亿美元，其中80%来自捐助，10%来自理财收入，其他则来自培训和出版收入。在捐助资金中80%来自私人，5%来自基金，15%来自政府（美国政府占1个百分点，其他为阿联酋、丹麦、挪威等国）。使用政府资助资金常常受到社会批评，认为会影响独立性。学会预算资金中约7500万美元用作项目研究经费。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则有45%来自捐赠，每年研究经费占50%以上。

美国传统基金会现有300余人，其中研究人员80人左右，年预算7500万美元。传统基金会的经费来源既有专门的基金支持，也有广泛的社会捐款。传统基金会代表保守党政府，捐款者主要为共和党人，个人捐款者多达60万人，捐款额度多少不等，多的捐款100万美元，少的也有捐款20美元的。美国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每年经费在4400万美元，其中公司资助占32%，基金会捐赠占29%，政府捐赠占19%，有相对固定的70~80家企业给予经费资助，劳斯莱斯和盖茨基金会是捐资最多的两家企业。该机构有专职研究人员300余人，另有250余人为与中心有合作关系的网络化专家。此外，该机构也做一些培训项目，如培训阿联酋外交官项目，但这方面收入不多。

皮尤研究中心是一家在全球以公众观点、态度和行为调查著称的智库机构，该机构年经费 2800 万美元左右，主要来自社会捐助。皮尤中心目前有 60 余名研究人员，有 40 名负责报告数字整理、图表设计以及与读者交流的专门人员。

（二）核心研究人员是国家顶级学者或学术带头人，在智库中具有较高地位，有完备的支撑与保障体系

美国知名智库研究人员大部分是国家顶级学者或学术带头人，布鲁金斯学会对研究人员的要求标准极高，一般要达到 3 个标准：是所在领域的“学术领头羊”、具有前瞻性视野和在公共领域里有影响力。其录用过程和学术标准与哈佛、耶鲁大学等顶尖高校极为接近。学会现有高级研究员 100 名，研究人员助手 100 名，普通研究员 20 名。他们的研究人员均有较深厚的学术背景和学位，大多数人具有政府背景，有些人还有国外背景，如澳大利亚前女总理、土耳其前财长等。他们不但是过去的专家，更是未来的专家，具有前瞻性思维和视野，具有参与公共政策对话和影响未来政策走向的能力，能够影响未来政策走势。

布鲁金斯学会非常重视自己的影响力。为此要不断地为政府提供咨询，经常参加政府的听证活动，每天都要在媒体上发声，用举办各种会议、出版图书的办法申明学会的观点。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也非常重视对国家和政府的影响，他们在选择项目课题时，一定要设立目标，明确自己的项目想对政策发生什么影响。其理念是“我们的产品，是改变公共政策。”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在提出与政府不同的政策主张时，往往举办有政府人员参加的研讨会，并会通过网络、大型会议等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美国，智库都会利用媒体和网络平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我们走访的几家智库，大多设有理事会作为决策保障机构，组织机构倾向于扁平化管理，为研究留出充足宽松的空间。研究人员在智库队伍当中具有较高地位。我们走访的几家智库中，一个共同特点是，每家智库的研究人员都有完备的研究保障支撑体系。美国智库采取总裁负责制，布鲁金斯学会在总裁之下有学术研究和行政管理两大机构，学术机构包括外交政策、全球经济与发展、经济政策、城市政策、治理研究 5 个研究部门，行政管理则包括财务、运营、联络、发展和出版 5 个部门。

美国智库人员包括行政领导人、研究专家、助理研究员、资料员、行政秘书以及服务人员等，普遍注重研究人员与非研究人员的合理配置，认为智库出思想品的研究人员是核心竞争力，设置合理的非研究人员是提高研究人员工作效率和成果质量的关键。布鲁金斯学会、彼得森研究所为每位资深研究人员配备助手。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助手为

新毕业的年轻研究人员，一些人在智库工作一段时间后可以从这里做“旋转门”转到政府做公务员，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再回来成为智库研究人员。

（三）研究人员收入水平较高，没有繁杂的行政工作和填报各种报表的干扰，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工作

通过深度访谈，我们了解到美国全球知名智库研究人员与非研究人员收入差别较大，当然各家情况不一。据卡内基、布鲁金斯学会介绍，其内部行政人员的年收入大抵在研究人员的1/3~1/4。彼得森研究所研究人员与行政人员收入差别更大。行政人员大多由年轻人员担任，其工资收入虽然不高，但有转入政府部门和其他机构的可能性。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人员的年薪平均在15万美元左右，但经济学背景的高一些，社会学、政治学教育背景的低一些。卡内基认为，在吸引研究人员上，智库间是有竞争的，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不是钱，而是智库的名望。

美国很多智库研究人员自主性强，时间安排基本由自己掌握，但是其研究任务非常饱满，有的智库研究人员可以自己设定研究题目。大部分智库、研究人员都在办公地点加班，工作时间往往超过“朝九晚五”。给我们感触很深的是，研究人员没有繁杂的行政工作和与研究不相关的会议，也没有各种需要填报的表格，以保证充分的研究时间。不仅如此，研究人员大多数不陪会，可以选择参加自己的专业领域和感兴趣的问题的会议或讨论，对于与自己研究无关的问题随时起身退出，不浪费时间浪费在一些无谓的事情上。

此外，在我们走访的几家智库中，其内部工作空间布局给我们留下很深印象。主要是私人工作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分离，一般说来，研究人员每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工作空间，相对封闭独立，面积不大，陈设比较简单。重要的是设有具有交流和服务功能的公共空间，这样的空间通常在办公空间的中间区，备有热水、茶和咖啡，有的备有电视（如大西洋理事会），用于研究人员随时休息、交流。

（四）形成了独特的人才“旋转门”流动机制，成为美国政要的重要“储备池”

美国政府每四年换届一次，换届时有4000多个联邦政府里的位置需要更替，其中大约有60%以上来自智库和高校。我们走访的几家智库，都保持了独立性、公开性和非营利性，不为党派“站台”。布鲁金斯每年与研究人员签约，要求其承诺不为某一个党派“站台”，如果要去“站台”需要先辞职。在参与竞选过程中，不得使用工作时间，甚至不可以使用布鲁金斯的电话和复印机。布鲁金斯与民主党关系密切，但其实在“非党派”这方面要求严格，如果邀请民主党希拉里演讲，也会邀请民主党的桑德斯和共和党的特朗普。访问中，布鲁金斯告诉我们，虽然普通研究人员和作为研究助手的行政人员，工资

水平比研究人员低很多，但是他们有机会旋转到政府工作，还有机会历练后回到布鲁金斯，成为高级研究人员，这是对这些人员最大的吸引力。另外，如果民主党执政，会从智库选用大量有民主党背景并对国家重大战略与政策有研究的智库研究人员，这时候剩下的和新进入的研究人员大部分是共和党的人。当共和党执政时，大部分有共和党背景的研究人员进入政府，智库则有较多具有民主党倾向的研究人员。

（五）内部管理与分配机制健全，管理人员中一半以上的职位是筹资和运行智库，纯粹的行政人员为数很少

从走访的几家智库看，布鲁金斯研究人员和非研究人员各占 50%，其中非研究人员的一大半都在负责筹资工作，另外一部分负责国际交流工作，只有极少数人做纯粹的行政工作。行政工作围绕智库研究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服务与保障。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一年筹办 2600 个会议，搭建国际化交流平台，经费中很大一部分用于此项工作。布鲁金斯注重收支平衡，使资金状况能够适应当前及长期研究项目的经费需求，并通过高效的资金管理运作，确保各个研究项目顺利进行。其他几家智库也坚持经费支持者不能干预研究题目和研究结论，智库签订与政府委托的非保密研究项目，保留发表这些成果的权力。资助方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理论上都不能干预智库研究的观点和结论。智库在管理方面，坚持经营与研究分开，日常运行遵循企业管理的方式，由总裁负责运营。在经费使用上，最大限度区分研究经费和行政等杂费，将主要经费用在研究项目上，在研究项目支出中，用于生产思想品的研究人员经费占 50% 以上，按照预算制直接拨付给研究人员，课题收入计入工资收入打入个人账户，不再进行繁杂的报销手续。研究课题收取 30% 的行政管理费。学者在外每次讲演达到 5000 美元，都要向主管副总裁进行申报备案。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研究课题则交 28% 的行政管理费。

二、美国智库管理体制和运营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此次国经中心代表团近距离走进美国知名智库，详细考察其内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通过反复参验比对，我们得出如下启示。

第一，发达的智库体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美国智库作为第四种或第五种权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决策环境和条件非常复杂，社会利益分化多元，政府决策面临过去时代不曾有过的挑战。现代社会智库以其宽阔视野、高度专业化和对复杂问题的建构能力，成为政府决策质量和效能的基本保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大国崛起参与

全球竞争，争夺国际话语权的需要，也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中的内在需要。我国推进社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要建设体现当代社会决策发展要求的智库，应该说这方面我们才刚破题，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二，借鉴美国国家智库实践，深入研究智库发展一般规律与特殊要求。智库的特殊性体现为智库与政府间的互动关系，这是各国不同国情和政治制度决定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其“特色”就在于我们的智库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服务和服从于民族复兴大业和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美国智库发展有其自身特殊政治制度的因素，当然不能照抄照搬。但是应该看到，智库作为现代社会思想产品生产的专门性机构，它显然不同于一般物质生产组织，也不同于具有行政职能的政府机构，它具有一般社会组织不具有的规律与特征。人作为思想品生产的主体，研究人员是智库最核心的资产和财富，而对人的管理、监督、激励和评价，必须体现思想品生产的要求和特点。美国智库之所以形成强大国际影响力，就在于尊重和适应了现代社会思想品生产的规律，其智库运行管理的先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第三，美国智库和中国智库的发展路径不同，目前已形成各自优劣势和特色。美国智库产生于三权分立、两党竞选这一制度大环境之下，很多智库起始于基金会、财团等组织，如卡内基研究院等。还有如兰德公司起始于与军方合作，具有很强的技术背景。美国的智库人员流动较大，研究的国际化程度高，专业背景深。中国智库大多还是现行体制下的行政事业单位，行政管理特点鲜明，目前研究总体来看国际化程度有限，研究视野有限，专业性不强。结合当前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实际，我们觉得以下几个关系需要特别重视。一是智库与政府的关系。智库服务于政府决策是其存在的前提，这是无可质疑的。但从智库的特点与定位来说，亦应该有所区别，现有完全行政体系内智库可以实现为政府决策“贴身”服务，而行政体系外智库可以以“近身”服务为主。二是研究目标不同时段设定问题。立足于中华民族崛起这一伟业，中国智库不仅要研究“短时段”问题，关注短期内的“新闻事件”，还要研究“中时段”甚至“长时段”问题。要对未来更长时期我国面临的总体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经济、人口、环境、社会等因素有预判。目前国内有些智库过于看重短期舆论效应，热衷于抓“眼球”，有些已成为噪音。三是智库工作中的服务与研究之间的关系。智库的研究在于服务政府决策，其服务的关键在于其以思想品和专门化知识服务于决策本身，而不是陷于日常性、一般业务工作性质的服务。现行体制下服务与研究关系处理不好，不仅不利于智库知识产品质量的提高，而且会造成不该有的浪费。四是研究的对策性、应用性与专业性之间的关系。智库不同于纯学术研究，要讲求研究的对策性和应用性，但智库研究同样要建立在专业性

基础上。缺乏专业性支撑，其应用性不仅大打折扣，也失去了国际一流智库在更高层面深入交流的基础。

三、推进中国智库建设的建议

第一，在智库与政府关系上可以考虑智库类型的多样化设计。为更多地在国际舞台上维护我国权益，体现我国的主张，争取持不同立场和观点的国际智库、媒体、社会民众的理解、同情和支持至关重要，应形成多元化、多样化、多层次的智库体系，更多地体现智库的独立性和鲜明特色。

第二，应从立法和制度方面为智库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我国智库主要脱胎于行政机构或事业单位，在管理理念、管理方式等方面行政化色彩浓厚。目前我国智库的官僚气息浓厚，社会公信力和认可度不高，公众对智库服务的信任度低，缺少对智库捐赠优惠支持政策。可以考虑研究制定智库的社会筹资、捐赠等方面相配套的政策支持。

第三，尽快解决当前约束智库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目前我国智库在研究人员出国、经费报销、职称评定、业绩考核等方面，基本上还等同于现有体制下一般事业单位，没有体现智库作为思想品生产机构的特点。建立符合智库发展规律的社会智库，更需要整体设计，分步实施。建议从 25 家试点单位开始，抓紧出台政策逐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第四，加快打通智库人才的“旋转门”。“旋转门”是智库发展的源泉活水，智库人才既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开阔的视野，又要有对国情的充分了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以说是特殊的专门人才。要尽快建立机制化渠道，推动智库人员到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任职。同时进一步畅通渠道，使社会各领域优秀人才有机会参与到智库工作中来。

第五，建立智库人才专门的培养渠道和机制。未来 5~10 年培养出一批高水平智库人才对中国特色智库建设至关重要。要抓紧制定智库人才发展规划。要明确发展目标，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可从现有智库中，选拔政治素质好、研究能力强的研究人员进行重点培养。根据需要安排到经济综合部门、驻外机构锻炼或到国外智库机构进行交流，并根据需要辅之以外语学习和专门的交流技术训练，逐步形成梯队，促其尽快成长。

责任编辑：艾 冰

关于办好智库期刊的研讨

——暨《全球化》创刊五周年笔会

关于创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几点建议

杨圣明

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学习会议上强调指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实现这些要求，加快创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着重研究以下几个问题。

一、政治经济学的沿革

据考察，第一个使用“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的是法国人蒙克莱田。^① 马克思提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代产生的，它只是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来考察社会分工”。^② 19世纪初在欧洲各国出现了不少政治经济学著作。1803年萨伊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概论》，1817年李嘉图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9年西斯蒙第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20年马尔萨斯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

当前，我们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方面，首先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二战结束后，苏联科学院的一批经济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初集体撰写了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孙冶方为首的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十分重视政治经济学，他在《论价值在社会主义以至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一文中特别强调了政治经济学的作用与地位。^③ 孙冶方写了《关于政治经济学和经济规律问题》《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

①刘永佶：《承继马克思原则，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2期。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04页。

③孙冶方：《论价值在社会主义以至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地位》，《经济研究》1959年第9期。

产关系》《经济规律的内因论与外因论——兼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政治经济学也要研究生产力》等文章。^① 于光远、苏星二人主编了《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一书。^② 徐禾等人写了《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③ 李慎明等同志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政治经济学》一书。^④

二、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规律的科学。”“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⑤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的序言中写道：“我在这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关系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⑥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我们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社会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应强调指出，马克思还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了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⑦

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确实是马克思独创的。“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对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说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镜下的解剖所要做到的那种琐事”。^⑧ 根据这种抽象法，马克思提出了“抽象劳动”这个范畴，如果没有这个范畴，

①《孙冶方全集》第二卷、第三卷，山西经济出版社 1977 年版。

②于光远、苏星主编：《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

③徐禾等主编：《政治经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④李慎明、程恩富等同志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集），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53 页、156 页。

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8 页。

⑦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12 页。

⑧同上，第 8 页。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就难于确立。现在看来，任何的社会科学都必须采用抽象法。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创新。中国道路的探索为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里所说的特色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私有制中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则是公有制中的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公有制与私有制的不同可以表现出政治经济学的内容、体系、结构等的差异。

第二，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特殊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第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属性不同。马克思写道：“《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时期的”。^① 当今在我国，政治经济学同样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有人研究政治经济学是为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服务，而另一些人可能秉持西方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在讨论同一个问题时，由于各人的认识不同，观点有明显的差异。

我认为，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键是要站在历史唯物史观的高度来理解发展，从认识论、发发展论和价值论的统一来理解发展。要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获得巨大的发展，关键在于培养和选拔人才。没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才，哪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普及与创新。当前，在不少高等院校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课程相当困难，缺少教师，缺少教材。在我国理论经济学中，尤其政治经济学中“西化”问题比较严重。要改变这种局面，必须更多努力。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贸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责任编辑：沈家文）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5页。

充分发挥智库期刊作用

张卓元

《全球化》创刊五年来，发表了许多具有全球视野、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阐述党的战略、方针和政策的好文章，栏目设置生动活泼，内容丰富多彩，社会影响逐步扩大，刊物越办越好。

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要在 2020 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预期目标，面临困难重重的挑战，但是机遇犹在、前景良好。最重要的是全面深化改革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这不但能有效保证两个翻番任务的实现，而且能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迈向中高端水平。由于改革进入深水区，会触动一些既得利益群体的奶酪，阻力自然很大。为了更好地迎难而上，落实各项既定的改革举措，需要中央强有力的领导和推动，需要凝聚各方面的改革共识，需要高超的领导艺术。这就要更好地发挥像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这样的高端智库的作用。

2015 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 28 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当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如何改革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各国竞相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带来什么后果？这些问题值得经济学家认真研究，将创新成果在刊物发表并供中央决策参考。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智库期刊的翘楚

张西立

毋庸置疑，我是《全球化》的粉丝，从 2011 年创刊之日起就是。五年来，《全球化》于公于私均对我帮助很大——对《红旗文摘》而言，每期《全球化》都有许多美不胜收

的精品力作；对我本人来说，《全球化》刊载的诸多重量级作者的文章，读来使人如饮甘醴、如沐春风。放眼国内期刊界，《全球化》以其权威的资源依托、鲜明的办刊定位以及一贯的工匠精神，作为“中国智库期刊的翘楚”应是当之无愧！

权威的资源依托。《全球化》的应运而生，是高端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正常运转的内在需要。世界上具有广泛影响的重要智库无不拥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成果交流平台，即使在网络媒体无处不在的今天，像《外交》（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办）这样的传统智库期刊，依然扮演着不可替代的关键角色。在2015年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名单中，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作为“社会智库”赫然在列，这为《全球化》杂志进一步发展壮大夯实了物质基础，而《全球化》杂志也将以其特有的方式汇聚海内外智力资源，更好地服务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发展战略。

鲜明的办刊定位。由于工作原因，我平时广泛接触各类刊物，但《全球化》这本杂志总是显得与众不同。要说原因，恐怕还在于其恰当、准确的办刊定位。作为智库期刊，不能说《全球化》没有市场取向，但推动交流、汇聚智慧、服务决策才是其主攻方向。纵览五年来《全球化》刊载的文章，作者不分中外、篇幅不重长短、议题不拘一格，不变的却是鲜明的问题导向和深入的对策研究。这样一本刊物，尽管没有纯学术期刊的繁琐格式，但并不缺乏学术规范性；虽然没有“内参”等红头字样，却发挥着公开的内参作用。

一贯的工匠精神。都说编辑是辛勤的工蜂，是为别人作嫁衣裳，其实精益求精、细节至上的工匠精神才是期刊编辑工作状态的真实写照。这一点，在《全球化》杂志上有着突出表现。从刊物封面到内文板式、从目录设计到正文编排，《全球化》透出的不仅是疏朗、简洁，还给人一种淡雅、平实的大格局感觉。如果认真阅读其中的文章，就能感受到从主题策划到文字处理无不体现了办刊人的考量和匠心。每一期刊物都可以说是办刊人的一件精巧作品，她承载着办刊人的思想和理念，也反映着办刊人的技术和手艺。《全球化》无疑是当代中国期刊百花园中的佼佼者。

（作者为《红旗文摘》杂志社总编辑）

（责任编辑：李 蕊）

庆贺《全球化》创刊五周年

李京文

首先感谢《全球化》杂志为政府官员、企业家、科研教育者和广大读者及时全面提供全球经济信息并给以解读，帮助大家科学准确地认识世界、应对挑战、紧抓机遇、科学决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添砖加瓦。这是因为你们坚持马列立场、观点、方法，勤于调研，善于分析，敢于担当而取得的。

其次，希望《全球化》杂志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增加杂志的内容，提高解读水平，更多更好地指导我们继续前行，让我们共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世界的持久和平、繁荣作出更多的贡献。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全球化》杂志创刊五周年感言

李 楠

《全球化》杂志创刊五年来，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而发展，智库杂志的定位逐步确立，办刊特色愈发明显，影响力日益扩大。

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使得中国及时抓住全球产业转移以及历史周期的大势，重塑世界经济金融发展的版图，为自身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实现弯道超车，以及中国梦的实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当前全球化有逐步放缓乃至退化的倾向，如美国的内化、欧盟的支离、日本的低迷，以及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的出现等，我们其实已经处在一个时代周期的拐点。目前，中国经济处在积极和深度的结构调整及变革之中，但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势头不减，并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能量和引领作用。东西方经济金融版图和地位的时

空转变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全球化确实给世界和中国带来了发展的红利。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理念、发展模式给世界也带来了诸如环境恶化、资源枯竭、国家民族间的战争不断等弊端，并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人类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

中国近 40 年的改革开放，已逐步成为资本、文化等的输出国，并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式全球化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其倡导全球以“和谐”“多赢”等为价值导向的发展理念，成为新的全球化时代发展的特点，“一带一路”就是这一理念的典型体现。如果说此前为“西式全球化 1.0”时代的话，那么以倡导人与自然、人与人、国家与国家等之间的和谐共赢为理念的“中式全球化 2.0”时代即将来临。因此，《全球化》杂志应适应这一巨大的历史转变，提早布局，积极引领，献计献策。同时，在选发稿件时应注意以下“五度”。

一是高度。即文章立意要高，要站在战略的高度、国家的高度、乃至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探讨问题。

二是热度。即杂志选题要重点涵盖中国乃至世界经济、金融、文化、制度建设等的重大战略性、方向性热点选题。

三是角度。即从中国的角度而不是西方的视角论证中国和世界问题。笔者以为，经过近 40 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创新中国经济金融理论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已然具备。创新的路径，可以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易经》《道德经》作为思维体系，以仁义正和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作为价值体系，以西方文化理念、研究方法等作为方法论体系，对中国新理论和新体系的构建提供重要支撑。

四是深度。即要善于深度研究和挖掘文章论点，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以及世界的和谐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决策建议和方案选择。

五是精度。即要把每篇文章作为一个精品来对待，对选题的精巧选择和把握，对研究问题的专业与深入，对材料和观点的全面收集、精心提炼，对数据的精心整理和精准挖掘及提炼，对论证细节的一丝不苟、严谨、认真，对完美品质（质量、格式、文字等）和内涵的精益求精、精雕细琢，对论文社会价值的极致追求。

（作者为《国际金融研究》副主编）

（责任编辑：艾 冰）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2016 年 9 月以来，国际机构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和判断。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未来 35 年全球经济将缓慢增长

德意志银行 2016 年 9 月 9 日称，未来 35 年全球经济增长将十分缓慢，由此造成的经济、社会及政治等各方面挑战，都将让决策者力难从心。未来 30 年通胀率和债券收益率将上升，与过去 35 年截然不同。该报告内容被债券交易员作为在固定收益市场卖出的理由，推升债券收益率至数月来首见的水平。这份年度报告主张，所有在过去 35 年推动全球增长及房地产上涨的因素正渐渐消退。从 1980 年到当今主导经济、政治和资产价格的世界秩序将发生改变。当前的周期已持续约 35 年，所以下一周期有可能也持续这么久。投资者、政界以及央行人士若是以过去 35 年的情况来推论未来表现，可能会犯下最危险的错误。

德意志银行认为，未来 35 年的经济主题将包括：实际增长率下降、通胀上升、国际贸易减少、对移民管控更严格、企业获利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下滑，以及债券实际回报率为负。

（二）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速将放缓到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6 年 9 月 21 日将 2016 年和 2017 年全球 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预估分别下调至 2.9% 和 3.2%，之前预估分别为增长 3.0% 和 3.3%，并表示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速将放缓到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OECD 将美国 2016 年和 2017 年 GDP 增速预估分别下调至 1.4% 和 2.1%，之前预估分别为增长 1.8% 和 2.2%；将欧元区 2016 和 2017 年 GDP 增速预估分别下调至 1.5% 和 1.4%，之前预估分别为增长 1.6% 和 1.7%。OECD 将日本 2016 年 GDP 增速预估从之前

的 0.7% 下调至 0.6%，将 2017 年增速预估从 0.4% 上调至 0.7%。将英国 2016 年 GDP 增速预估从之前的 1.7% 上调至 1.8%，将 2017 年增速预估从 2.0% 下调至 1.0%。

OECD 表示，英国经济仍面临下行风险，预计发达国家经济将进一步走弱。因为低利率，金融稳定风险有所上升，目前发达国家债券中逾 35% 为负收益率，表明货币政策已给市场带来了扭曲，建议美联储应逐步加息。

（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维持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不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6 年 10 月 4 日公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计分别为 3.1% 和 3.4%，与该机构 2016 年 7 月份的预测值一致。报告认为，今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继续令人失望，抵消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好于预期的表现，因此 IMF 维持增长预期不变。发达经济体今年经济增长预期较 7 月份的预测下调 0.2 个百分点至 1.6%，IMF 维持明年经济增长预期 1.8% 不变。其中，美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测分别为 1.6% 和 2.2%，较 7 月份的预测分别下调了 0.6 和 0.3 个百分点；欧元区今明两年经济增长分别为 1.7% 和 1.5%，较 7 月份预测值均上调了 0.1 个百分点。报告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今年经济增长上调 0.1 个百分点至 4.2%，高于 2015 年 4% 的增速，这也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6 年来经济增长首次提速。报告维持明年 4.6% 的经济增速不变。

IMF 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认为，全球经济仍面临下行风险。经济持续低速增长，多数国家贫富差距加大，这将加剧反贸易、反移民情绪的升温，进而拖累全球经济增长。如果各国不采取坚定的促增长措施，全球经济将面临持续低增长风险，对经济和政治带来负面影响。

报告呼吁发达经济体央行继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并强调各国应加大对教育、技术、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推进结构性改革以提高劳动参与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从而提高生产率和潜在经济增长。

（四）全球化的倒退是一个“严重风险”

IMF 总裁拉加德 2016 年 10 月 6 日在华盛顿发布的全球政策议程表中表示，全球化的倒退是一个“严重风险”，应通过继续推进贸易一体化来加强全球合作。国际合作与协调的重要性一如过去，在这种时刻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倒退，是一个严重风险。在越来越多极化的世界，很难达成广泛参与的多边协议，但多边协议带来的收益却是巨大的。鉴于许多国家的政策利率接近或达到了利率的有效下限，财政政策可以发挥尤为重要的作用，包括在有财政空间时进行额外公共投资，使税收优惠架构更加有效和公平，以及解决私营部门债务积压和资产负债表的问题。

拉加德认为，尽管部分经济体显现复苏增强的迹象，但全球经济增长依然令人失望，

同时预期的复苏将主要由新兴市场驱动。决策层应采取行动，并均衡利用所有政策杠杆组合来重振需求，提高生产率，并且确保科技和全球化带来的收益能够更加广泛地得以共享。

（五）全球经济复苏依然缓慢且不均衡

IMF 决策机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IMFC）2016 年 10 月 8 日发布第 34 次会议公报称，全球经济复苏依然缓慢且不均衡，预计明年经济增长仅将小幅回升，主要由新兴市场经济体带动。

公报指出，一些经济体的经济表现和抗冲击能力已经改善，金融市场的近期风险已基本缓解。然而，全球需求增长缓慢，并且依然存在产出缺口；全球贸易、投资和生产率增长减缓；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中期金融风险上升。在这一背景下，经济前景依然疲弱不振。经济增长持续低迷暴露了潜在的结构脆弱性，各种风险进一步损害了潜在增长和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前景。发达经济体生产率增长减缓，并且仍然面临危机遗留问题；一些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目前正在进行的调整和存在的脆弱性带来了挑战；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出口国造成影响，这些因素继续拖累经济前景。总的来说，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高企，长期以来的不利因素依然存在。全球化和技术变革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好处。然而，经济前景越来越受到封闭型政策的威胁，包括保护主义的抬头和改革的停滞。IMF 将致力于设计和实施有关政策，解决那些被时代甩下的人担心的问题，并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从全球化和技术变革中受益。

IMFC 主席、墨西哥中央银行行长卡斯滕斯当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会议呼应了 IMF 总裁拉加德所称的全球经济增长“太慢、太久、惠及太少”，许多讨论均与此相关。

公报指出，IMF 更加坚定地承诺，将致力于实现强劲、可持续、具有包容性、有利于创造丰富就业机会、更加均衡的经济增长。IMF 将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结构性改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既在一个国家内部实施，也在各国间联合实施。增强有关政策，以提升信心和抗冲击能力，维护金融稳定，并确保所有社会成员都有机会从全球化和技术变革中受益。鼓励那些受贸易条件持续恶化严重影响的国家推进政策调整。汇率的过度波动和无序变化会对经济和金融稳定产生不利影响，IMF 将避免采取竞争力贬值措施，并且不将汇率用于竞争目的。IMF 重申，将致力于清晰地沟通政策态势，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IMF 将加强对维持经济开放和重振全球贸易的承诺，以此作为促进全球增长的关键手段。

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IMF 称中国需要加速改革并建议逐步停止制定经济增长目标

IMF 2016 年 9 月 26 日发布《2016 年中国年度磋商报告》并举行记者会。报告称，

中国在诸多领域的改革已取得进展，近期看经济发展前景良好，但中期前景日趋疲弱，需要加速改革，尤其是需要解决高企的企业债问题，以及停止信贷和投资刺激，并接受经济增长放缓现状等。报告建议，中国应逐渐停止制定经济增长目标。报告认为，虽然中国已在货币政策框架、财政框架、城镇化、去产能等诸多领域的改革取得显著进展，但改革进展仍然不均衡，特别是企业债高企、信贷投放持续攀升、金融体系风险增加、一些资产价格（如房价）存在过快上涨的倾向等。

IMF 驻华代表处高级代表席瑞德表示，IMF 在过去就建议中国应从制定具体的经济增长目标点位过渡到制定经济增长目标区间，但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逐渐停止制定经济增长目标，因为如果经济潜在发展增速不及目标点位，政府就有可能实施经济刺激计划；对中国来说，刺激经济就意味着投放过多的信贷和依靠投资拉动，这会进一步增加债务负担。世界上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只制定经济发展规划，而不是制定具体的经济发展目标。近几年中国信贷增长强劲，但数据显示，国际金融危机后每单位经济增长所需的新增信贷规模是金融危机前的三倍，这说明信贷投放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性在下降。

报告认为，由于中国在遏制信贷快速增长和国企改革等关键领域的改革进展仍存在差距，即便短期经济发展前景良好，但经济的脆弱性持续上升，中长期发展前景趋弱且风险有所上升，需要加速改革，特别是在关键领域采取更有针对性、强有力的改革措施。

（二）IMF 总裁说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主要贡献者

IMF 总裁拉加德 2016 年 9 月 28 日表示，尽管世界经济增长缓慢，但发展中经济体前景乐观，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中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表现仍很抢眼。近几年来，全球经济增长持续疲弱，尽管美国在发达经济体中率先复苏，但仍面临一些反复，IMF 今年多次下调美国经济增长预期。欧洲经济表现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银行业都面临高负债压力。日本经济虽有小幅反弹，但如果想保持增长动能，还需作出重大改革。

拉加德强调，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相比之下表现抢眼，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中国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依然保持较高经济增速。除此之外，拉加德还强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性，呼吁各国根据自身特点实施结构性改革，协调各国政策，实现包容性增长。

（三）IMF 维持对中国经济增速预期

IMF 2016 年 10 月 4 日在华盛顿发布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报告维持了 2016 年 7 月对中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速 6.6% 和 6.2% 的预期，肯定中国经济为可持续增长进行的转型，提示注意信贷扩张的风险。

报告认为，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中国顺利实现以消费和服务为导向

的更加可持续的增长，对世界具有更重要的意义。IMF 首席经济学家奥布斯特费尔德认为，中国需要警惕信贷增长过快，特别是影子银行的扩张可能在中长期对金融稳定带来的影响，所有这些中国经济向消费和服务型转变的过程中采取的措施，在很多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也需要尽快解决内部失衡问题，否则可能在未来造成风险。

（四）亚行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亚洲开发银行（亚行）的近期研究表明，尽管受国内外压力持续拖累，但中国上半年的经济表现仍高于预期，加之采取了刺激措施，这些都将使中国 2016 至 2017 年的经济增长略高于预期。在其年度旗舰经济报告《2016 年亚洲发展展望更新版》（下称《展望更新》）中，亚行预测 2016 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 6.6%，略高于 3 月份预测的 6.5%，2017 年的增长预期则由此前的 6.3% 上调至 6.4%。

亚行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表示，中国经济仍有望实现政府设定的 6.5% 至 7.0% 的年均增长目标。继续实施结构性改革有助于中国应对多方面的风险，包括出口需求持续疲软、制造业投资减少和资产价格泡沫等风险。2016 年上半年的表现得益于政府基础设施支出增加、零售支出强劲和宽松性货币政策，该政策有助于增加基础设施和房地产领域的支出。服务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 60%，与上年同期相比，占 GDP 的份额提高了 1.8 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仍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然而，工业和出口等仍然面临下行压力，而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有所放缓。食品成本增加，消费物价上涨，而人民币面临的贬值压力一方面反映出政府在转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另一方面则源于大量投资者在全球经济不明朗的形势下选择了美元。

《展望更新》指出，面对持续的经济再平衡和全球需求疲软，投资增长将被进一步削弱，信贷增长放缓，制造业支出持续走低。为应对上述问题，政府可能会进一步采取经济刺激措施，以推进基础设施的发展。消费支出将继续拉动 GDP 增长，但这有赖于居民储蓄率的进一步下降。随着价格管制的取消和服务成本上升，预计 2016 年的通胀率将上升到 2.0%，高于 3 月预测的 1.7%。报告称，2017 年的通胀率可能进一步缓慢上升，但仍在政府目标上限 3.0% 以内。过去五年，生产者价格持续下滑，但随着大宗商品价格先稳后升，预计 2017 年生产者价格将有所回升。

鉴于中央政府债务水平和放松信贷的风险水平相对较低，相比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能够提供更大的空间来刺激经济。《展望更新》建议，政府应谨慎实施经济刺激措施，防止信贷过快扩张和房地产价格泡沫，因这些因素会危及银行资产的质量。

责任编辑：沈家文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 1 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4 年	2015 年 预测值	2016 年 预测值	2017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 年 10 月)				
世 界	3.4	3.1	3.1	3.4
发达国家	1.9	1.9	1.8	1.8
美 国	2.4	2.4	2.2	2.5
欧元区	0.9	1.5	1.6	1.4
日 本	0.0	0.4	0.3	0.1
发展中国家	4.6	4.0	4.1	4.6
印 度	7.3	7.5	7.4	7.4
俄罗斯	0.6	-3.7	-1.2	1.0
巴 西	0.1	-3.8	-3.3	0.5
世界银行(2016 年 6 月)				
世 界	2.6	2.4	2.4	2.8
发达国家	1.7	1.8	1.7	1.9
发展中国家	4.2	3.4	3.5	4.4
英国共识公司(2016 年 10 月)				
世 界	2.8	2.9	2.5	2.8
美 国	2.4	2.6	1.5	2.2
欧元区	1.2	1.9	1.6	1.3
日 本	0.0	0.5	0.6	0.9
印 度	7.2	7.6	7.6	7.7

注:(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及分类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2)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2014 年度数据为印度官方大幅上修后数据,而 2015 年及 2016 年数据系参照官方修订后数据的预测结果。(3)各经济体 2015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作了调整。

表 2 世界贸易量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4 年	2015 年 预测值	2016 年 预测值	2017 年 预测值
世 界	3.7	2.6	2.3	3.8
进口				
发达国家	3.4	4.2	2.4	3.9
发展中国家	3.7	-0.6	2.3	4.1
出口				
发达国家	3.4	3.6	1.8	3.5
发展中国家	2.9	1.3	2.9	3.6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为出口量增速和进口量增速的简单平均数。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6 年 10 月预测。

表 3 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100)

单位:%				
	2014 年	2015 年 预测值	2016 年 预测值	2017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 年 10 月)				
发达国家	1.4	0.3	0.8	1.7
发展中国家	4.7	4.7	4.5	4.4
英国共识公司(2016 年 10 月)				
世 界	2.6	1.9	2.5	2.8
美 国	1.6	0.1	1.2	2.3
欧元区	0.4	0.0	0.2	1.3
日 本	2.7	0.8	-0.2	0.4
印 度	6.0	4.9	5.1	5.1

注:(1)印度来源于英国共识公司的数据指财政年度。(2)各经济体 2015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作了调整。

表 4 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世 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15 年		1.4	0.3	2.5
	8 月	1.5	0.1	2.9
	9 月	1.5	0.0	2.7
	10 月	1.5	0.2	2.2
	11 月	1.5	0.2	2.5
	12 月	1.5	0.3	3.0
2016 年	1 月	1.7	0.6	3.0
	2 月	1.5	0.3	3.1
	3 月	1.4	0.2	3.0
	4 月	1.6	0.3	3.6
	5 月	1.6	0.1	3.2
	6 月	1.2	0.4	2.6
	7 月	1.2	0.5	2.7
	8 月	1.1	0.4	2.7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5 工业生产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 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全球 PMI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2015 年		-0.5	-3.3	3.8			
	9 月	1.9	0.9	2.7	50.4	50.5	50.9
	10 月	2.5	1.1	3.3	51.1	51.6	51.7
	11 月	1.2	0.4	3.0	51.0	52.2	51.2
	12 月	0.6	-0.8	3.0	50.7	51.5	50.8
2016 年	1 月	1.9	0.7	3.3	50.9	51.4	51.4
	2 月	1.9	-0.4	3.7	50.0	50.4	50.4
	3 月	1.2	-0.7	3.8	50.6	51.4	51.4
	4 月	1.2	0.1	3.5	50.2	50.4	50.4
	5 月	1.2	-0.1	3.8	50.0	50.0	50.3
	6 月	1.8	0.0	4.2	50.4	50.4	50.7
	7 月	1.2	-0.2	3.4	51.0	52.0	51.4
	8 月				50.8	52.0	51.0
	9 月				51.0	51.9	51.4

注:(1)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2)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 50 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二、美国经济

表 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4 年		2.4	2.9	-0.9
	3 季度	5.0	3.7	2.5
	4 季度	2.3	4.6	-0.4
		2.6	3.2	1.8
2015 年	1 季度	2.0	2.4	2.6
	2 季度	2.6	2.9	3.2
	3 季度	2.0	2.7	1.9
	4 季度	0.9	2.3	1.0
2016 年	1 季度	0.8	1.6	1.6
	2 季度	1.4	4.3	-1.7

表 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5.5	4.3	4.4
	3 季度	7.4	2.1	-1.2
	4 季度	1.3	4.5	11.2
		4.0	0.1	4.6
2015 年	1 季度	3.7	-5.8	5.6
	2 季度	4.3	2.9	2.9
	3 季度	5.7	-2.8	1.1
	4 季度	-0.2	-2.7	0.7
2016 年	1 季度	-0.9	-0.7	-0.6
	2 季度	-2.5	1.8	0.2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表 6、表 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6、表 7)。

表 8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4 年		2.4	2.9	-0.9
	3 季度	2.9	3.2	-0.3
	4 季度	2.5	3.5	0.3
		2.6	3.2	1.8
2015 年	1 季度	3.3	3.6	1.2
	2 季度	3.0	3.4	2.0
	3 季度	2.2	3.1	1.8
	4 季度	1.9	2.6	2.2
2016 年	1 季度	1.6	2.4	1.9
	2 季度	1.3	2.7	0.7

表 9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5.5	4.3	4.4
	3 季度	6.6	4.8	3.7
	4 季度	5.3	3.1	6.1
2015 年		4.0	0.1	4.6
	1 季度	4.9	2.2	6.3
	2 季度	4.2	0.8	4.5
	3 季度	3.8	-0.4	5.1
	4 季度	3.4	-2.2	2.5
2016 年				
	1 季度	2.2	-0.9	1.0
	2 季度	0.8	-1.1	0.3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表 8、表 9)。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8、表 9)。

表 1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2015 年	22236.2		-5.1	27633.7		-3.1	-5397.6
8 月	1828.1	-2.3	-7.3	2333.5	1.1	-2.2	-505.4
9 月	1852.9	1.4	-5.0	2296.1	-1.6	-3.6	-443.2
10 月	1831.5	-1.2	-7.4	2286.3	-0.4	-4.9	-454.8
11 月	1809.0	-1.2	-7.8	2244.7	-1.8	-5.0	-435.7
12 月	1802.8	-0.3	-7.5	2249.8	0.2	-6.5	-447.0
2016 年							
1 月	1790.7	-2.2	-6.7	2221.0	-1.1	-5.1	-430.3
2 月	1810.0	1.1	-4.7	2262.6	1.9	0.1	-452.6
3 月	1788.0	-1.2	-6.1	2157.3	-4.7	-9.6	-369.3
4 月	1815.5	1.5	-5.3	2201.4	2.0	-5.3	-386.0
5 月	1813.9	-0.1	-4.7	2233.9	1.5	-3.1	-420.0
6 月	1829.2	0.8	-3.9	2275.8	1.9	-2.5	-446.6
7 月	1863.8	1.9	-2.0	2259.3	-0.7	-1.8	-395.5
8 月	1878.5	0.8	0.7	2285.8	1.2	-1.2	-407.2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因季节调整,各月合计数据不等于全年总计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普查局。

表 10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增长率		失业 率	非农雇员 人数环比 增加 (万人)
		环比 折年率	同比		
2015 年			0.6	5.3	290.7
	9 月	2.0	0.7	5.1	14.9
	10 月			5.0	29.5
	11 月			5.0	28.0
	12 月	-2.4	0.4	5.0	27.1
2016 年					
	1 月			4.9	16.8
	2 月			4.9	23.3
	3 月	-0.6	0.0	5.0	18.6
	4 月			5.0	14.4
	5 月			4.7	2.4
	6 月	-0.6	-0.4	4.9	27.1
	7 月			4.9	25.2
	8 月			4.9	16.7
	9 月			5.0	15.6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表 12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季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4 年		1716.0	2922.8	-1206.8
	3 季度	1083.4	1001.7	81.6
	4 季度	774.2	619.7	154.5
2015 年		3484.0	3031.8	452.3
	1 季度	1981.1	932.3	1048.8
	2 季度	809.4	864.3	-54.9
	3 季度	429.8	502.5	-72.7
	4 季度	263.7	732.6	-468.9
2016 年				
	1 季度	985.1	767.0	218.2
	2 季度	1533.8	988.1	545.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4 年		1.1	0.8	0.6
	3 季度	0.4	0.4	0.3
	4 季度	0.4	0.5	0.1
2015 年		2.0	1.8	1.4
	1 季度	0.8	0.4	0.5
	2 季度	0.4	0.4	0.4
	3 季度	0.4	0.5	0.4
	4 季度	0.4	0.3	0.6
2016 年				
	1 季度	0.5	0.6	0.6
	2 季度	0.3	0.2	0.2

表 14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1.5	4.4	4.8
	3 季度	0.7	1.7	1.5
	4 季度	0.5	1.5	1.4
2015 年		3.2	6.5	6.4
	1 季度	1.6	2.6	2.4
	2 季度	0.0	1.2	0.7
	3 季度	0.6	0.4	1.3
	4 季度	1.4	0.7	1.4
2016 年				
	1 季度	0.5	0.1	- 0.2
	2 季度	1.1	1.2	1.1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失业率
		环比	同比	
2015 年		0.5	181.2	10.9
	8 月			10.7
	9 月	0.0	0.9	10.6
	10 月			10.6
	11 月			10.5
2016 年	12 月	0.1	1.0	10.4
	1 月			10.4
	2 月			10.3
	3 月	0.2	0.2	10.2
	4 月			10.2
	5 月			10.1
	6 月	- 0.1	0.9	10.1
	7 月			10.1
	8 月			10.1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私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4 年		1.1	0.8	0.6
	3 季度	1.1	0.9	0.7
	4 季度	1.3	1.2	0.6
2015 年		2.0	1.8	1.4
	1 季度	1.8	1.7	1.1
	2 季度	2.0	1.8	1.3
	3 季度	2.0	1.9	1.3
	4 季度	2.0	1.7	1.8
2016 年				
	1 季度	1.7	1.8	2.0
	2 季度	1.6	1.6	1.8

表 1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1.5	4.4	4.8
	3 季度	0.9	4.8	4.8
	4 季度	1.1	5.3	5.5
2015 年		3.2	6.5	6.4
	1 季度	2.4	7.1	6.9
	2 季度	2.8	7.2	6.2
	3 季度	2.8	5.8	5.9
	4 季度	3.8	5.0	5.9
2016 年				
	1 季度	2.6	2.4	3.1
	2 季度	3.7	2.4	3.6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6、表 17)。

表 18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欧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2015 年	20430		5.3	17964		2.2	2466
	8 月	1480	- 3.6	5.7	1369	- 1.6	2.7
	9 月	1734	0.3	0.8	1539	0.2	- 0.4
	10 月	1812	1.9	0.5	1571	0.9	- 0.5
	11 月	1741	- 0.1	6.4	1503	- 1.3	4.4
	12 月	1690	1.5	4.2	1433	0.6	3.4
							257
2016 年							
	1 月	1449	- 2.2	- 2.1	1398	- 0.5	- 1.0
	2 月	1632	- 0.3	1.3	1446	0.1	2.0
	3 月	1792	0.8	- 1.9	1504	- 2.3	- 8.0
	4 月	1724	0.2	- 0.9	1450	- 0.3	- 5.4
	5 月	1677	- 1.7	2.0	1433	- 1.2	- 2.0
	6 月	1799	1.1	- 1.7	1500	1.5	- 4.8
	7 月	1677	- 0.8	- 9.5	1416	1.0	- 8.3
	8 月	1603	2.3	8.2	1419	0.9	3.7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贸易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为经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5 年		1718.0	1437.0	236.0	
	8 月	-28.0	3.0	-32.0	
	9 月	597.0	298.0	299.0	
	10 月	426.0	405.0	21.0	
	11 月	-450.0	-490.0	-4.0	
	12 月	23.0	75.0	-52.0	
2016 年	1 月	-99.0	66.0	-165.0	
	2 月	220.0	665.0	-445.0	
	3 月	121.0	259.0	-138.0	
	4 月	389.3	446.2	-56.9	
	5 月	458.6	558.6	-100.0	
	6 月	-133.0	-109.0	-24.0	
	7 月	-35.0	158.0	-193.0	
	8 月	101.0	559.0	-458.0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欧元区外国直接投资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				

四、日本经济

表 20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4 年		0.0	-0.9	0.1
	3 季度	-0.7	0.0	0.3
	4 季度	0.5	0.6	0.3
2015 年		0.5	-1.2	1.2
	1 季度	1.2	0.1	0.3
	2 季度	-0.4	-0.7	0.3
	3 季度	0.5	0.5	0.2
	4 季度	-0.4	-0.8	0.8
2016 年	1 季度	0.5	0.7	0.9
	2 季度	0.2	0.2	0.1

表 21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1.3	8.3	7.2
	3 季度	-1.1	1.5	1.0
	4 季度	0.1	3.4	1.1
2015 年		0.0	2.8	0.3
	1 季度	1.9	1.7	1.1
	2 季度	-0.1	-4.2	-1.8
	3 季度	0.2	2.6	1.2
	4 季度	0.0	-0.9	-1.1
2016 年	1 季度	-0.4	0.1	-0.5
	2 季度	1.1	-1.5	0.0

表 22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4 年		0.0	-0.9	0.1
	3 季度	-1.5	-2.7	-0.2
	4 季度	-1.0	-2.1	0.3
2015 年		0.5	-1.2	1.2
	1 季度	-1.0	-4.1	0.6
	2 季度	0.7	0.1	1.3
	3 季度	1.8	0.4	1.2
2016 年	4 季度	0.7	-1.0	1.6
	1 季度	0.2	-0.2	2.2
	2 季度	0.8	0.4	2.0

表 2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1.3	8.3	7.2
	3 季度	-2.1	7.5	5.1
	4 季度	-3.1	11.2	3.6
2015 年		0.0	2.8	0.3
	1 季度	-3.8	7.4	-0.6
	2 季度	0.7	1.9	0.8
	3 季度	2.4	3.1	1.5
	4 季度	1.8	-0.9	-0.5
2016 年	1 季度	-0.4	-2.5	-2.0
	2 季度	1.1	-0.1	-0.6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表 20~表 23)。

表 24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度	月份	劳动生产率 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 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2015 年		-1.4	1.80	3.4
	8 月	-2.9	1.84	3.4
	9 月	-2.6	1.83	3.4
	10 月	0.5	1.86	3.1
	11 月	0.1	1.90	3.3
	12 月	-2.8	1.90	3.3
2016 年	1 月	-4.2	2.07	3.2
	2 月	-1.2	1.92	3.3
	3 月	-1.7	1.90	3.2
	4 月	-3.1	2.06	3.2
	5 月	0.7	2.09	3.2
	6 月	-2.3	2.01	3.1
	7 月	-2.8	2.01	3.0
	8 月		2.02	3.1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表 25 进出口贸易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2015 年	756322		3.5	784676		-8.7	-28353
9 月	62096	-1.7	0.6	65131	-1.5	-11.1	-3036
10 月	62009	-0.1	-2.1	63406	-2.6	-13.4	-1397
11 月	62318	0.5	-3.3	61476	-3.0	-10.2	842
12 月	59650	-4.3	-8.0	59212	-3.7	-18.0	438
2016 年							
1 月	59793	0.2	-12.9	58677	-0.9	-18.0	1116
2 月	58178	-2.7	-4.0	56469	-3.8	-14.2	1708
3 月	58124	-0.1	-6.8	55343	-2.0	-14.9	2782
4 月	57451	-1.2	-10.1	53206	-3.9	-23.3	4245
5 月	56677	-1.3	-11.3	53678	0.9	-13.8	2998
6 月	57318	1.1	-7.4	53859	0.3	-18.8	3459
7 月	56361	-1.7	-14.0	52959	-1.7	-24.7	3402
8 月	56356	0.0	-9.6	52272	-1.3	-17.3	4084
9 月	59684	0.3	-6.9	54700	0.6	-16.3	4984

注: 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表 26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 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5 年		-510	159884	-160394
	8 月	-837	13842	-14679
	9 月	-1884	11442	-13326
	10 月	833	16580	-15747
	11 月	1490	13146	-11656
	12 月	1490	14725	-13235
2016 年				
	1 月	177	10377	-10200
	2 月	3154	15885	-12731
	3 月	9592	20913	-11321
	4 月	-3130	7218	-10348
	5 月	3574	9330	-5756
	6 月	12596	15971	-3375
	7 月	18118	23090	-4972
	8 月	-12763	-14072	-26835

资料来源: 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4 年		2.5	2.9	1.5	0.1	7.3	0.6
	3 季度	2.1	2.8	1.6	-1.1	8.3	0.9
	4 季度	3.4	2.8	1.4	-0.7	6.6	0.4
2015 年		1.1	2.3	1.2	-3.8	7.6	-3.7
	1 季度	-1.0	2.9	2.2	-2.0	7.5	-2.8
	2 季度	-0.5	2.3	1.3	-2.9	7.5	-4.5
	3 季度	2.2	2.0	1.0	-4.5	7.6	-3.7
	4 季度	0.5	1.8	0.5	-5.9	7.2	-3.8
2016 年							
	1 季度	1.2	2.0	-0.1	-5.4	7.9	-1.2
	2 季度	0.9	2.2	0.6	-3.8	7.1	-0.6

注: 印度年度 GDP 增长率为财年增长率。

表 28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尼 西亚
2014 年		3.3	2.1	2.6	3.8	6.0	5.0
	3 季度	3.3	2.3	3.2	4.3	5.6	4.9
	4 季度	2.7	2.6	2.5	3.6	5.7	5.0
2015 年		2.6	2.5	2.4	0.6	5.0	4.8
	1 季度	2.4	2.6	2.4	4.0	5.7	4.7
	2 季度	2.2	2.3	3.1	0.6	4.9	4.7
	3 季度	2.8	2.7	2.3	-0.8	4.7	4.7
	4 季度	3.1	2.4	1.9	-0.9	4.5	5.0
2016 年							
	1 季度	2.8	2.4	0.8	-0.3	4.2	4.9
	2 季度	3.3	2.5	1.7	0.7	4.0	5.2

资料来源: 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表 29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巴西	俄罗斯	南非
2015 年		6.9	5.4	6.8	5.6	25.4
	9 月	7.1	5.3	8.9	5.2	25.5
	10 月	7.0	5.2	8.9	5.5	
	11 月	7.1	5.1	9.0	5.8	
	12 月	7.1	5.1	9.0	5.8	24.5
2016 年						
	1 月	7.2	5.1	9.5	5.8	
	2 月	7.3	5.1	10.2	5.8	
	3 月	7.1	5.1	10.9	6.0	26.7
	4 月	7.1	5.0	11.2	5.9	
	5 月	6.9	4.9	11.2	5.6	
	6 月	6.8	4.9	11.3	5.4	26.6
	7 月	6.9	4.9	11.6	5.3	
	8 月	7.0	4.9	11.8	5.2	
	9 月				5.2	

表 30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
2015 年		3.6	4.4	3.3	3.8	3.1
	9 月	3.5	4.5	3.3	3.8	3.2
	10 月	3.4	4.6	3.3	3.8	3.1
	11 月	3.5	4.0	3.3	3.8	3.2
	12 月	3.5	4.0	3.3	3.9	3.4
2016 年						
	1 月	3.5	4.2	3.3	3.9	3.4
	2 月	4.1	4.2	3.3	3.9	3.4
	3 月	3.8	3.7	3.4	3.9	3.5
	4 月	3.7	3.8	3.4	4.0	3.5
	5 月	3.7	4.0	3.4	4.0	3.4
	6 月	3.6	3.9	3.4	4.0	3.4
	7 月	3.6	4.0	3.4	4.0	3.5
	8 月	3.8	4.0	3.4	4.0	
	9 月	4.0	4.1	3.4	3.9	

注: (1) 英国和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 个月移动平均失业率。(2) 加拿大、英国、韩国和中国香港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失业率。

资料来源: 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表 31 进出口贸易							表 34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 国			年份 月份	韩 国			墨西哥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5 年	4084.8	4192.5	-107.7	4596.6	6258.3	-1661.7	2015 年	5267.6	4365.0	902.6	3807.7	4052.8	-245.1		
8 月	335.8	349.7	-13.9	363.7	472.8	-109.1	9 月	435.1	345.6	89.5	321.9	345.3	-23.5		
9 月	345.8	348.0	-2.2	393.0	534.7	-141.8	10 月	434.7	367.8	66.9	341.0	364.9	-23.9		
10 月	336.1	353.2	-17.1	379.9	374.7	5.3	11 月	444.0	340.5	103.5	310.2	333.9	-23.7		
11 月	322.2	334.1	-11.9	377.3	532.6	-155.3	12 月	426.0	354.6	71.4	311.7	326.8	-15.1		
12 月	334.9	317.7	17.2	405.1	468.0	-62.9	2016 年	1 月	362.7	313.4	49.3	246.9	287.3	-40.4	
2016 年	1 月	307.8	292.1	15.7	315.7	450.9	-135.2	2 月	359.3	291.2	68.1	289.7	305.4	-15.7	
2 月	300.8	311.5	-10.7	343.2	497.3	-154.1	3 月	430.1	333.2	96.8	314.9	322.1	-7.2		
3 月	329.0	345.0	-16.0	349.8	566.5	-216.7	4 月	410.8	323.6	87.2	304.2	333.8	-29.7		
4 月	312.7	342.9	-30.2	350.4	581.1	-230.7	5 月	397.4	329.7	67.7	313.2	326.9	-13.7		
5 月	315.3	343.3	-28.0	340.4	526.1	-185.7	6 月	452.2	338.3	113.9	319.4	333.4	-14.0		
6 月	331.3	358.0	-26.7	350.1	472.5	-122.4	7 月	409.1	333.9	75.2	297.7	324.5	-26.8		
7 月	301.4	321.7	-20.4	314.0	524.9	-210.9	8 月	401.3	350.2	51.1	324.2	352.7	-28.5		
8 月	336.2	354.1	-17.9	305.7	543.4	-237.7	9 月	408.5	339.5	69.0	326.2	351.6	-25.4		
注:加拿大和英国数据经过季节因素调整。							表 35 进出口贸易								
表 32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单位:亿美元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南 非			巴 西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5 年	81.5	85.7	-4.1	1911.3	1788.0	123.4	2015 年	5106.0	5594.3	-488.3	2804.8	2289.2	515.6		
8 月	67.5	75.5	-8.0	154.9	133.1	21.8	9 月	453.5	492.6	-39.1	225.4	173.1	52.3		
9 月	66.9	68.4	-1.5	161.5	137.6	23.9	10 月	450.1	485.9	-35.8	239.4	178.1	61.3		
10 月	63.0	79.5	-16.5	160.5	146.3	14.2	11 月	454.6	480.9	-26.4	221.3	193.8	27.5		
11 月	66.0	65.8	0.1	138.1	126.1	12.0	12 月	468.8	500.8	-32.0	220.6	178.9	41.7		
12 月	58.5	53.7	4.7	167.8	105.4	62.4	2016 年	1 月	406.4	425.0	-18.6	221.9	186.8	35.2	
2016 年	1 月	42.6	54.5	-11.9	112.5	107.2	5.2	2 月	290.2	332.2	-42.1	177.6	136.2	41.4	
2 月	57.3	58.0	-0.7	133.5	107.6	25.9	3 月	400.8	429.9	-29.1	227.2	182.2	45.0		
3 月	61.7	60.2	1.5	159.9	120.6	39.4	4 月	413.6	417.3	-3.6	222.4	174.5	48.0		
4 月	62.7	63.0	-0.3	153.7	109.8	44.0	5 月	436.5	436.2	0.3	235.4	200.4	35.0		
5 月	68.0	56.0	11.9	175.7	115.9	59.8	6 月	433.9	470.5	-36.6	228.7	193.0	35.7		
6 月	69.5	61.5	8.1	167.4	132.9	34.5	7 月	461.8	467.0	-5.1	241.0	205.2	35.8		
7 月	66.3	62.8	3.5	163.3	122.5	40.9	8 月	435.6	456.3	-20.8	246.6	206.7	39.8		
8 月	65.6	71.8	-6.2	169.9	134.1	35.8	9 月				225.6	181.9	43.7		
表 33 进出口贸易							表 36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单位:亿美元								
单位:亿美元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印 度			俄罗斯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5 年	2666.6	3717.7	-1051.1	3403.5	1940.9	1462.6	2015 年	199.9	176.0	23.9	1503.4	1427.3	76.1		
9 月	218.0	322.8	-104.9	263.4	168.3	95.1	9 月	162.7	140.3	22.5	125.9	115.6	10.3		
10 月	214.3	309.4	-95.2	269.6	169.1	100.5	10 月	177.6	149.1	28.5	121.2	111.1	10.1		
11 月	195.3	297.0	-101.7	254.0	164.6	89.4	11 月	157.0	133.2	23.8	111.1	115.2	-4.1		
12 月	225.5	340.8	-115.3	287.5	174.4	113.1	12 月	159.5	140.3	19.3	119.2	120.8	-1.6		
2016 年	1 月	211.0	287.6	-76.6	170.8	98.4	72.4	2016 年	1 月	142.3	129.9	12.4	104.8	104.7	0.1
2 月	208.1	272.7	-64.6	200.8	128.9	72.0	2 月	135.5	117.9	17.6	113.1	101.8	11.4		
3 月	227.9	270.0	-42.0	232.6	153.3	79.3	3 月	163.3	135.9	27.5	118.1	113.0	5.1		
4 月	207.4	255.2	-47.8	218.6	151.1	67.5	4 月	157.1	133.9	23.2	114.8	108.1	6.6		
5 月	223.5	280.4	-56.9	219.8	144.5	75.3	5 月	148.1	140.0	8.1	115.1	111.4	3.7		
6 月	227.3	305.7	-78.4	241.1	160.0	81.1	6 月	162.6	149.1	13.5	129.7	121.0	8.8		
7 月	217.1	294.8	-77.7	225.3	160.4	64.9	7 月	148.9	144.2	4.7	95.3	90.2	5.1		
8 月	215.2	291.5	-76.3	233.0	183.8	49.3	8 月	167.8	146.7	21.1	127.5	123.9	3.6		
9 月	228.8	312.2	-83.4				9 月				125.1	113.0	12.2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表 27~表 36)。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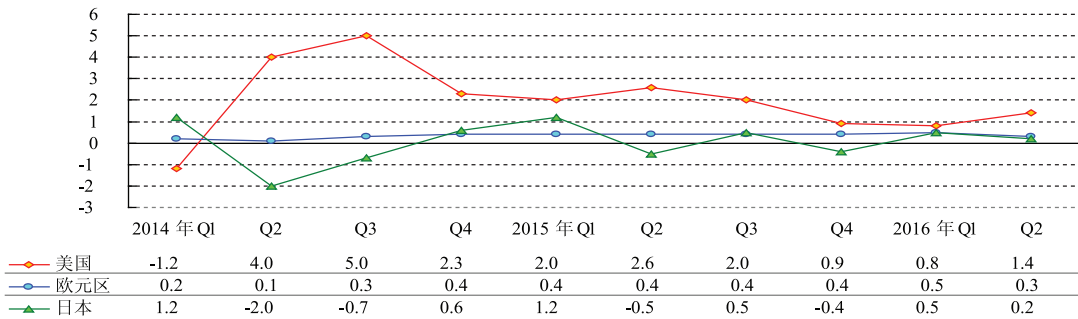


图 1 三大经济体 GDP 环比增长率 (%)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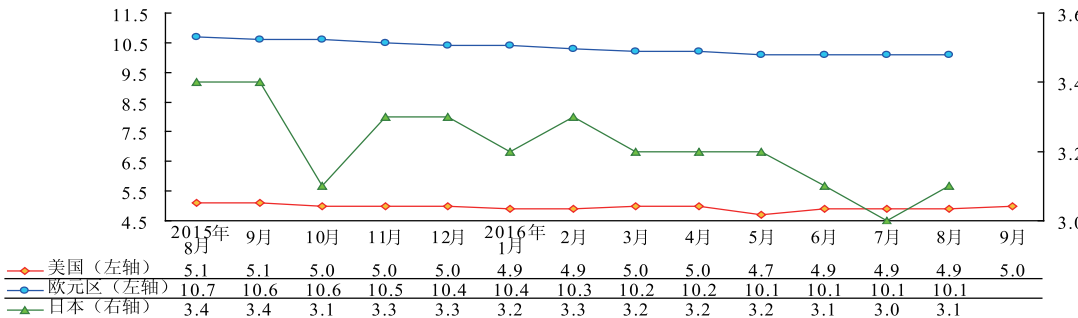


图 2 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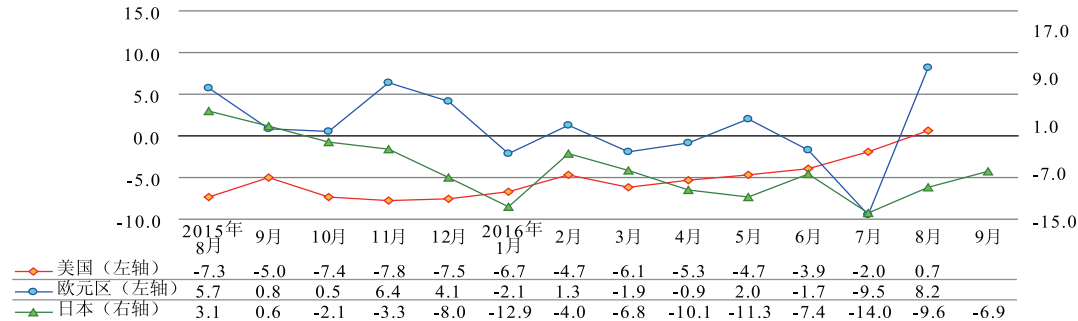


图 3 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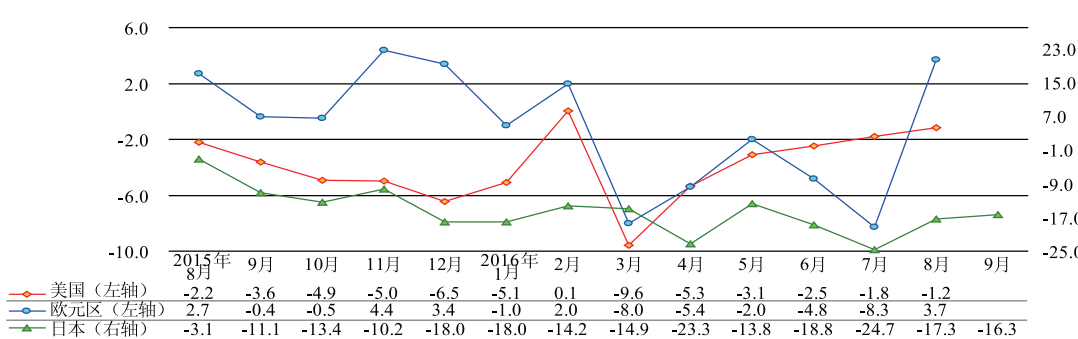


图 4 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网站(图 1~图 4)。

责任编辑:陈璇璇

ABSTRACTS

(1) To grasp the opportunity of the “post – golden age” of population to speed up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Tian Xueyuan

Practice and prediction show that the population dependency ratio of China between 1990 and 2030 has been at the “golden age”. In 2010, the ratio of China’s working age population aged 15 – 64 over the total population reached 0.75 peak while dependency ratio decreased to 0.34 minimum, marking the end of the “pre – golden age” and the beginning of “post – golden age”.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profit provided by the “post – golden age” of the population has about 20 years of continuous attenuation period, having major impacts on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decrease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profit induced economic growth to the new normal, inevitably from high rate into the medium – high rate; the continuous attenuation of labor – age population proportion and absolute number and the reduced employment pressure provided a rare opportunity for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the economic upgrading being put on the priority position of the schedule means the hope for promotion.

(2) Actively and steadily push forward the international capacity cooperation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Li Wenfeng and Li Zhipeng

After nearly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formed strong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t is at the right time to enter the fast track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carry out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capacity cooperation. The main problems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apacity are the low degree of enterprise organization, industrial matching lagging behind, foreign legal restrictions and standard barriers, the shortage of awareness of enterprises to make use of professional resources to reduce investment risk, the neglect of loc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ifficult to achieve economic benefits in short period of time. To promo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or the manufacturing capacity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e need to strengthen the planning, single out the focus, promote cooperation of major projects, and prevent the disorder competition; act according to enterprise specific situation and discretion, exte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oduction industrial chain; make better use of all kinds of platform in boosting international trade; fulfill social responsibility.

(3) The study on cooperation in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of the Belt and Road butt to butt “Australia Northern Development”

Meng Gang

Docking China’s initiative of “Belt and Road” with Australian “construction and Northern Development Plan” is a hot spot for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Australian governments, is also an important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the South pacific. This paper in depth analyzes the key construction field in the joint program between “Belt and Road” and “Northern Development plan” of facilities connection, energy resources, agriculture, industrial parks and others, details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simplified land policy of Australian “Northern Development Plan”, the development of water resources, the promotion of cross – border trade and investment cooperation, the promotion of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labor force, strengthening the joint governance structure etc, and discusses the suggestions on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two strategic docking.

(4) A study on the countermeasures of China's great efforts to promote the transnational merger and acquisition of enterprises

Zhang Jian

Starting from the background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 enterprises transnational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rrent cross-border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d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current China enterprises encounter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ransnational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d in depth analyzes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macroeconomy, policy environment, and micro operation. Against the above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ies and measures from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social aspects, focusing on three important work being strategic layout, creating a favorable external environment, improving the capability of Chinese enterprises of transnational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5) New development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hina's foreign investment in metal mineral resources

Gao lingyun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metal mineral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cute, getting more and more dependence on foreign metal minerals. In the field of metal mineral resources, it is the inevitable economic strategic choice for China to implement the "two resources, two markets" policy, to encourage enterprises to "go out", to obtain metal mineral resources through overseas investment. At present, Chinese overseas investment in metal mineral resources has exhibited new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fluctuation of investment growth, the ratio of investment over total overseas investment surpassing the energy investment, further concentration of investment region, dominant mode of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and the increase of investment proportion of private enterprise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of investment objectives being unclear, the lack of experience and less strong ability to resist risks, weak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more pro-cyclical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etc. Therefore, the next step should stress the following: establishing the overall strategy for overseas metal mineral investment; reforming the management system for foreign metal mining investment; taking the opportunity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exp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pace in metal minerals; encouraging enterprises to initiate large-scale operation; "public-private cooperation"; respect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ules for metal mine enterprise, paying attention to human factors and community construction.

(6) The main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acing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eriod

Li Feng

In recent years,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s shown a good momentum of rapid development,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nters into the important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eriod, but also faces some challen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continued optimization of the deep adjustment, the increase of free trade agreements and the agreements on investment signed, continued policy optimization of emerging market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make use of foreign capital bring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China's foreign investment enterprises; at the same time, the rise of a new round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rules and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rotectionism, economic alliance formed by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increased geopolitical risks all represent challenges for China's foreign investment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omestic environment, the enhancement of China economy and enterprise strength, the further implementation of "go out", "Belt and Road" and the FTA strategies provide important support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hich however faces the problems such as the legal system being imperfec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emerging enterprises and international talent shortage.

(7) Research on strengthening the coordination of fiscal, monetary and development policy

Liang Yunfeng and Liu Xiyou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macro-control system (plan) of three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 coordination gradually established during the practice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our country economy to maintain long – term rapid development. At present, the effective link between demand management policies and the supply side structural reforms is lacking, the effect of the three policies is restricted by the financial system, financial system and state – owned enterprise system and other factors, and objectives and means of macro – control disjoint in the individual areas and links. We should focus on deep – seated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restrict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orm policy preparation for strategic conception, development planning, policy ideas, reform plan, and major projects, coordinate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ies, develop three policies, and strengthen the effectiveness of macro – control policy system.

(8) The characteristics,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real urbanization ratio in China—— A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Comparision

Yi Xin

Influenced by both objective factors and powers of “heavy – material – light – people” development model of urbanization, China’s current real urbanization rate and rising speed are lower than those of countries at the similar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velopment stages, lower than the “normal value” of urbanization rate coordinat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by about 4 percentage points and 0.17 percentage points, respectively. To realize moderate level rise and reasonable speed of China’s urbanization rate, based on rational knowledge of urbanization in the rational power law, we should further deepen the reform of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break the barriers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land an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for farmers to enter cities, develop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ustries, perfect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urban and rural integration, embark on the new – typed urbanization road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city and people” and “the coordination and co – benefi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9) Policy suggestions on promoti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Li Rui and Wang Xiaohong

the “13th Five – Year” is the critical period to build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layout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and the contribution and rol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survey by the investigation group into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Zhejiang province shows the significantly enhanced foreign investment strength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level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Zhejiang, significantly enhanced international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of large scale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faced mainly include: increase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isk factors, financing difficulties and the policy discrimination of qualified “glass door”, complicated and prolonged approval filing procedure, visa issues, lack of government support, etc. The paper proposes relaxing private foreign investment regulation, strengthening financial insurance policy support, strengthening foreign investment platform construction, improving the government’s early – warning mechanism and accele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the key industries and key areas of strategic layout of the “Belt and Road”.

(10)The inspection report on the United States global well-known think tanks

The CCIEE Deleg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Building a new think tan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eds to learn from the construction experience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especially the general rules and the good practices in delivering the thought products. As the national high – end think – tank pilot unit with a strong policy influence and high degre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CCIEE) sets up a special topic this year to compare the system of think tanks abroad, studying how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hink tank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late April the CCIEE organizes Investigation and exchanges of specialized personnel to go to the United States, surveying the issues of financing, internal distribution, personnel incentives and daily management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well – known think tanks, and put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suggestions for building China’s think tanks in the future.

Editor: Huang Yongfu

《全球化》杂志征稿启事

《全球化》杂志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管/主办，是集研究性、学术性、政策性、应用性于一体，以国际国内重大战略问题研究为导向的经济类理论期刊。刊物依托“中国智库”平台优势，秉承“同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的核心理念，本着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的原则，着力打造“全球经济思想库”，构建一个智库交流的平台，成为广大读者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窗口和共享思想盛宴的便捷之门。刊物重点关注国际经济、宏观经济、产业发展、区域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高经济形势分析预测的科学性、及时性和权威性；积极推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进程，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与发展中的趋势与问题，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和资讯服务，同时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提供引领和支持。刊物力争具有全球视野，服务宏观决策，推动企业发展，集聚各类人才，成为政府、科研院所、企业从事国际经济研究、把握中国经济动向的重要理论刊物。

稿件要求如下：

1. 篇幅一般为 8000~12000 字，附有 300~400 字的摘要，3~5 个关键词，标题、摘要、关键词的英文翻译附在文后。
2. 来稿请注明作者的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研究方向和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电子邮箱。来稿如属基金项目成果，请按有关规定标注项目正式名称和编号。请将来稿（电子版论文）以 word 格式发送到编辑部投稿邮箱。

本刊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永定门内大街 5 号 235 室（邮编：100050）

投稿邮箱：qqh@cciee.org.cn；qqhtgx@126.com

联系电话：010-83362182/83362183

欢迎订阅《全球化》杂志

《全球化》杂志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管/主办，是集研究性、学术性、政策性、应用性于一体，以国际经济、宏观经济、企业国际化经营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类理论月刊（国内统一刊号：CN11－6008/F；国际标准刊号：ISSN2095－0675）。刊物按照曾培炎理事长的办刊宗旨，依托“中国智库”平台优势，秉承“同享人类智慧，共谋全球发展”的核心理念，本着兼容并蓄、百花齐放的原则，着力打造“全球经济思想库”，构建一个智库交流的平台，成为广大读者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窗口和共享思想盛宴的便捷之门。刊物致力于探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积极反映国际社会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研究如何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理论研究，关注宏观经济运行、产业发展、区域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提高经济形势分析预测的科学性、及时性和权威性；积极推动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进程，关注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与发展中的趋势与问题，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和资讯服务，同时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提供引领和支持。刊物力争具有全球视野，服务宏观决策，推动企业发展，集聚各类人才，成为政府、科研院所、企业从事国际经济研究、把握中国经济动向的重要平台。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内邮发代号：82－572；也可填好“征订单回执”，直接汇款向我部订阅。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永定门内大街5号232室《全球化》编辑部；邮编：100050；电话：010－83362183/83366113。

本刊定价：每期人民币35元，美元20元，港币50元，每月25日出版（国内免费邮寄）。

2017 年《全球化》杂志（月刊）征订单回执

订阅单位			订阅人姓名、 电话	
详细地址 (邮编)				
征订份数		420 元/年（12 期）	总计金额	

中国海外政经研究中心

中国海外政经研究中心是由中国海外控股集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共同发起设立的研究机构。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就与中国海外投资环境有关的问题，包括经济、政治、安全、政策等相关问题进行调研，分析研究，提供调研和分析报告，开展合作交流，召开成果发布会、举办专题论坛，开办讲座、培训等，面向政府、企业和社会。中心发挥智库功能，就有关中国海外投资和海外资产管理等问题，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战略性和政策性研究成果和对策性建议，为企业提供投资战略和资产管理等方面的咨询，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对海外资产进行有效管理。



联系地址：北京市王府井东街 8 号澳门中心四层（邮编 100006）
合作/咨询电话：010-58138101-302 邮箱：perc@zhwkg.com